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摄影：上海县文化馆

插图：《虹南作战史》连环画创作组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

《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25 插页 8 字数 141,000

1974年6月第1版 197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11171·80 定价：0.55元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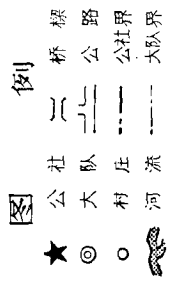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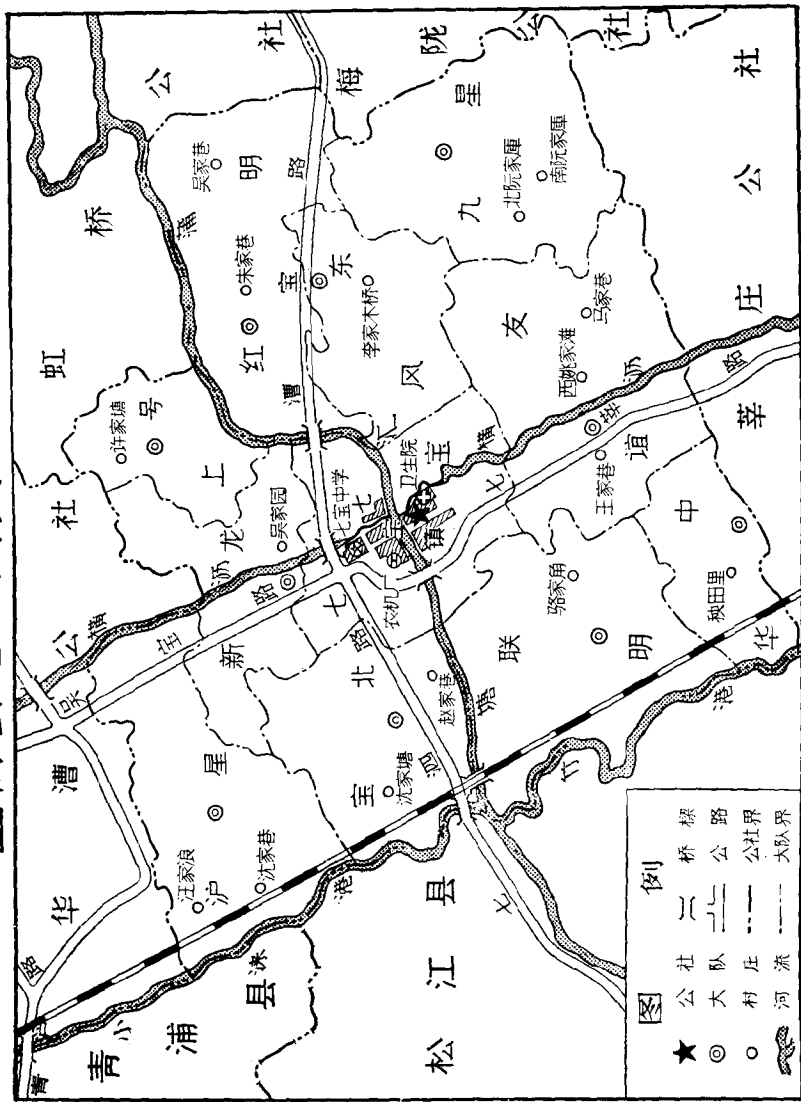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人民公社好

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上海县七一人民公社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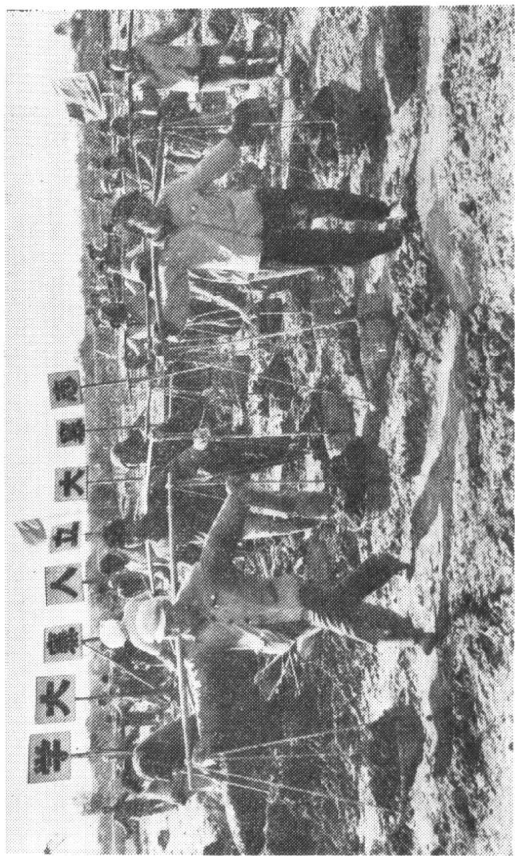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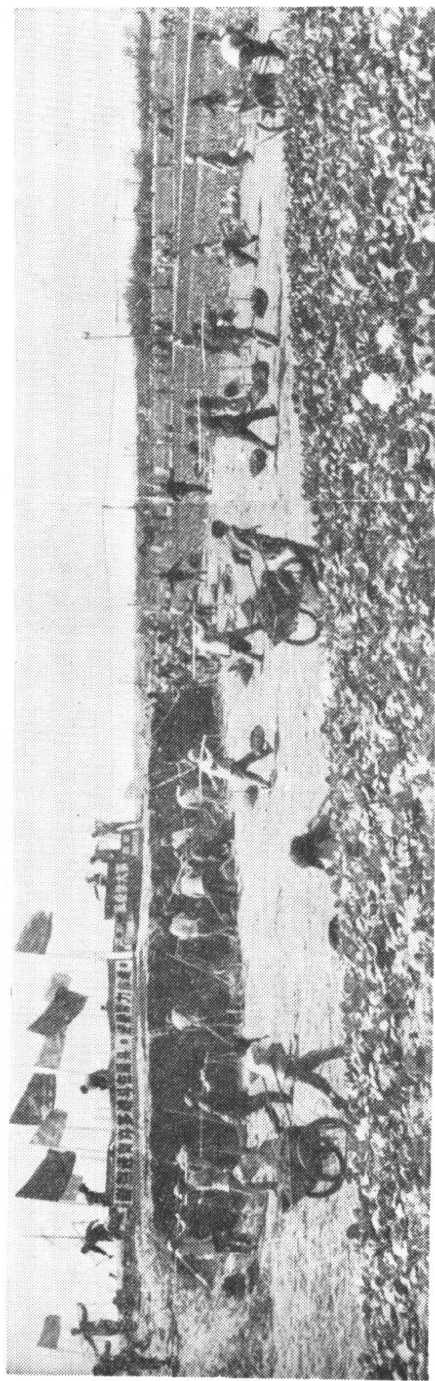
“十大”喜讯鼓舞广大社员和干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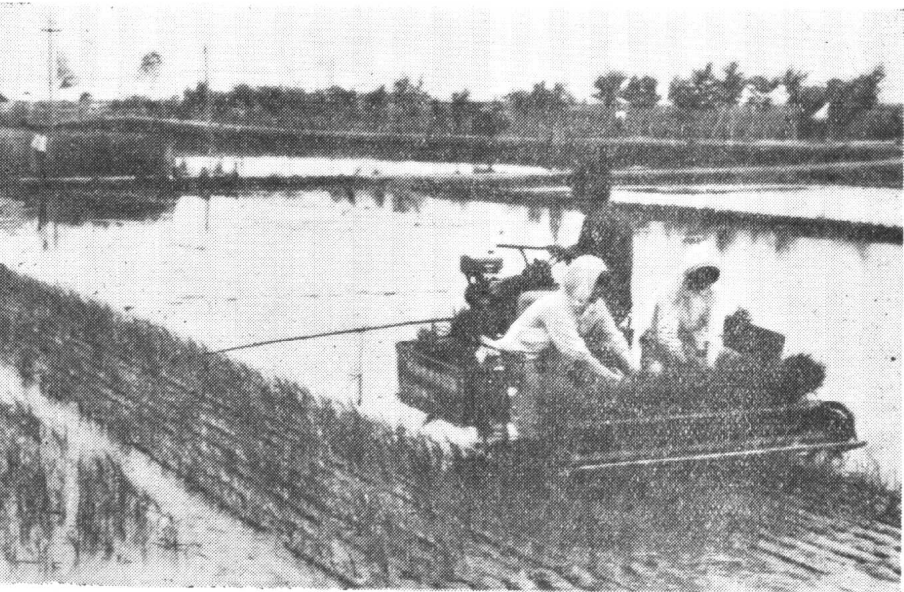
社员们在田
头学习马列著作
和毛主席著作。

开展革命
大批判。





发扬大寨精神，战高亢，夺高产。



过去插秧背朝天,今天插秧如游船。

收割机在轻快地前进!





喜摘新棉。

新鲜蔬菜运进城，工人农民心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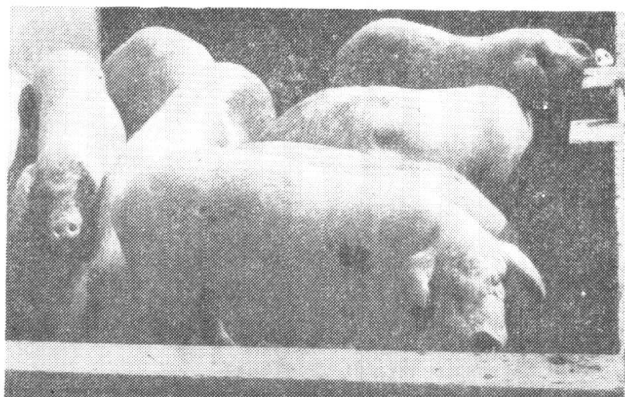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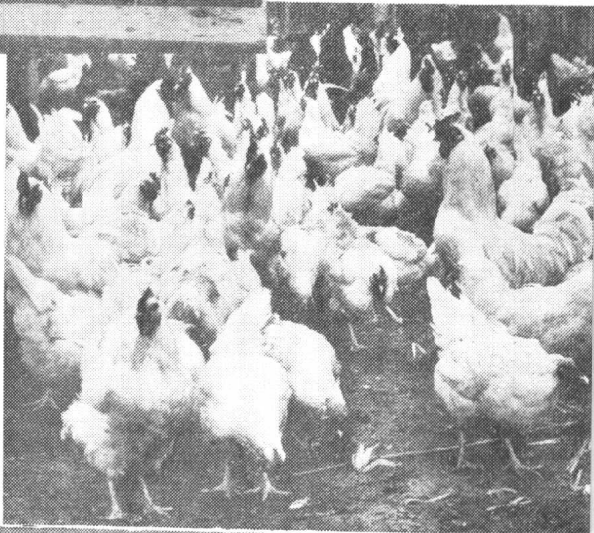
公社农机厂自力更生修造农业机械。



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手工编结,今天更加绚丽多彩。



六畜兴旺。
这是公社牧场的肉猪、种鸡和奶牛。





社员们在政治夜校里学习。



知识青年
在农村茁壮成长。

赤脚医生在
田头巡回医疗。



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七
宝中学学生在校
办工场里劳动。



农民新村的早晨。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看，民兵战士坚守在岗位上。



引 言

一九五八年，当我国农村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出现在上海市郊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就是以我们党的生日命名的七一人民公社。

七一人民公社位于上海市的西南郊，上海县的西部，面积为二十一点三平方公里。境内公路纵横，河道交织，公社所在地七宝镇，正当水陆交通的会合点。这里气候温和，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十五度以上，无霜期达二百四十天，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合水稻、棉花、蔬菜的生长。

七一人民公社现有号上、红明、东风、九星、友谊、中华、联明、七宝、宝北、沪星、新龙等十一个生产大队，八十八个生产队，农机厂等十二个社办企事业。全公社共有四千三百六十多户，其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劳动农民占百分之二十五，地主、富农不到百分之五。总人口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余人，集体耕种着二万零二十七亩土地，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种植粮食，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二分别种植棉花、蔬菜，百分之五种植瓜果和药材。

七一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七一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不断排除机会主义路线的各种干扰，沿着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胜利前进。特别是在一九五五年，正当“七一”地区上空阴霾满天，贫下中农办社热情受到无理压制时，毛主席亲自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这篇反映虹南乡（包括今七一公社号上大队在内）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了光辉的按语，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赞扬了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走合作化道路，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严厉斥责那些机会主义者：“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毛主席对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极大地鼓舞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高潮在“七一”地区蓬勃兴起，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又迎来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七一人民公社，已经胜利地走过了十五年的战斗历程。这十五年，同样是不断地同党内外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十五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节节胜利的十五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清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党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

人心，干部群众意气风发，三大革命运动捷报频传，公社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七一人民公社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证明了一条真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七一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和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社会主义的新的巨大积极性，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生产力获得了飞跃发展。经过连年铲“高亢”，填低洼，改河道，平整了近三千亩耕地，全公社已有半数农田实现了格子化。公社的机电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一百，从一九六八年起，埋设地下水管，改明渠为暗渠，到一九七三年底，全公社共建成地下管道五十多公里，已有七个大队实现了暗渠灌溉。农业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机耕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八年中，七一公社的农业连年增产。至一九七三年，夺得了连续十二年的丰收。粮食产量一马当先，一九七二年把《纲要》指标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七百零三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棉花产量也大大超过了《纲要》指标，一九七三年为一百四十三点四斤（皮棉，全书同），比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蔬菜平均亩产多年超过一万斤。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七一人民公

社的三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到一九七三年底，全公社的资产总额达一千四百五十六万元，超过一九六五年的二点二六倍。换句话说，现在一个七一公社的“家底”，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七一公社还多。在集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社员收入也逐步增加，一九七三年平均每户集体劳动所得为八百六十二元，比一九六五年多了一百八十九元。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许多新生事物，象烂漫春花开遍七一公社的广阔原野。政治夜校普遍开办，广大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不断高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大批成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老贫农走上了讲台。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上，“合作医疗”制度普遍推行，一九七〇年，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送走了“瘟神”。

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它极其有力地向人们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七一人民公社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写下了一页页光辉的斗争记录，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历史画卷。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土地改革	1
第一节 千年穷根要铲除	1
争取解放的斗争	
土改前的土地关系	
第二节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10
发动群众	
斗倒地主	
分田分地真忙	
农村的主人	
第二章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	22
第一节 成立互助组	22
土改后的两极分化	
组织起来	
互助组越办越多	
第二节 大办初级社	35
突破互助组的形式	
试办李家木桥初级社	
合作社大发展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 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第三节 高级社普遍建立 ·····	54
办起了十一个高级社	
比初级社更优越	
第四节 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成果 ·····	66
高级社经受了考验	
整风整社	
第三章 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 ·····	76
第一节 公社在孕育中 ·····	76
大跃进中暴露了高级社的矛盾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第二节 公社胜利诞生 ·····	83
欢庆公社成立	
农村新面貌	
第四章 在斗争中健全公社体制 ·····	91
第一节 迎着风浪前进 ·····	91
捍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批判右倾思潮	
第二节 总结经验 贯彻《六十条》 ·····	101
生产关系的调整	
公社越办越兴旺	
第五章 一九六二年的严重斗争 ·····	110
第一节 抵制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	110
反对“三自一包”	
打击反攻倒算活动	
第二节 向敌人主动进攻 ·····	119

八届十中全会指方向
新的战斗打响了

第六章 四清运动128

第一节 排除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128

第二节 在《二十三条》指引下134

形成团结对敌新局面
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
加强组织建设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第七章 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胜利前进146

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建立公社

革命委员会146

第二节 落实斗批改各项任务153

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
开门整党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医疗卫生的革命

第三节 积极投入批林整风运动166

第四节 公社经济欣欣向荣174

农业生产突飞猛进
社办工业日新月异
多种经营蓬勃发展
商业工作面向农村

后 记189

第一章 土地改革

第一节 千年穷根要铲除

争取解放的斗争

现在的七一人民公社地区，是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这里的每一寸肥沃土地，都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辛勤开垦、用血汗灌溉出来的。但是，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阶级所霸占，他们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农民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头上三把刀：租米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这首歌谣正是广大农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哪里有剥削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七一”地区人民为了夺回土地，争取解放，同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上海小刀会起义，都有这里的农民参加。据《青浦县志》记载，一八六二年，在当地农民支援下，慕王谭绍光率领的三万太平军，在七宝镇围歼了一支清军，击毙了一个清军头目韩正国。现在友谊大队有一块古碑上记载着清朝光绪年间这一带农民的多次暴动。他们不堪忍受封建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结队成群”、“肆行无忌”，起来抗争。反动官府虽经一再“出示禁约”，但农民群众“并不畏法”。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饥饿的农民更是“相约

而来”、“愈聚愈众”，一下子汇集了三千多人，冲进七宝镇地主的粮仓，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使反动统治阶级“惶惶难安”，受到了沉重打击。在历史上，“七一”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连绵不断，可歌可泣，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最后都失败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以后，“七一”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一九二三年前后，七宝镇已开始有党的活动。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带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掀起了抗租抗粮的斗争。这一年秋天，当北伐军向上海胜利进军的时候，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提出了“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迎接北伐军”的口号。不少农民跟随农协会员到沪杭铁路上撬铁轨、割电线，破坏军阀孙传芳控制的交通线。农民们还到处袭击“催租局”的运粮船，使地主阶级惊恐万状。有一首民谣反映了农民的这一英勇斗争：“催租局，吓人头，农民团结一条心，催租老爷腿发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七年农历十月初七，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七一”地区，给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在这群强盗入侵的第一天，仅宝北乡号上和观音堂两个小小的村子，就有四十多个农民惨遭屠杀，鲜血染红了蒲汇塘的河水。

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吓不倒英勇的中国人民！“七一”地区的农民们怀着满腔仇恨，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敌人在蒲汇塘沿岸设置的封锁线。一天晚上，在敌人的一个封锁口——漕宝路上的七号桥附近，十几个农民同日伪巡逻队进行了顽强的搏斗，把巡逻队的四个敌人全部打死，丢到河里。农民们还在党的领导下，多次配合新四军游击队，袭击敌人据点，杀伤了很多敌人，给日伪军很大威胁。“鬼子看见游击队，拨转屁股朝后退”，这两句顺口溜，活画出日本侵略者的虚

弱本质，也预示着这些强盗末日的来临。

抗战胜利后，日本侵略者被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却又回到上海，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它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横征暴敛，抓丁拉夫，使“七一”地区贫苦农民进一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放，不断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老巢——南京后，立即挥戈南下，并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向上海推进。这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七宝镇民校和它在宝北乡号上、观音堂、小涑桥等附近村庄的分校，开展了各种活动，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当农民被蒋匪军强迫拉去筑碉堡、挖战壕时，就举行怠工，监视敌人的活动，摸清敌军防线的情况。五月十日左右，解放大军逼近七宝镇，中共七宝镇总支组织了第三批青年农民，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携着七宝地区蒋匪军防线图，到松江、青浦一带，去迎接解放军，并为解放军带路。十三日，蒋匪军在七宝镇塘桥上扎了许多木板，下面放了四桶火油，还在木板上撒了大量硫磺，阴谋把这个集镇付之一炬。可是，解放军及时赶到了七宝镇，敌军连划一根火柴都来不及，就慌慌张张地夹着尾巴逃跑了。解放军乘胜追击，向七号桥发动进攻。那几天，正好阴雨连绵，道路泞滑，很不好走。同时，由于胜利的形势发展很快，军粮一时供应不上。这里的农民冒着枪林弹雨，用稻草为解放军铺路，并筹集粮食支援子弟兵。十八日，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解放军某部四营的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击溃了蒋匪军，攻克了七号桥，突破了敌军在上海西南郊的第一道防线。二十七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

派的残兵败将溃不成军，上海全市获得解放。从此，上海城乡劳动人民“生命无保障，生活无保障”的苦难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七一”地区广大农民，和全市人民一样，重见天日，欣喜若狂。贫苦农民激动地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到底盼到天亮了！”

土改前的土地关系

上海解放了。“七一”地区广大贫苦农民揭开了他们新的历史篇章。

解放后，广大农民从昔日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长期残酷压迫，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崩溃前夕的疯狂破坏，“七一”地区许多贫苦农民在解放时，处于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生活极端困难的境地。华村乡的黄花桥、陆家巷等村庄，解放前夕被蒋匪军放了一把火，六、七十户人家没有房子住；吴家塘等六个村庄几百亩快要成熟的麦子、油菜，被敌人全部踩平，有十多户人家处于断炊状态；宝南乡南阮家厍（shè音“舍”，意为村庄。）等八个村，家无一粒米的就有三十八户，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宝北乡南朱更村，解放前夕遭受蒋匪军的破坏尤为惨重，全村被夷为平地，四、五十人流离失所，这个村子从此名存实亡。

毛主席和共产党，同贫苦农民心连心。上海解放不久，中共新泾区委和龙华区委^①就遵照上海市委的指示，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发动群众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并在国家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送来大批粮食等救济物资，同时组织以工代赈和社会互济，帮助困难农民恢复生产、安排生活、重建家园。如龙

^① 当时，“七一”地区分属新泾、龙华两区管辖。

华区，共发放大米七千八百多斤和大批现款，帮助一百多农户克服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给一千多个贫苦农民免费治疗疾病。在以工代赈方面，组织农民整修了公路六条、大小桥梁五十九座，协助二百二十五户人家重建了房屋，其中后两项发放的赈米达三万零六百十三斤之多。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经过广大农民的生产自救，“七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农民生活基本上有了着落。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的要求，在这里也达到了。许多贫苦农民抚今追昔，感动得热泪盈眶。宝南乡南阮家厍贫农阮世才，解放前夕一家四口几乎饿死。解放后，他家接连得到了两次国家救济和一次社会互济，才度过难关。他含着热泪说：“国民党给我们带来灾难，共产党帮助我们度过灾荒，若不是来了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这副骨头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解放初的严重困难克服了。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这是因为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

以当时大部分人口和土地在“七一”地区的宝南乡为例，这个乡共有人口八千九百五十七人，土地二万一千八百一十六亩，其中占人口百分之七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五（不包括外乡地富在这里占有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三的贫雇农，却只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二。

宝北乡现新龙大队一带，共十个自然村，当时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四，而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三的贫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宝北乡沈家巷自然村，共有五十八户人家，其中一户地主占地八十亩，加上八户富农的土地，共计四百七十八亩，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四，平均每户五十三亩多，而二十三户贫雇农一

共只有四十亩零七分土地，为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五，平均每户不到二亩。二十三户贫雇农的全部土地，比一户地主的土地差不多要少一半。

七宝镇郊的全部土地中，百分之八十五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里，而贫雇农和城镇贫民只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平均每人还不到三分地。

以上情况表明，不论是一个乡、一个现在的大队范围或一个自然村，也不论是一般的农村或镇郊，毫无例外，大量的土地都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而广大贫苦农民却只有少量土地。

“七一”地区的地主和富农，在他们霸占的大量土地中，除一部分自己经营、雇工剥削外，约有百分之八十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向农民榨取苛重的封建地租。解放前，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封建地租，以实物为主要形式。这种实物地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可以大到这样，以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都受到严重威胁，以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最小限量的维持肉体生存的生活资料”。

地租的种类很多，这一带盛行的有以下几种：

(一)包租，又叫“租种地”。这是一种“定租”，农民向地主租地耕种，每年每亩的租额都是固定的，不论丰收歉收，都要全部交足。大多交米，也有交黄豆或棉花的。由于土地肥瘦不同，租额从大米四斗到一石(每斗十五市斤，十斗为一石)不等，一般在五斗至八斗之间，约占正常年景全部产量的一半以上。即使颗粒无收，地主还是要逼租，往往逼得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包租”制，在这一带是最普遍的。

(二)分租，又叫“分种地”。这是一种“活租”，租额多少不固

定，租地农民每年按收获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地主交租。分租办法是：地主不劳动，只出土地，种子、肥料等都由农民出，从种到收都是农民干，但地主却要拿走收获物的百分之四、五十，有的连柴草也一律归地主；如果地主供给部分或全部种子、肥料、畜力等生产资料，地租就要占收获总额的一半以上，甚至高达七、八成。

(三)预租，又叫“先付后种”。有的农民种地主的田，要预先付出一年到几年的地租。贫苦农民没有钱交预租，只得去借债，就要先受高利贷的剥削。而地主取得预租后，又可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双重剥削。

地主阶级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压榨，还搞了不少额外剥削的花样，主要的有：

(一)押租。农民为取得土地租佃权，要先向地主付一定数量的钱或粮食，作为保证金，这就是“押租”。如果年底农民交不出租，地主就扣押租。

(二)虚田实租。地主以不足一亩的土地租给农民，年底却要按一亩收租。在地主出租的土地中，很多都是以七、八分作一亩，有的甚至只有五、六分。

(三)大斗大秤。这是地主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地主收租时用大斗大秤，比一般用的斗和秤，每石要多收十斤到十五斤。

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的重压下，生产、生活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地主、富农和奸商借债，遭受高利盘剥。这里高利贷剥削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地主、富农和奸商，有的乘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急于买粮，强迫农民把将要成熟的稻、麦等作物低价出卖，即通常所称的“卖青苗”；有的则“放债米”，出借大米一石，借期半年的要还一石五斗，十个月到一年的要还二石，有时还小斗

小秤出，大斗大秤进；剥削特别凶的是放“印子钱”，一般出借四个月就要对本对利。农民一背上这种高利贷，就会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辈子不得翻身。所以农民说：“高利贷好比血吸虫，一沾上就要你半条命！”

蛇蝎毒，比不上地主的心肠毒；黄连苦，比不上农民的生活苦。在旧社会，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成年累月辛勤劳动，却不能维持最低生活，不少人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北阮家库贫农姚土英，解放前夫妻俩带着三个小孩，种自己家的两亩地糊不上五张嘴，向地主王伯贤租田七亩。这个地主出租的土地，每亩实际只有五、六分，租米却要按每亩六斗或七斗计算。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地干，家里还是穷得常常揭不开锅。一九四三年，姚土英的丈夫因几顿没吃，饿着肚子去帮人圈河泥，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丈夫死时，孩子最大的才八岁，从此一家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她的肩上。王伯贤心狠手辣，生怕姚土英家劳力少，吃口多，收不到租，逼租逼得更凶了。她丈夫死后的第一个秋收，还没开镰，王伯贤就派狗腿子来坐讨租米，收起一担，他就抢走一担，甚至连烧一顿饭的柴草也没给留下。后来王伯贤又要她交预租四石五斗大米。姚土英一家连薄粥汤也喝不上，哪里拿得出预租。两年后，四石五斗打了两个滚，变成了十八石，王伯贤就硬逼着姚土英把自己的两亩地抵了债。她向王伯贤租种的土地也从七亩变成九亩，受到的剥削更重了。一直到解放初，尽管她终年劳累，而贫困却象自己的影子一样，无法摆脱。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七一”地区象姚土英那样破产的贫苦农民到处都是。多少农民穷得终年吃不饱、穿不暖，流落讨饭！多少村庄被人加上了“讨饭”、“赤脚”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号上一带，就有四个自然村，叫做“讨饭南朱更”、“赤脚许家塘”、“帮人门前场”和“拾柴挑野

菜张家塘”。这活生生的事实，对于解放初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散布的所谓“江南无封建”的谰言，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毛主席教导说：“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地摧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它是我们民族贫困和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独立、统一和富强的障碍。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势力，又是中国反动派的社会基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为了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打倒封建势力，铲除农民贫穷的根子，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并为国家工业化开辟道路，必须彻底实行土地改革。

“七一”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同全国新解放区农民一样，从新中国诞生的一天起，就迫切盼望实行土地改革。他们在中共新泾区委和龙华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特、反霸、废除反动的保甲制度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农民协会。一九四九年冬天，农民协会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实现，是解放初期农民在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经过这次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开始被打了下去，农民所受的剥削有所减轻，农民协会的威信和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农民协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到一九五〇年年底，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就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发动群众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主席发出号召：“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六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九五一年二月，“七一”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开始了（七宝镇郊，在各乡土改基本结束以后，到一九五二年一月才进行）。

春节刚刚过去，土改工作队就分别进入了宝北乡西南片的涞东、宝北、沪星三个行政村^①，和东南片的联合、新六两个行政村。春风把喜讯带到了每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农民群众喜气洋洋，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接亲人。土改工作队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群众的热烈欢迎。村村都象烧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了。

但是，农民群众中的不同阶层对土地改革的反映，却并不相同。

贫雇农，由于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过去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生活最痛苦，对土地改革的要求最为迫切。他们亲切地把土改工作队叫做“毛主席派来帮助我们农民翻身的队伍”。

中农，大部分是自耕农，也有不少人租过地、借过债，受过封建地租或高利贷的剥削，所以大多数人是拥护土地改革的。但

^① 一九五〇年六月，上海市郊区正式成立了区、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行政村，每一行政村管辖若干自然村。

是，有一部分土地比较多、生活比较稳定的人，却认为土改对他们的好处不大，因而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至于那些土地多、又有一些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则怕自己被划成富农，顾虑重重，见到工作队若即若离，不敢接近。

土地改革是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的革命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使它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打破地主阶级的顽抗，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土改工作队进村后，按照“**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他们首先通过访贫问苦等活动，把对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贫雇农充分发动起来，尽量发挥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的骨干作用，并依靠他们去团结中农，团结农村中一切反封建的力量，共同向地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很快地涌现出来。贫农彭书芹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宝北乡吴家园村贫农彭书芹，在旧社会打过短工、做过女佣，也讨过饭，受尽了折磨，真是“苦去苦来”。她恨透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所以，听到工作队动员要实行土改，就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也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在斗争中总是跑在前面，并且团结了一批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她被群众推选为乡妇联主任和区妇联委员。

土改工作队还及时领导农民，清除了混进农民协会的某些不纯分子，整顿了农会组织，使农会真正成为进行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农会采取各种方式，引导贫苦农民开展吐苦水、挖穷根的诉苦活动。这是发动群众的重要一环。随着各乡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诉苦活动进入了高潮。

二月下旬的一天，宝北乡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在乡政府前的场地上召开了。这是解放以来这里农民第一次自己组织的大

规模集会。各村农民满怀热情，高举红旗，扭秧歌，打腰鼓，把自己的代表一直送到会场。在会上，许多贫苦农民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控诉了一小撮地主、特别是恶霸地主王道生一家在解放前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罪行。观音堂村恶霸地主王道生和他的四个反动透顶的儿子，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是臭名昭著的“五老虎”。他们不仅通过出租土地、雇用长工、放高利贷，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实行残酷迫害。村旁有一条沟，种田人来往不便，贫农王永生在上面搁了一根石条，王道生和他的儿子王伯才就借口破了他家的“风水”，对王永生敲榨勒索，逼得王永生背了一身债。王伯才看中了一个农民的八亩地，就强占为己有，害得这个农民一家无法生活。王道生另一儿子王义才，霸占了一个农民的妻子，贫农俞关生怒加痛斥，王义才就指使爪牙，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抛到河里。俞关生被群众救起后，王义才又扬言要打死他，逼得他在外边流浪了半年多，一家大小陷于绝境。不仅如此，王道生和他的儿子还把长工阿贵活活打死。这些控诉，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了农民群众满腔怒火，使广大农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他们决心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

在诉苦活动中，贫苦农民通过回忆血泪家史，声讨地主阶级的罪行，找到了自己的穷根所在，从而增强了挖穷根、搞土改的斗志。同时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跟着党走，就能胜利。广大农民信心百倍，劲头十足，积极投入斗争。

宝北乡是这样，宝南乡和华村乡也是这样。

“大家看一看啊！大家想一想啊！地主搭仔农民到底啥人养活仔啥人啊？呒没我佢来种田，天上不会落白米。半夜晒，五更起，丰水盆地全要用力气呀。地主勿种田啊，仓间堆满上白

米呀。……”在“七一”地区的每个角落，到处唱起了《啥人养活啥人》等革命歌曲。

群众发动起来了。农民协会引导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划定了阶级成份，把土地改革运动引向纵深发展。

斗倒地主

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坚决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则对这场斗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施展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和捣乱。一些地主分子到处散布反动的“天命”思想：“牛吃稻柴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命里注定烧行灶，走遍天下吹火筒”。华村乡一个地主分子胡说他的财产是“天赐”的，对贫苦农民宣扬“人生该有就有，该无就无，不是自己身上的肉，贴上去也不牢”的谬论，妄图瓦解群众斗志，阻挠运动开展。宝北乡“五老虎”之一的反革命分子王伯才则公然叫嚣：“日本人蹲了八年，共产党八年也蹲不成。”有的阶级敌人向群众大煽阴风，说什么：“今朝天落雨，明朝天总归会好的。”还威胁土改积极分子：“你们现在积极，以后要吃苦头。”沈家塘村地主沈文俊在土改刚开始的时候，就买了一本土地改革法的小册子，妄图钻空子，隐瞒成份。他一面偷偷地把四十五担谷子和大批布匹藏到邻居的草堆里，一面在饭里掺上豆饼，拿出来给人看，故意装穷。还有一个地主姚鹿彬知道硬顶不行，就装出一副“老实相”，工作队一进村，他就立刻“主动献地”，扬言自己是“开明地主”，背后却藏了一本变天账，还把贵重衣物、家俱等大量财物装了一船，运到松江亲戚家中。宝南乡阮家行政村共有三户地主，户户都转移财产。其中有一个地主，还怂恿她的女儿施展“美人计”，腐蚀七宝镇派出所的一个工作人员，通过他把土地的

地形图和地契全部照了相，妄图有朝一日反攻倒算。

地主阶级还与帝国主义在天主教内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披着宗教外衣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把它的骨干傅鹤洲安插在七宝教堂，进行破坏活动。在土改中，傅鹤洲根据龚品梅的黑指示，威胁教徒“不得在公审大会上控诉地主”，并指使神父“不得承认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等等。七宝镇上有两个地主（教徒），把他们在昆山的一百五十多亩田的地契交给傅鹤洲拍了照。傅鹤洲咬牙切齿地对这两个地主说：“没有关系，地契照过相，手续已弄好，将来总有一天！”当这两个地主在昆山的土地被分掉后，反革命集团头子龚品梅对他们深表“同情”，马上派傅鹤洲送给他们三百元，为地主阶级撑腰打气。

螳臂当车，可笑不自量。革命的群众运动在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支持下，象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冲击这一小撮疯狂的阶级敌人。在党的领导下，“七一”地区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广大群众积极投入斗争，进行检举揭发。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公安机关在群众的协助下，逮捕了傅鹤洲、王伯才以及其他一些罪恶昭著的恶霸地主、特务、惯匪、汉奸、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首要反革命罪犯。对那些能主动坦白交代反革命罪行的人，给以宽大处理。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仅极其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分化瓦解了敌人，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志气，推动了广大农民打倒封建地主的革命斗争。

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了。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正是旧历大年初一，当时七宝镇郊开展土地改革才半个多月，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地主又跳了出来，以傅鹤洲这条帝国主义走狗被我人民政府逮捕为借口，竭力混淆宗教信

仰自由和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煽动和蒙蔽一批教徒，包围了七宝镇人民政府，制造骚乱。但是，这一小撮阶级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下，他们破坏土改的阴谋破了产。一些受骗的教徒，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也擦亮了眼睛，反戈一击，同广大农民一起，把这两个不法地主揪了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群众斗争地主高潮的到来。在那振奋人心的日子里，各行各业到处摆开了斗争地主的战场。

一天，阳光普照，东风劲吹。在宝北乡沈家塘的场地上，一个斗争地主沈文俊和姚鹿彬的群众大会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贫农沈伯勋起来控诉了。他从小失去父母，十一岁起寄养到他表兄沈文俊家里。沈文俊一家雇工折合达二十个长工，把沈伯勋也当小长工使唤，要他喂牛、放羊，从天不亮忙到深更半夜，地主婆稍不如意，不是骂便是打，地主一家每天大鱼大肉，沈伯勋却连饭也吃不饱。他给沈文俊当了十多年长工，做牛做马，可是，没有得到过一分工钱。沈文俊残酷剥削农民，以及隐匿财产、破坏土改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到会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震动了会场。接着，几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揭发和控诉了地主姚鹿彬。这个占有一百七十三亩土地的地主，每年要从农民身上榨取二万多斤稻谷，喝饱了农民的血汗，在土改中又竭力对抗运动。农民们的揭发、控诉，迫使他不得不低头认罪。

到处都是对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罪行的愤怒声讨。在华村乡的顾家塘天主教堂里，在七宝镇边的场地上，以及在“七一”地区的其他许多地方，都召开了斗争地主大会。这些斗



“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争会开得好！一小撮地主被斗得威风扫地、臭不可闻。广大贫苦农民威风凛凛、扬眉吐气。在旧社会受尽欺压和剥削的广大农民，终于站起来了。他们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千遍万遍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分田分地真忙

斗倒了地主，“七一”地区的广大农民在农民协会的带领下，先后按照党的政策，没收了地主阶级几千年来借以剥削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多余的粮食和房屋，征收了富农、工商业户和小土地出租者应征收的一部分土地。据统计，新泾区共没收地主土地九千五百二十九亩、耕牛九头、农具五千零七十二件、粮食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五斤、房屋八百三十八间以及家具九千零六十四件；征收富农等的土地共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亩。龙华区宝南乡共没收地主的土地四千一百三十一亩、耕牛七头、农具七百四十七件、粮食七千八百六十八斤、房屋二百七十七间以及家具五千六百九十四件；征收富农等的土地共二千七百七十二亩。

接着分配胜利果实。分配土地时，对租进土地较多的原耕农作了适当照顾，一般每人分得一亩八到二亩二；无地少地的农民分进的土地数，一般为每人一亩半到二亩。“七一”地区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七户农民，分到了六千四百八十三亩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房屋、粮食等。在农民分地的同时，农民协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十条的规定，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土地，使他们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贫苦农民祖祖辈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

己的手里。多少年的愿望实现了，他们是多么高兴啊！在那些日子里，哪里开始分土地，哪里就象办喜事，人们跳啊，唱啊，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许多农民当分到土地、拿到土地证时，看着自己的田，摸着肥沃的泥土，看也看不够，摸也摸不厌，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淌下了激动的热泪。他们把写着自己名字的小木牌插在分得的土地上，有的还在上面写上“翻身地”三个大字。宝南乡马家巷的贫农马进生，解放前一家六口，没有一寸土地，租了地主的两亩田，每年交完租，剩下的粮食不够全家喝两个月的稀粥。父亲只好去做小工，母亲到七宝镇一个大地主家做奶妈。后来，他父亲得了血吸虫病，含恨死去，一家更无法生活，他的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马进生自己和弟弟，也都送给别人，搞得家破人亡。现在，马进生分得了八亩八分土地。他从分得的土地上抓起一把泥土，看了又看，激动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这个村的另一个贫农顾秀珍，分到了一间瓦房。搬进这间新屋后，她第一件事就是端端正正地在屋里挂上了毛主席的像。顾秀珍无限深情地对女儿说：“因啊！我们祖宗三代都住破草棚，你父亲当了一辈子长工，受尽地主的折磨，直到他在草棚里死去时，也没有积下一块砖、一片瓦。今天，我们住进了这样好的房子，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恩情啊！”

分配了土地之后，党就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着重检查土地改革是否严格执行了毛主席制订的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七一”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上海郊区土改全面开展后进行的。在这之前，党内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饶漱石，适应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夸大江南农村特别是大城市郊区与资产阶级联系较多的特点，借口“避免震动城市过大”，束缚群众手脚，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实

行阶级投降。在他搞试点的个别地区，出现过划阶级时右倾迁就，斗地主时“严格控制”，没收地主土地、房屋重新分配时搞“先留后分”，以及在土改后期不发动群众进行复查等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土改运动中的这种右倾错误。“七一”地区的土改，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的。但是，在群众性的土改复查中，也发现饶漱石“和平土改”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个别地方仍有影响。例如，少数地主、富农该划而没有划，有的地主该斗而没有斗，或者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土地、房屋，有的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没有被打下去。在复查中，群众对这些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坚决要求纠正。但是，某些基层领导未能从路线上认识这一问题，仅作为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就事论事地作了一些处理，因此给以后的工作留下了后遗症，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当然，这不是主流。从整个“七一”地区来看，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经过群众性复查，七宝镇召开了庆功大会，标志着整个“七一”地区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从此，这里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世代受苦受难的农民从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下解放了出来，翻了身！人们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唱出了动人的歌谣：

土改锣鼓村村响，
农民分田喜洋洋；
千年封建连根拔，
拨开云雾见太阳；
幸福全靠毛主席，
翻身不忘共产党。

农村的主人

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七一”地区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的新高潮。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普遍推行爱国公约”、“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和“经常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单是七宝镇，参加签订爱国公约的就有一千五百八十九人，全镇人民共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款二万零九十三元，慰劳中朝战士和慰问志愿军家属献金二千三百九十五元，还写了三百多封慰问信。青年的热情更加高涨，纷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上前线杀敌。龙华区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共九百五十七人，被批准的二百五十七人，其中“七一”地区被批准的青年就有五十五人。

经过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农民和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同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提高了农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方。他们说：“一颗粮食就是一颗子弹，我们要多产粮食，支援志愿军多杀敌！”“过去眼泪滴在地主田里，粮食装进地主仓里，今天汗水流在自己田里，爱国丰产喜在心里，一定要加倍劳动，把最大的劲道拿出来。”宝北乡汪更浪村贫农叶品顺，土改前一家七口只有七分地，土改时分到十四亩，真是喜出望外，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为了多打粮食，他想尽办法试制了壅土锄头等十多种改良农具，还进行了温汤浸种等试验。在国家 and 供销社的支援（包括发放农贷、供应生产资料、推广良种等）下，农民们添置农具、增加用肥、精耕细作，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生产关系的

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土改后的一九五二年,“七一”地区的粮棉生产,普遍比土改前的一九五〇年增产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农民们免去了沉重的地租负担,生产又有了发展,因而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七一”地区农民,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土改以后,农村中的冬学和民校广泛地发展起来,许多农民参加了学习,青少年上学的更多。农村文娱活动也活跃了。农民业余剧团、秧歌队、腰鼓队等各种文艺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采了。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的组织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发展壮大,又有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参加,使加入农会的农户增加到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民兵组织也比土改前有了很大发展。民兵们既是生产突击手,又是土改胜利果实的保卫者。在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中还涌现了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成为各级农会、妇联、青年团和民兵组织中的骨干力量。

土改后的“七一”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广大劳动农民过去是地主的奴隶,今天真正做了农村的主人了。

第二章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

第一节 成立互助组

土改后的两极分化

土地改革的胜利，把封建土地制度变成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七一”地区农村中，除了一部分富农经济以外，大量的的是个体农民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分散和落后的，又是很不稳定的。许多贫农、下中农，依然不能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处境，而少数富裕中农，则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发生着两极分化。这就是“七一”农村在土改后面临的问题。

唐桥乡沈家巷一共有五十八户，其中二十八户是贫下中农，十户中农，十一户富裕中农，此外富农八户，地主一户。贫下中农在土改中分进了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生产有所发展，生活也开始改善，但由于过去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耕牛、农具和资金非常缺少，生产、生活仍有许多困难。当时沈家巷共有九头耕牛、八部水车，富农、富裕中农就占有七头牛和六部车，贫下中农只在土改中分到一头牛、二部车。从几户贫农的具体情况来看，问题更加突出。贫农丁关福，一家六口，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其他四口，一个是八十多岁的祖母，三个是未成年的孩子，都没有劳动力。丁关福过去是当长工的，妻子给人帮佣，也做过奶妈。家里穷得几乎什么也没有，做田里活，农具还

是借用的。土改中分到了十二亩地，一家人欢天喜地，但是锄头、铁锸不齐，生产上缺这少那。又如贫农赵龙秀，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姑娘，爷和娘都六十几岁了，一家三口，过去主要靠编结收入勉强度日。土改中分到了地，很想把地种好，但是既无强劳动力，又缺少必要的农具。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对自然灾害固然无力抵抗，遇到疾病、死亡，情况就更严重。贫农杨雨香、杨仲香，两兄弟夫妻四个，年纪都已五十左右了，加上七十来岁的爷、娘和收养的一个小孩，一家七口。土改时分到了十三亩地，日子比过去好了，不料爷娘先后因病去世，医药丧葬费用，使他们一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偏偏两对夫妻又都体弱多病，地里重生活没人做，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日子仍不好过。这些事实表明，小农经济好比“草上露水瓦上霜，风吹日晒不久长”，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地。

党和人民政府对贫下中农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是十分关心的。对一些困难户，不但减免了农业税，而且在生产上给以无偿支援，生活上发给救济口粮。沈家巷和汪更浪两个村，在土改后第一个冬天，政府发给的救济粮和种子，就有大米一千斤，麦子三千二百斤，蚕豆一千二百斤，黄豆一百斤。但这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本身固有的矛盾。

另一方面，沈家巷某些劳动力强，耕牛、农具比较齐全，家底子厚实的富裕中农，凭着自己有一些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十分向往富农的经济地位，土改的暴风雨过去以后，“发家致富”的欲望便一天天抬头。他们利用自己的耕牛和水车，替贫下中农犁田、打水时，还是按照解放前惯例，索取很高代价，一个牛工，要换四到六个人工。包打水代价更高，牛车户一般要得收成的四成；如果兼代施肥，要得收成的一半。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剥削。贫下中农对这种状况是很不满的，他们说：“穷足穷，勿搭牛伴

工。”“贫农做得团团转，勿如富裕中农在牛屁股后转一转。”有一个富裕中农，就是靠着一头牛、一部水车，迅速地赶上了当地富农的经济水平。另一个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更加突出：他本来有轧花机，农闲时代客加工。土改以后，他将全部土地雇工耕种，又雇工经营轧花作坊，低价收购籽棉，轧成花衣（皮棉），搀进碎棉籽和水，然后高价卖出，非法牟利。他的经济状况已远远超过一般富农。

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七一”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处在西北边的沈家巷村是这样，处在东南边的南阮家厍也是这样。这个村，土改后经济状况迅速上升接近富农水平的有五户，占全村农户的百分之十四；经济状况明显下降的有十二户，占全村农户的百分之三十。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卖地的现象，例如宝北乡沈家塘村下中农沈进生，因为妻子去世，在生产、生活双重困难情况下，把自己原有的一亩多土地卖掉了。

正如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虽然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是小农经济两极分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发展，新富农已出现，而不少贫下中农却仍然处于贫困地位。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但农业生产不能迅速发展，满足不了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甚至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胜利果实也会重新丧失。那些因失去土地而贫困破产的贫下中农，将埋怨工人阶级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那些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富裕中农也会越来越背离工人阶级。工农联盟有被破坏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

事情很明显，土改以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摆在农民面前的一个尖锐课题。

毛主席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密切地注视着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动向，反复地向全党强调，土改后要“趁热打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互助合作包括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三种形式，而以生产合作为基础。毛主席说，有了这些合作形式，“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极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土改以后狂热地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即雇工自由、买卖土地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发展富农经济是长期的政策”等。饶漱石在华东地区公开提倡“四大自由”，胡说“发展富农经济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们妄图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农村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土改后，农村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组织起来

“七一”地区的广大农民，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组织起来。

在这里，农民历来有伴工互助的习惯。他们为了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在劳动人手不够时，就请亲友邻居互相帮助，叫做“伴工”。这种伴工互助，虽然属于自发性质，也没有固定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民中有一种通过共同劳动来搞好生产，求得共同富裕的愿望。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公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

决议,为广大农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这里广大贫下中农的共同愿望。《决议》号召各地各级党委领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逐步前进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它的第一步,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集体劳动组织,就是互助组。互助组一般由几户到十几户组成。在组内,劳动时互相帮助,并按等价交换原则,以工换工,或者付给代价。《决议》下达后,龙华、新泾两区,分别举办了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一九五二年初,互助合作运动就在“七一”地区开展起来了。

按照《决议》关于“用种籽、肥料和农具贷给农民,从而帮助他们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指示,国家银行在供销合作社的配合下,发放了大量农业生产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单是龙华区一九五二年发放的春贷,就有豆饼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三张、化肥一千五百二十七斤、粪肥四千三百四十三担、稻种五千七百六十九斤、棉籽一万零六十六斤、锄头四百七十五把、铁镢四百六十六把、水车三十八部、耕牛二十二头,折合人民币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元。这对互助合作运动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首先起来带头组织互助组的,是贫下中农。象前面讲到的沈家巷贫农丁关福,和另外五户贫农,积极酝酿建组就是一例。这六户贫农,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他们根据亲身体会,感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解决困难,只有互助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起来组织互助组。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严重的斗争。一些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农户,主要是富裕中农,觉得经济上比贫下中农优越,政治上又比富农要好,多半相信单干。至于敌对阶级,自然极度仇视互助合作,力图破坏。尤其是一些富农,他们在土改后还保持着比较优厚的经济

力量，在刘少奇“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撑下，更是明目张胆地从事资本主义活动。

在沈家巷，就有六户富农凭借“贸易自由”，大搞投机贩卖，牟取暴利。他们中有的在上海的私商豆腐作坊里投资，搭上“关系”之后，每天买进两桶豆渣（每桶三百斤，每百斤八角），用自行车踏回来，兑上一倍水，搅搅匀，六百斤变成一千二百斤，再以每百斤二元的高价，转卖给青浦、松江一带的养猪户。一进一出，每天净得暴利近二十元。他们获取了大量非法收入后，又去放高利贷，有时还大吃大喝，宣扬“只要手里有钞票，管它田里长野草”的资产阶级思想，引诱群众弃农经商。在这些富农分子的影响下，沈家巷附近南车、北车、唐家浜桥等村的一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也搞起资本主义活动来了。他们到青浦、浦东贩来黄豆，加工榨油，然后高价出卖豆油和豆饼，获利一到二倍。这股歪风刮得这几个村很久组织不起互助组。

有的富农，凭借“雇工自由”，用高价雇工，阻挠互助组的建立。当时农民之间换工，一般是八角到一元一工，而富农雇工，却出到一元二、一元五。有个富农分子，甚至出到一元八角一工，并煽动说：“现在有的人对吃鱼肉饭、拿工钱的事（指帮工）勿做，倒要去做没啥吃的（指互助组），寿（傻）来！”她还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拉拢老帮工：“现在工钱出到一元八了，一个人总归要讲点‘良心’哦？”这个富农对丁关福等贫下中农要组织互助组，冷嘲热讽，横加攻击，说他们“锄头象‘挖耳’，铁镢象‘狗牙’，互助组倘若搞得不好，猫也要笑瞎眼乌珠”。

对于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贫下中农极为愤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丁关福和贫下中农一起，严肃地斗争了那个富农分子。他豪迈地说：“哪怕锄头小，组织起来力量大！”贫农徐玲娣尖锐地揭露说：“富农分子出大价钱雇工，为的是啥？这是

钓鱼上钩！解放前，我们替地主富农做工，磨断了腰，吃足了苦头，得到点啥？现在毛主席领导我们组织起来，富农分子却拚命要拉过去，这是存心拆我们的墙脚！他们还讲啥个‘良心’，地主富农只有狼心！他们巴不得我们永勿出头，永远受地主富农的剥削，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当！”同时，贫下中农对少数跟着富农走的富裕中农，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鼓励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斗争，打击了阶级敌人，教育了群众，贫下中农志气大发扬。丁关福这六户贫农，怀着无限信心，遵照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教导，首先建立了互助组。接着，徐玲娣等也组织了互助组。在“七一”地区，最早组织起来的，大多是贫下中农和困难较多的中农。

毛主席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互助组在天主教徒比较集中的电讯乡，也冲破重重困难，相继建立起来了。在这个乡，不仅有刘少奇“四大自由”的干扰，而且有天主教内反动势力的抵制，办互助组时阻力很大。但是，绝大多数农民教徒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李家木桥村的下中农、女青年李福宝，出身于教徒家庭，是一个青年团员，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组织互助组，遭到了反动势力的百般阻挠。反动神父多次恫吓她，并通过她的家庭，对她施加压力。但小李不屈不挠，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向家里人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伟大意义和党的宗教政策，终于在李家木桥建立起第一个互助组。

就这样，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第一批互助组诞生了，社会主义萌芽在“七一”地区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了。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到五月，共办起了五十五个互助组：电讯乡（这个乡全部在“七一”地区）二十二个，宝北乡（这个乡不全在“七一”地区，这里指在“七一”地区内的部分，以下各乡同）十个，宝南乡九个，唐桥乡

十二个，虹南乡二个。

“七一”地区第一批互助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起来的，基本上贯彻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随着运动的发展，互助组不断地壮大。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也出现了少数所谓“强找强”的富裕中农互助组。不过，这种互助组最后不是变了性质，就是垮台了事。唐桥乡汪更浪村两个互助组（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一个全是富裕中农）的不同发展结果，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汪更浪村下中农丁永林，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一共五户：三户下中农，两户富裕中农。五户当中，四户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下中农赵凤英是个老妈妈，劳力差；她儿子丁洪周，患血吸虫病已到了后期，挺着个大肚子，走路都喘气，困难最大。下中农丁洪山，夫妻两个，有劳动力，但小孩多。丁永林的情况，同丁洪山差不多。另外两户富裕中农，其实是一家：一个娘、两个儿子。因为大儿子娶了媳妇同娘分开过，所以算两户。娘叫汤桂珍，脚有残疾，带着才十来岁的小儿子，所以也有困难。唯一没有困难的，是她大儿子这一户，一对青年夫妻，还没有孩子。

同村另有两户富裕中农，都是夫妻两个，年轻力壮，还没小孩，再加耕牛、农具、资金俱全，生产条件很好。他们看到国家把肥料等物资优先供应给互助组，也想办个互助组。但是他们不愿意同贫下中农、尤其是困难户搭班，怕吃亏；而两户又成不了组，就去鼓动丁永林互助组里的那一对青年夫妻跳组，正好对方的心思同他们差不多，彼此旗鼓相当，一拍即合。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三户富裕中农的互助组。这个组，三对青年夫妻，村上人都喊他们是“夫妻组”，看来是兵强马壮，门当户对；而丁永林这个互助组，困难似乎要大得多。

事情的发展却并不如此。

丁永林互助组是困难户同困难户互助。大家想的是：如果不互助，困难就不能解决，因此大家能顾全大局，互谅互让。富裕中农互助组是强找强，为了自己不吃亏才凑在一起，吃亏的事谁也不干。

丁永林互助组按农作物成熟先后、地块远近，统一安排劳动。如麦收时，大家说：看啥人家麦子先成熟，就帮啥人家先割。富裕中农组却争先恐后，唯恐自家地里收割晚了，遭到雨淋，就会受损失。有时看来很“大方”，比如今天决定锄地，看看天要落雨，大家就你推我让：“今朝我替侬做！”其实锄好地，一场雨，土又板结了，生活白做，工钱却要照付。

丁永林互助组里，替人家做同样很认真。在富裕中农组里，替人家做时心里打鼓：多做了怕耽误自己的地，少做了又担心要付工钱出去。替自家做时认真细致，替人家做时马马虎虎。因此，你替我做时我不放心，我替你做时你不称心。

结果，丁永林互助组越办越好，富裕中农组越办越僵。丁永林互助组获得了丰收，大幅度增产：棉花亩产从二十三斤提高到四十斤，小麦亩产从八十多斤提高到一百七十多斤。区人民政府表扬了这个互助组，还奖给了一匹马，贷给了一部风打车。富裕中农互助组却再也“互助”不下去了。经历了这场教训，这三对夫妻的认识都有了提高。原来跳组的那对夫妻要求重回原组，另外两户也表示要参加丁永林互助组。丁永林互助组看到他们的思想有了转变，本着团结中农的政策，同意他们并组。接着，又有好几户贫下中农要求参加。这样，丁永林互助组发展到了十二户。

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互助组尽管只是社会主义萌芽，也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依靠社会主义思想。丁永林互助组所以办得好，因为他们有贫下中农作为骨干力量，发扬的是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互助组所以办不好以至散伙，因为参加组的全是富裕中农，他们想走的还是个人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

互助组越办越多

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开展，社会主义萌芽到处生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进一步激化了。

富农分子由于他们的资本主义活动越来越受到限制，更加猖狂地破坏互助合作运动。宝南乡马家巷村一个富农分子，处心积虑，阴谋搞垮互助组。他到处向人讨好，“主动”借钱给人，等到农忙时，他就要人替他做工抵还债务，拆互助组的台。村里互助组的一个贫农女青年，同组内几户中农换工，她先替他们割了几天麦，轮到人家替她挑麦时，却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原来那几户中农被那个富农拉走了。她只得自己挑，仅仅挑回一小部分，偏偏接连几天下雨，大部分麦子搁在田头烂了。这类事情不止发生过一回，弄得有的互助组几乎垮掉。

虹南乡号上的几户富农，公然煽动一些人闹事，还搞假“互助组”，妄图阻挡社会主义的洪流。他们过去对于抢季节种蔬菜，赶时鲜赚高价，都有一套“诀窍”。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后，他们没有那么自由了，比如种菜最需粪肥，过去市区来的大粪，几乎都是他们包了的。现在，供销合作社设立了大粪站，有组织地供应，首先是满足互助组的需要，不让自由买卖了，这帮富农认为断了他们的“财源”，十分恼火。于是，他们背着贫下中农，四次密谋，商讨对策。有的叫嚣：“大粪弄不到，农业税就不交！”有的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指贫下中农）靠点啥？不过是成立了互助组。”有的制造舆论，说：“富农经济允许长期发展嘛！”于是有人

提议，也来搞个“互助组”干干。他们凶相毕露地叫嚷：“我们也要组织起来，不然没有出头日脚了！”并策划向政府“请愿”，要大粪。这一小撮家伙，指使他们的家属，先到乡政府，后来又向北新泾大粪站去吵吵闹闹。在遭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严肃驳斥后，他们并不死心，阴谋抢粪，被人揭发，没有得逞。不久，他们还自说自话，成立了一个“富农互助组”。

敌人从哪里进攻，就在哪里把他打下去！广大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支持下，彻底揭发、批判了一小撮富农分子的罪行。号上的贫农、互助组员王林琴愤怒地说：“在旧社会，我们穷苦农民受尽地主富农剥削，真正没有出头日脚。现在不让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也叫‘没有出头日脚’。他们要啥‘出头日脚’？就是要把我们穷苦农民重新踩在脚底下，永远受他们剥削！他们也叫‘组织起来’，他们组织起来做啥？是要同我们斗争。我们一定要把互助组办好，永远不让地主富农再骑在我们头上！”贫下中农的有力回击，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个“富农互助组”也被禁止活动。

在电讯乡，隐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眼看在李福宝等人带头下，越来越多的农民教徒参加互助组，连他们一直认为能够施加影响的顾家塘，也有一些贫农青年起来组织互助组，感到十分恐慌。他们为了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竭力散布“天命”思想，说什么“人有千算，不如天主一算”，“吃的穿的，田里收的，都是天主给的。”还恶毒地造谣：“共产党要共产，互助组的收成将来全要归公”，阻挠教徒参加互助组。同时玩弄花样，增加宗教活动，来限制教徒的行动。例如“望弥撒”（天主教的主要宗教仪式），本来每星期日一次，后来增加到每周几次，逢星期日不准教徒参加生产劳动，说是“天主规定的休息日”，还强迫教徒每天早上集中到七宝天主堂念经，教徒们一个来回，半天时间不能下田

干活。

反动神父对于顾家塘带头组织互助组的青年团员顾鸿祥，更是恨之入骨，蒙蔽了一些人对他进行围攻，甚至阴谋加以暗害。小顾在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支持下，团结进步青年，坚决斗争。一九五二年冬天，一个反动神父利用宗教活动，公然攻击我党和人民政府，小顾挺身而出，怒斥无耻谰言。那个家伙竟然指使爪牙殴打小顾。在许多青年支援下，小顾针锋相对，英勇斗争，并要把那个反动神父扭送到乡政府去，那家伙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走。广大群众的坚决斗争，给天主教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使一些受蒙蔽的教徒擦亮了眼睛，更多的人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组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显示出单干户所没有的好处。

单干户的根本弱点，是一家一户，力量太小。象沈家巷丁关福互助组的六户组员，单干时每户都有不少困难，有的简直很难搞好生产。组织起来以后，尽管人还是那么多人，地还是那么多地，但是六户力量加在一起，可以集中使用，适当安排，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在夏收、秋收时节，收、种、管也都比较有保证了。有一回，夏收割麦，大家刚把一户组员的麦子割好，突然天气变了，眼看要落雨，便立即改变决定，先把割下来的麦子收回去。由于人多，很快搬运完毕，避免了损失。当时这里有几句顺口溜说：“有了互助组，劳动两个快：一是种得快，一是收得快，单干户末急煞快！”在互助组内，又可以使强、弱劳动力有所分工，取长补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互助组的一个劳动力，往往抵到单干户一个半到两个劳动力。

互助组是农民在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多有商量，因此比单干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例如，党和人民

政府推广良种和新的技术措施，一般单干户，顾虑重重，怕弄不好损失不起，往往不敢轻易采用。互助组各方面的力量比单干强，敢于打破陈规，进行科学试验。如李福宝互助组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带头试种了五亩半改良棉（岱字棉），秋后平均亩产达到四十四斤，比单干户种的本地棉高出一倍。

互助组通过共同劳动，初步培养了集体观念。有的互助组还把这种集体的互助合作精神发扬到组外，对单干户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宝北乡赵家巷村一个单干户，种了两亩黄豆，因为连天大雨，两次烂芽，眼看季节不再等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同村一个互助组替他抢种了第三次，获得成功。他感激得热泪盈眶，连说：“互助组好！毛主席教导就是好！”又如李福宝互助组用喷雾器帮一个单干农民治虫，使他从此成为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

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还从许多互助组获得较好收成、组员收入普遍增加、一般都超过单干户的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李福宝互助组成立后的第一年，除了棉花获得丰收以外，水稻平均亩产超过一般单干户一百到二百斤；小麦平均亩产超过一般单干户六十到一百多斤；黄豆平均亩产超过一般单干户二十到八十斤。由于生产发展，这个互助组每个劳动力当年平均收入超过一般单干户四十元左右。

激烈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广大农民群众；互助组的优越性，又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这都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到一九五三年春天，“七一”地区建立起来、并且巩固下来的互助组，共有一百多个。其中天主教徒最多的电讯乡有三十七个，参加农户二百二十户，占全乡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强。

第二节 大办初级社

突破互助组的形式

一九五三年秋天，“七一”地区掀起了一个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热潮。龙华区、新泾区和各乡党组织派出的宣传员，深入到各个村庄和七宝镇，到处张贴了标语、漫画，办起了墙报、黑板报、土广播，演出了沪剧、活报剧，有的地方还举办了展览会、报告会，党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深入人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通过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总路线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代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并消灭富农剥削，这就是“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的心愿。

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七一”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发展，农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农民生活也有不少改善。但是由于互助合作运动开展的时间不长，又受到了刘少奇“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里的农民还有近一半没有组织起来。个体劳动、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仍然大量存在。这就使得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不可能迅速发展，农民生活也不可

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另一方面,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虽然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富农的剥削,但是,还没有能堵塞富农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一切孔道。富农往往通过粮食的自由市场,同城镇奸商勾结起来,进行投机倒把,并诱使那些余粮户(大多是富裕中农),不把余粮卖给国家,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一些富农分子,经常以高价买进粮食,存到七宝镇资本家的米行里,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的一次就非法买进十八石大米,与奸商一起,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粮食的黑市交易,一天就发现过七、八起。这种状况的存在,既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也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要。

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粮食,稳定粮价,消灭粮食投机,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促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冬天,政务院发布命令,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

在“七一”地区,各级党组织都把学习和宣传总路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教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并且引导农民从旧社会的苦难与新社会的幸福,从小农经济的苦处与互助合作的好处,从富农和奸商对农民的危害与国家 and 供销社对农民的帮助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回忆对比,从而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他们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决心。农民群众从回忆对比中看到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们说:“奸商和富农诱骗我们不把余粮卖给国家为了什么?就是要我们走回头路,要是没有国家掌握粮食,没有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我们农民就要吃大亏,上大当。”他们还深有体会地指出:“互助合作和统购统销,就好象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腿,缺一条也不行!”

广大贫下中农认识提高后,对那些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

阶级敌人立即开展了斗争。在宝北乡卢家塘村有一个富农分子，把七百多斤余粮藏在搁楼上和猪棚里，拒不出售。贫下中农查获了暗藏的粮食，在他家门前开了“展览会”，当场斗争了这个破坏统购统销的家伙，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纷纷带头把余粮卖给国家。他们说：“我们不把余粮卖给国家，工人老大哥吃什么，国家怎样建设？”宝北乡冯家角村一个贫农出售余粮后，想起还有一小鬻米没有算进去，马上拿出来卖给了国家。贫下中农的先进行动教育和带动了中农。有一个中农，大家评他出售十石米，他自动出售了十二石。原先一些不肯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裕中农也出售了余粮。“七一”地区很快掀起了向国家出售余粮的热潮。各村农民用肩挑、车运、船装，成群结队地把余粮送到国家粮食收购站，普遍地超额完成了统购任务。

在总路线教育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统购统销又大大削弱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单干农民，纷纷要求组织互助组，已经参加互助组的农民也越来越不满足互助组的组织形式。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互助组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了。

同单干户比较，互助组是有许多优点的，它使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互助组毕竟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经营还是分散的。当广大组员要求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时候，互助组内部的集体劳动与分散经营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首先，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经常发生先做后做的矛盾。农业生产季节性是很强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象种水稻，在关键的时候，上午插秧和下午插秧，就可能影响产

量。又象蔬菜，先种后种不仅对产量的影响较大，而且因为“时鲜货”和“落令货”的价格不同，对组员收入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从互助组诞生的那天起，先做后做的矛盾就产生了。尤其是，随着互助组一天天发展，较多的富裕中农参加进来，他们或是强调自己的田多，或是因为贫下中农要借助于他们的耕牛、农具搞生产，总想在互助时占先，这就势必与贫下中农发生矛盾。在一些富裕中农之间，先做后做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如在一九五三年夏收中，沈家巷的一个互助组，麦子都已割了下来，准备挑回去。这时，乌云密布，天要下雨了。两个富裕中农在田头争吵起来。一个说：“我的田远，挑迟了来不及，应该先挑。”一个说：“路近挑得快，应该先挑。”双方对峙着，各不相让。时间过去了很久，还没争出个结果。雨终于下了起来，麦子淋湿了，最后烂掉了不少。由于先做后做的矛盾，有的互助组出现所谓“春组，夏互助，秋垮台，冬不见，明年再重来”的现象。

其次，人、畜、农具换工中的矛盾也很尖锐。互助组实行集体劳动，有利于将耕牛和农具统一调剂使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贫下中农缺少牲口和大农具的困难，也可以解决富裕中农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但是，牲口和大农具大多属于富裕中农私人所有，经营又是分散的，如果富裕中农不愿意，互助组就不可能按照组里的需要，对这些牲口和农具统一调剂使用。有些富裕中农常常在人力与畜力的换工中，提高牛工，压低人工，一般要四个人工换一个牛工，有的甚至要六个人工换一个牛工。有些占有大型农具的富裕中农，也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富裕中农占贫下中农便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使贫下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再就是土地、劳力、资金都不能更好地适应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资金有限；土地不能因地制宜，合理种

植；在劳动力使用方面，有时不能统一安排。特别是种植蔬菜，品种既多，又要轮种，同一品种每年要复种多次，有的还要搞温室育苗，由于土地、劳力、资金等不能统一筹划和使用，困难多，矛盾也多。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这个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这一切表明，互助组本身的局限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广大农民群众在互助组的集体劳动中，逐渐产生了集体经营的要求，许多互助组已经自发地行动起来。宝北乡杨夏浜和前场的两个互助组，都集体买了耕牛，共同使用；虹南乡号上村河东互助组，集体开了三亩荒地，统一经营；电讯乡李家木桥的李福宝互助组，不仅集体买了一架喷雾器，养了猪羊，后来还与同村的乔三基互助组合并，成立了联组，等等。互助组的生产关系不断地被突破，党引导互助组向高一级形式——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试办李家木桥初级社

从一九五三年底开始，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精神，中共龙华区委和新泾区委先后派出办社干部到“七一”地区的李家木桥、号上、王家巷三个村子，进行办初级社的试点。

办社干部来到了李家木桥。贫下中农听说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了，无不兴高采烈。不少中农也到处打听合作社怎么办，考虑自己采取什么态度。办社干部组织广大农民学习党中央决议，同时引导大家围绕怎样筹办合作社的事展开了讨论。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所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入社，要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在讨论土地如何入股时，个别中农怕吃亏，主张“拿一部分土地入

社，留一部分自己种”。这种意见一提出就遭到贫下中农的反对。贫下中农说：“要办社，就要把全部土地入股，才能统一经营，搞好生产。不能‘脚踏橄榄两头滑’。”最后，根据党中央决议的精神，决定凡自愿入社的农户，土地全部入股。但允许每户有少量的自留地。对于耕牛和犁、耙、风打车、水车等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分期付款）；中型农具由合作社折价租用，损坏或丢失按价赔偿；小型农具自有自用。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就能解决互助组时期所存在的分散经营和集体劳动的矛盾。社员收益分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一经营的集体生产发展的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劳动农民的集体观念，提高共同劳动的积极性。统一经营还能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劳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实行统一经营，能够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按土地和劳动分红是初级社的基本分配制度。初级社没有根本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保留着按土地分配的成份，即土地分红。但统一经营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使用权分离，从而限制了私有制。初级社的统一经营和集体劳动，体现着社会主义性质，在分配上表现为按劳分配。在讨论分红时，个别中农强调土地的作用，认为土地报酬应该多一些。贫下中农则认为，搞好生产主要靠劳动，应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经过讨论，按劳动和按土地的分配比例确定为劳六土四。土地报酬部分，按照土质好坏和常年产量，把土地定为三等六级，分级定产计酬。并规定土地报酬确定后，在一般情况下，不随生产的发展而增加，即增产部分实行按劳分配。这种分配制度，照顾到贫农和中农两方面的利益，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跟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社员的思想状况相适应的，因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初级社的巩固。

初级社是农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实行这种所

有制和分配制度，体现了我们党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前进的思想。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到来的。”

进行了反复酝酿、讨论以及细致的筹备，李家木桥的干部和群众，根据党中央决议的精神，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搭好了初级社架子，确定了生产、劳动、分配、经营管理等各项制度。经过乡领导审查批准，李家木桥初级社就宣告成立了。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格外灿烂。李家木桥的打谷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庆贺初级社诞生。贫农夏凤娟和她动员报名入社的六户贫下中农都特别高兴，老早就从两里多远的夏家旗杆赶来了。老贫农李访贤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真是脚踏楼梯步步高啊！”这个社是在乔三基、李福宝联合互助组的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由北李、吴家塘、范家塘、南李、夏家旗杆五个自然村的十户贫农、五户下中农、十五户中农、一户上中农，共三十一户人家组成的。全社共有劳动力九十五人，耕地二百九十七亩。经社员民主选举，社务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乔三基当选为社主任，李福宝、李若清当选为副主任。

李家木桥初级社确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三个社主任，其中两人是由贫下中农出身的党、团员担任的，十一个社务委员中，有三分之二是贫下中农。同时，团结了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富裕中农李若清，办互助组时就主动将自己的耕牛牵到组内，供集体使用，帮助缺乏畜力的农户解决困难，平时办事公道，社员群众选他当了合作社的副主任。

李家木桥初级社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当地农村的社会主

义阵地，限制了富农剥削。有一户富农，初级社成立前，每年大忙季节，要雇近百个人工，现在已很难在社外雇到工，从社里拉劳动力搞雇工剥削也不可能了。

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李家木桥初级社一成立，就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

一九五四年春天，阴雨连绵，田里积水排不出去，又不好施肥，棉花地里杂草丛生。在社务委员们的带领下，根据社员性别、体力强弱，在全社范围内合理调配劳动力，成立了五个生产组，很快地排除了积水，给六十一亩三麦下了肥，九十多亩油菜浇了一千担大粪，又灌了一次河泥浆，还在七十亩棉花田里锄了草，充分发挥了初级社的集体力量，战胜了灾害性的天气。

“人要饭养，稻要肥长。”夏天，上百亩晚稻快要插秧了，需要大量基肥。由于初级社有了生产计划，大力发展养猪，并及早发动社员捞水草，大积绿肥，因此，就为晚稻准备了足够的肥料。

为了更好地支援城市，下半年首次试种十五亩山东黄芽菜，经过精心培育，细致管理，克服了经验不足的困难，当年获得亩产六十担的好收成，收入现金四千元。单是这一项，每户平均就可分到现金一百元，既增加了对城市副食品的供应，又增加了社员收入。

秋后，稻谷登场，棉花入库。当年水稻平均亩产六百斤，比互助组时期增加百分之二十。棉花平均亩产六十斤，比互助组时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加上蔬菜生产和养猪收入，年终分配时，社员收入有了显著提高。寡妇李大嫂，一个人拖四个小孩，这一年的收入，比入社前一年增加八十元。她激动地说：“还是合作社好！”

随着生产的发展，公共财产也增加了。这一年，李家木桥初

级社有母猪五头、肉猪一百二十八头、猪棚七间、水牛四头、喷雾器五架、大型温室两间、农船一只、拖车三辆、双铧犁一部、柴油抽水机一台。合作社的家业大了，力量更雄厚了。社外的单干农民，主要是对合作社持观望、怀疑态度的一些中农，看到合作社确实比单干强，也想入社了。到年底又有六户中农参加了合作社。李家木桥广大社员群众更加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从一九五三年底到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除了李家木桥初级社外，号上初级社、王家巷初级社，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三个试点社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七一”地区的互助组和许多单干农民。李家木桥初级社副主任李福宝多次到区里、市里介绍经验，还到附近的兄弟村帮助办社。来李家木桥参观的人也络绎不绝。典型示范是对农民最实际、最有效的教育。人们到处议论合作社，传颂合作社。贫下中农要求办社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起来。

合作社大发展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在试点的基础上，“七一”地区掀起了大办初级社的高潮。各乡的贫下中农，拿了土地证，写好了申请书，涌到村干部家里，要求参加合作社，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开玩笑地说：“干部屋里的门槛都被踏夷（平）了。”宝南乡贫农李凤珍，解放前租种地主五亩地，吃了上顿没下顿，入社最坚决。丈夫没想通，她就忆苦思甜，说服他入了社。一个女青年出嫁到婆家，婆家还没入社，她耐心说服全家参加了合作社。区乡干部走到哪里，贫下中农就问：“你们是不是来办社的？”并说，“我们不办社没有出头日脚。”有些贫下中农甚至等不及批准，就扛

着农具跟着合作社社员到田里去干活了。在贫下中农带动下，整个“七一”地区都沸腾起来了。

农业合作化的洪流奔腾向前。刘少奇一伙又怕又急，伸出了破坏的黑手。他们搞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来打击广大贫下中农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同某些地区一样，“七一”地区农村也发生了排斥贫农入社的怪现象。然而，走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谁也拦不住！在宝北乡，贫农彭书芹老妈妈冲破重重阻挠参加合作社的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不可动摇的决心。

一九五四年初冬，宝北乡吴家园等村子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宝联初级社就要成立了。受尽旧社会无数苦难的彭书芹，第一个报了名。可是乡里不批准。她跑到乡里责问乡长：“为什么不让我入社？”这个乡长妄想难倒彭书芹，搬出一连串无理的反问：“你农具有吗？肥料有吗？劳动力有吗？钞票有吗？”彭书芹没有被一大堆“条件”吓倒，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贫农穷，拿不出多少东西，这是旧社会造成的。现在，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互助合作道路，你为啥不许我们走？”这个乡长理屈词穷，只好说：“老实告诉你，不许你参加合作社，是上面的意思。”彭书芹听到用“上面”来压她，更加气愤，她毫不动摇，坚决表示：“毛主席指引的路，我就要走！”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她又到区里反映情况，区委纠正了宝北乡不准彭书芹和其他四户贫农入社的错误，并揭露了那个乡长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依法惩处。原来这个乡长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分外卖力。他借审批宝联初级社的机会，实行阶级报复，一下子砍掉了五户贫农，不让他们入社，彭书芹就是其中之一。区干部在宝北乡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当场批准彭书芹等五户贫农入社。彭书芹心潮翻滚，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在会场上热烈高

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随着试点社的巩固和胜利发展，一小部分动摇不定的富裕中农参加到合作社里来了，但是大多数富裕中农仍抱着反对的态度。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一些富裕中农，暗下狠心，想与合作社比个输赢。

一九五四年秋天，村干部、贫农阮世才带头在电讯乡阮家厓办起了一个三十三户人家的初级社，大部分社员都是贫下中农。有一个富裕中农坚决不肯入社，认为同贫下中农搞合作社是“萝卜烧肉”，自己这块“大肥肉”要吃亏，但看到贫下中农入社后兴高采烈，干劲冲天，又很不服气。他暗地里对人讲：“凭着我的好地、壮牛、大农具，赛不过阮世才的‘穷社’，我才不相信呢！”入社的人越来越多了，他感到压力太大，盘算了几天，想出了一条计策：既不入社，又不落单干的话柄。于是拉了几户人家，打出“互助组”的旗号，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群众称他们是“单干互助组”。就这样，富裕中农与合作社的一场“和平竞赛”开始了。

阮家厓初级社的贫下中农，尽管家底薄，耕牛农具都不齐全，但是大家很团结，一个心眼把办好合作社当作摆脱贫困的出路。社主任阮世才经常鼓励大家：“人穷志不短，办合作社是毛主席指的路，我们要走到底！”社员们人人关心合作社，搞好生产的劲头很大。

这一年冬天，合作社为了夺取农业丰收，发动群众挖河泥、捞水草、铲草皮，大积有机肥料，并用政府支援的贷款，盖起猪棚，集体养猪。那个富裕中农看到社里养猪，有点眼热，也买了一批苗猪。合作社统一经营，饲料及喂养能派专人管理，猪养得又肥又壮；而富裕中农一家土地多、劳力少，加上养猪，实在难于安排，结果猪越养越瘦，成了“排骨猪”。

第二年春天，落秧季节到了，合作社用了“稀落谷”的新技术培育秧苗。那个富裕中农，自信种田有经验，不相信科学，仍用老办法“密落谷”，还说什么“祖宗三代就是这样过来的”。到了早稻孕穗季节，社里的稻子葱绿苗壮，那户富裕中农的稻子却又矮又细，但他仍不服气，说：“哼，啥人输，啥人赢，现在还很难讲。”

秋天，棉田发生虫害。合作社人多力量大，用农药喷杀，虫害很快就消灭了。而那户富裕中农单枪匹马，顾了东，丢了西，眼看虫害蔓延，还是合作社帮他喷洒了农药，才抢救过来。

到一九五五年秋收，这场竞赛终于见了分晓。阮家厓初级社获得了大丰收，水稻和棉花平均亩产分别超过那个富裕中农二百斤和二十九斤。合作社年终分红，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比那个富裕中农的收入超过五十多元。

合作社大丰收把富裕中农比下去的生动事实，进一步教育了周围互助组和单干的农民，人们一批一批地参加了合作社，那个富裕中农也不得不认输，参加了合作社。

富裕中农比赛不过，机会主义路线也阻挡不住，初级社越办越兴旺。一小撮阶级敌人感到站在合作社的对立面去反对合作社不行了，就改变策略到内部来寻找代理人。在号上初级社，富农分子用请客送礼来腐蚀社干部。在中东社，一个富农分子更无耻地用“鬼攀亲”的方法拉拢副主任。尤其严重的是电讯乡朱家塘初级社，发生了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的事件。

反革命分子朱福顺，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是天主教内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家伙。一九五四年七月，合作社成立时，他装出最“革命”的样子，逢人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三心两意”，骗取了群众的信任，混进合作社，当上了财务委员。在社内，他挑拨干群关系，制造事端，并用亲戚关系先把副主任拉

过去，接着通过吃吃喝喝与合作社的会计结拜为“兄弟”，后来又把社主任也拉过去。合作社的大权全操在他的手里。

这个家伙仗着窃踞的权力，大搞资本主义经营。合作社安排种植计划，他砍掉政府规定的粮食面积去种蔬菜，大搞赚钱生意。蔬菜出售后，他与一些同伙私分掉集体的钞票。在他的煽动下，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大搞投机贩卖，有的干脆弃农经商，严重影响了集体生产，合作社被搅得乌烟瘴气。但是，他要搞垮合作社的阴谋并没有得逞，社里其他十六户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整社，重建了社务委员会，推举一个贫农担任社主任，确立了贫下中农在社内的优势。合作社的新领导，在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支持下，改变了以前的错误做法。按照国家的要求，落实了种植计划。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合理安排了副业生产。还将国家贷给的五百元贷款，用来组织生产和安排社员生活。合作社很快改变了面貌，当年便夺得丰收，提高了社员收入，并且还清了国家贷款。那个破坏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朱福顺，因为反革命罪行被揭露，由专政机关依法制裁。

初级合作社就是这样在激烈的斗争中建立起来，并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到一九五四年冬，“七一”地区已有三十二个初级社，入社农户达到八百二十八户，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九，入社人口三千七百九十一人，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这一年，互助组也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并提出了“办好互助组，迎接合作社”的口号。有些互助组合并成立了联组，这种联组已有不少公共财产，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只要跨前一步就是合作社了”。许多互助组积极酝酿办社，联名给乡党支部写了报告，而且家家户户都盖上图章或指印。宝南乡程家巷村的贫下中农，在一个晚上家家都开了家庭会，第二天没等到天亮

就拿了土地证去报名，他们在入社申请书上写着：“服从领导，积极劳动，以社为家，永不退社”，表明了广大贫下中农入社的决心。同时，七宝镇上的大批工人家属，也迫切要求入社。还有一些兼营小商小贩的农民准备歇业入社。原来一些动摇不定的富裕中农，许多人产生了入社要求。各乡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各乡镇具体情况，打算在一九五五年春再发展一批合作社。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 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一九五五年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合作化的热潮遍及全国。正在这时，刘少奇一伙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策划了一个“反冒进”的罪恶阴谋，抛出“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大砍合作社。当时中共上海市郊工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了这条反动路线，提出“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错误口号，把原来在一九五五年春季发展三百四十一个合作社的计划，减掉了二百五十八个。他们看不到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事实，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表示“无穷的忧虑”，认为现有的合作社已在“七处冒烟，八处冒火”，再多办就“冒进”了，应该赶快缠上裹脚布，把脚包得小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新泾区委把原订发展新社的计划一连削减了四、五次。后来干脆规定一条：“一九五五年春季蔬菜地区一律不办社。”原计划在“七一”地区发展合作社的数字，也冻结了，许多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被挡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门之外。

但是，“七一”地区的三十二个初级社日趋巩固和普遍增产的事实，雄辩地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谓“冒进”的胡说。李家木桥、号上、王家巷三个试点社，一九五四年的产量都有大幅

度增加。王家巷初级社，这一年水稻、棉花平均亩产分别比互助组时期增产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五。潘家桥分社三亩多试验田种植“长箕铁秆青”水稻新品种，平均亩产达到一千零六十二斤，创本区水稻产量的最高纪录。李家木桥初级社，经过一九五四年的艰苦创业，也增加了产量，扩大了公共积累，社员的生活大为改善，合作社越办越好。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办社的热情日益高涨，他们说：“合作社比互助组有三多三高：人力多、资金多、财产多，生产高、收入高、威信高。”又说：“不入社，人担忧，地发愁。入了社，两解决。”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群众的办社热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向群众头上泼冷水。他们压缩办社的错误方针，使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正中下怀。虹南乡号上老社附近的鸭场浪合作社，因为迟迟没有得到区上的批准和支持，三户富裕中农首先带头退社，接着又退了五户，等到区上批准时只剩下十二户了。宝南乡张家塘原有三十四户要求办社，上头不批准，一些富裕中农趁机拉拢了一些人，买了十几辆自行车，把种的蔬菜自产自销，进行商贩活动。这些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到“七一”地区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抵制。贫下中农批评乡政府说：“你们天天说灯塔放光芒，现在我们已经看见灯塔的光芒照过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办社？”多数乡干部对上级的“指示”也想不通，当贫下中农申请办社的时候，他们只能用“干部少，经验不足，慢慢来”推托一下。但群众步步紧逼：“你们领导不了，我们自己办！”区里不批准吗？他们不稀罕

这个“批准”：“办起来再讲。批管批，办管办。”为了对付这个“批准”权，群众创造了许多办法。有的把土地并起来，对外不称社，自叫合作社。有的在农具上写了“合作”两个字，不写“社”，如果上头问了，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搞合作组。”许多村庄很快地自发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虹南乡的许家塘（现号上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发生过办所谓“野鸡社”的尖锐斗争。一九五五年春天，许家塘互助组已经发展到有十三户贫下中农和四户中农、富裕中农参加的大组，集体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小猪，并有三百五十元钱的公共积累。紧靠着这个村的号上老社生产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吸引着他们，组里的贫下中农坚决要求办社。为了商量办社，全体组员接连几个晚上开会，最后决定立即向乡里申请批准。

当互助组的三个代表，受全组组员委托，怀着满腔热情，来到虹南乡人民政府时，乡干部感到很为难。去年是他们到许家塘去宣传合作化的，可现在区委的“方针”是收缩而不是发展。怎么办？他们想，最好是既不违背上级意图，又不影响群众情绪，把代表们劝回去。

“你们办社的热情很好，只是现在不能同意……。”

代表们一听乡干部说不叫办社，很不高兴：“我们群众有要求，互助组有三年基础，猪猡已集中，不能办是啥道理？”

“乡里人手少，领导没经验。”

“你们领导不了，我们叫宝北乡领导好了。”

乡干部感到无理可讲，最后拿出了区委的规定：“办社要有三个条件，要有常年互助组的基础，入社的人家全家人人自愿，还要有党员。根据这三条，你们现在还不够。”

代表们并没有被吓住：“三个条件我们具备了两个，党员眼前是没有；但是，我们贫下中农办社确是一片红心。我们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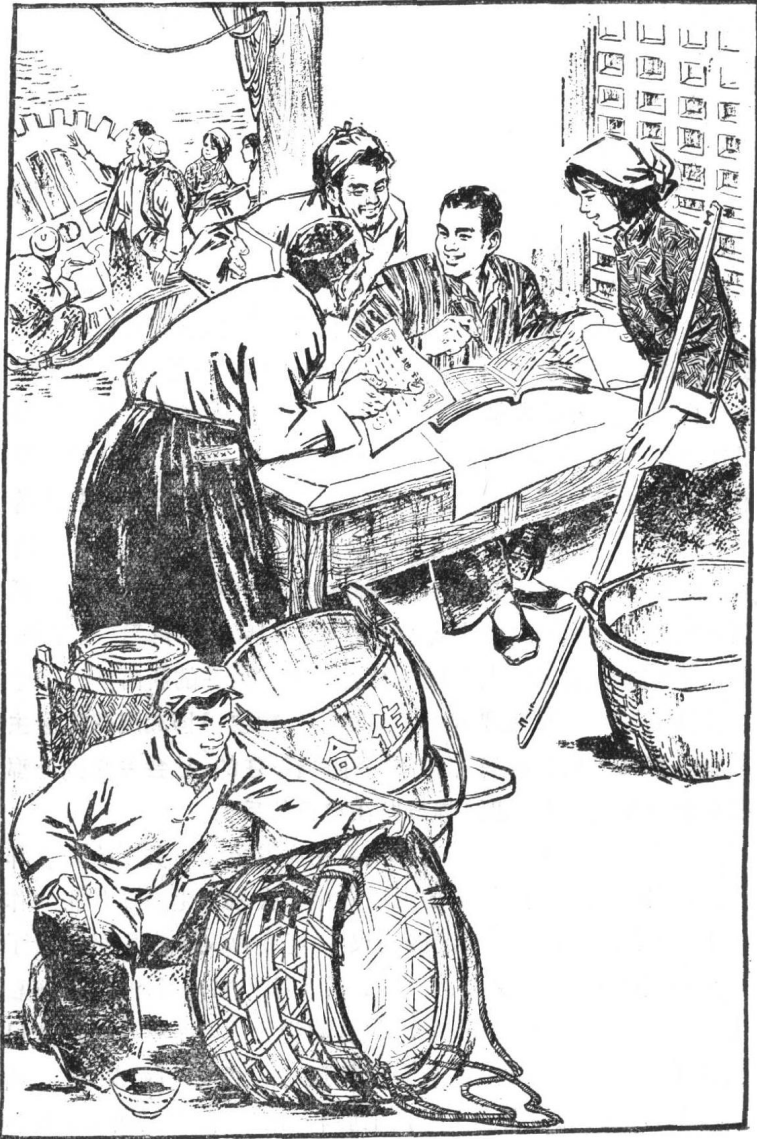
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不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叫我们走哪条路？”

这些响当当的话，驳得乡干部无言对答。只得说：“区里有指示，我们无能为力。”

代表们听乡干部说来说去，最后还是不准，很是气愤，他们坚决表示：“你们不许办，我们自己办！”

乡里不同意办社的消息，对群众高涨起来的办社热情泼了一盆冷水。但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的意志更加坚定：“上面不批准，我们也要办！”大家决定，继续集体养猪，存在银行里的三百五十元公款也坚决不分。并立即着手筹办合作社：推举了社主任；派人到别的合作社学习会计业务；在号上老社的帮助下，按照党的政策，办理土地入股，青苗、农具、耕牛折价归社等事务；实行统一经营，在各方面与合作社一个样。这时刮来一阵风言风语：“不批准的合作社是‘野鸡社’。”许家塘的农民群众豪迈地回答：“管他野鸡社家鸡社，听毛主席话就是好！”这场斗争，标志着“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新高涨，一个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了。尽管，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一九五五年七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主席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指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制订了一整套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着亿万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这篇反映虹



“管它野鸡社家鸡社，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好！”

南乡合作化情况的文章写了光辉的按语：“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最后，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驱散了笼罩在“七一”地区上空的乌云浊雾，给广大群众和干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许多区乡干部学习后，检讨了限制群众办社和排斥贫农入社的错误。他们说：“为了收缩合作社，两面受气轧扁头。背了大半年的包袱，毛主席给我们解掉了。”广大贫下中农更是欢欣鼓舞，他们说：“毛主席好象来过我们乡，每句话都说到了我们心里。”大家听到毛主席把右倾机会主义者比做“小脚女人”时都笑起来说：“对！对！这些人真象小脚女人。”特别是许家塘的贫下中农读了毛主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所写的光辉按语，都无限激动，他们含着热泪说：“我们办‘野

鸡社’的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了，毛主席和我们贫下中农真是心连心！”“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每个角落。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高潮在“七一”农村兴起。那些在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富裕中农，现在也开始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社了。当时正逢郊区旱象严重，农民群众白天挑水抗旱，忙生产，晚上开会忙着张罗办社，真是一片繁忙、热烈的景象。他们说：“现在忙是忙，可忙得开心。”电讯乡一夜就在田埂浪、潘家阁和施家湾办起了三个合作社。在一九五五年春上，没有批准这三村群众办社的乡长王关祥，现在亲自来田埂浪作检查。他话还没讲完，群众一拥而上，争着报名入社。根据乡党支部的意见，他当场批准了三个社的建立。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办社的盛况。到年底，“七一”地区又新办了十八个合作社，加上原有的三十二个社，共办起了五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来的三十二个老社也吸收了不少新的农户参加。象李家木桥地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几个月的时间，整个“七一”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第三节 高级社普遍建立

办起了十一个高级社

一九五六年一月，“七一”地区在实现了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础上，迎来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迅速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

的生产高潮。往年要到春耕前才做的许多工作，现在提前到春节前后来做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冒着严寒天气，下河鬲泥，沤草积肥，搞得热火朝天。群众兴奋地描绘这个情景说：“《纲要》条条鼓人心，积肥备耕抓得紧，捞水草，掘稻根，鬲泥船象出龙灯，肥料堆得密层层，今年增产有保证。”

在《纲要》鼓舞下，各社的干部和社员们胸怀越来越宽广了。他们不满足于在现有条件下搞好当前生产，还要规划未来，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生产，特别是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防治水旱灾害。合作社规划的实施，得到了国家大力支援，区人民政府决定在“七一”地区内兴建每个可灌溉数百亩农田的六个电力排灌站。这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利工程，立即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难题接着产生了：大规模灌溉系统的水渠，无法通过初级社社员们互相交错的小块私有的土地。曾经促进生产发展的初级社，现在又成了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毛主席教导说：“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在巩固和发展初级社的斗争中，越来越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无比正确，初级社矛盾的根子在于土地的私有。

由于土地私有，初级社不能把入股的土地有计划地进行调整、治理、改造。个体农民带进社里来的小块土地，有不少是“插花地”，不但不能使用农业机械，甚至连通常的耕作都有困难。宝北乡新丰初级社有一亩半地远在漕宝路上的七号桥附近，往这块田里挑粪，来回要走一个小时。由于管理困难，往往只能种

一些比较粗放的作物，产量很低。“插花地”还经常因为和相邻土地上的作物不同而产生管理上的矛盾。一九五五年夏天，号上初级社从申新九厂借来一部柴油抽水机向雪菜地里灌水抗旱，水要流经邻社一片不缺水的毛豆地，邻社不同意，号上社只得摺下抽水机，花了八个劳动力，整整挑了一天水。有的“插花地”，又是所谓“箱子地”，四周都是别人的高地，早了灌不进，涝了排不出。宝南乡秧田初级社就有四十亩“箱子地”，每亩只能打二、三百斤粮食。他们很想开一条大渠，但因土地所有者不同，一直开不成。

由于土地私有，初级社实行“土地分红”，它与按劳分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土地报酬拿得比较多的，是富裕中农和中农，而合作社的增产和收入的增加，则取决于劳动。凭土地多就多拿报酬，这是靠生产资料私有权占有了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个问题长久不解决，势必影响大部分社员、主要是贫下中农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洮东初级社贫农社员赵金文，全家四人参加劳动，入社土地十二亩，一九五五年得到土地报酬一百七十三元。同社的一户中农，也是四人参加劳动，但土地比赵金文多了五亩半，土地质量也比赵金文好，因此，所得的土地报酬有二百五十七元，比赵金文多了将近百分之五十。土地报酬的存在，也造成土地较多的富裕中农和中农对土地的依赖观念，他们的出勤率往往低于贫下中农。就是这户中农，全家四个劳动力，一年只做了三百九十四个劳动日，而劳力相同的贫农赵金文家，却做了五百五十一个劳动日，超过那户中农的百分之四十。因此，以土地私有而取得土地报酬这种做法的长期存在，不但会影响广大贫下中农的生产热情，对于进一步调动土地较多的中农的生产积极性，也是一种障碍。

初级社的这些矛盾表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废除土地

私有，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

把初级社变为高级社的关键问题是取消土地分红，这首先涉及土地较多的富裕中农。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初级社生产和收入的迅速增长，按劳分配的比重大大提高，社员收入日益接近或达到富裕中农的水平。已经入了初级社的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党的教育下，也逐步认识到高级社比初级社好，合作化道路是“上楼梯，步步高”。如李家木桥初级社，建社后第一年（一九五四年）的分配中，全社按劳分配部分总金额为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一元四角，按土地分配的部分的总金额为四千七百二十七元六角四分，土地报酬数是劳动报酬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一九五五年，这个社进一步增产。根据“增产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年终分配中，按劳分配的总金额达到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九元，比去年增加了近两倍，而土地报酬因是“一年定死，长期不变”，仅因接受了六户新社员而增加了一百六十七元二角，于是两者的比例就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土地报酬数为劳动报酬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下降为百分之十四点八。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这个比例还要继续下降。生产发展越快，土地报酬所占比重也越小，而社员的收入水平则越来越高。富裕中农看到了这个趋势，对于取消土地报酬，转为高级社，不少人改变态度表示赞成。

各初级社的广大贫下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最坚决，他们强烈要求由半社会主义进入完全社会主义，办高级社。还没有加入初级社的许多互助组组员纷纷表示：“要三步并作两步走。”不少单干农民也提出“要一步登上三层楼”。整个“七一”地区出现了办高级社的热潮。

为了适应大办高级社的形势的需要，中共新泾区委和龙华

区委先后召开了区内初级社负责人会议，部署办高级社的筹备工作。“七一”地区参加会议的五十个初级社主任，在有关乡党委领导下，分别组成了十个高级社筹备委员会，带领广大社员群众，突破初级社的社界，修筑渠道，办起高级社来了。

“七一”地区的党组织在办高级社过程中，贯彻执行了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政策。

毛主席、党中央对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给予了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国家拨出专款，设立“贫农合作基金”，贷给有困难的贫下中农，为广大贫下中农加入高级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条件。马家巷村贫农陆福余，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入社应缴纳股份基金六十元。但陆本人有病，三个小孩中两个小孩也有病，另一个小孩只有一岁，陆的妻子为了照顾病人和小孩，经常不能下地劳动，经济很困难。当他们俩正在为缴不出股份基金而担忧时，国家给了他们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六十元，他们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七宝镇郊的北横沥村，有三十七户得到了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一千七百七十一元，平均每户近四十八元。这样就使得许多贫下中农顺利地进入高级社。富裕中农不得不承认：“贫下中农有国家撑腰，腰板硬。”贫农合作基金对于确立贫下中农在合作社中的政治优势，巩固同中农的团结，以及促进合作社生产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广大贫下中农极为感动，激励着他们更加英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对于大部分还在单干的富裕中农，各级党组织落实了自愿互利的政策。几年来，这部分富裕中农多少看到了一些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在宣传农业发展纲要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又接受了教育，所以，当办高级社的洪流滚滚而来时，也就被卷了进来，要求入社。有一些人，经过仔细盘算，感到留在社外搞单



突破初级社的社界，修筑渠道。

干不行了：缺劳力，雇不到工；缺肥料，买不到粪；国家规定了统购任务，又不好爱种啥就种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报了名。但他们总以为自己“兵强马壮”，高级社要靠他们的耕牛和大农具搞生产，入社时讨价还价，想捞点好处。

合作社为了正确执行自愿互利政策，团结中农，对于耕牛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实行民主议价，做到公平合理。如耕牛的折价，请牛主、有养牛和用牛经验的贫农以及高级社干部一起讨论，不使富裕中农吃亏，当然也不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占贫下中农的便宜。宝北高级社一个富裕中农有一部水车，社里给他合理折价，他嫌低，宁愿把水车挂在自己屋梁上。后来，高级社买了抽水机，他看看再下去捞不到什么油水了，又要求折价入社，而高级社已经不需要这种水车了。

对地主、富农，各高级社根据《纲要》的规定，按照他们的实际表现，分别规划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者候补社员。不够入社条件的，由合作社监督劳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合作社对于老实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地主富农，是给出路的。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只保留了同贫下中农一样多的一份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富农则还保留着较贫下中农和中农为优越的生产条件。为了不使剥削阶级分子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兴风作浪，高级社规定地主、富农的耕牛和大型农具，在折价归社所有后，其价款应全部作为他们交给高级社的股份基金、公积金和公益金。对地主、富农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样，在“七一”地区，就基本完成了从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剥削的任务。但是，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依然存在，他们还要不断地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实际上，在吸收他们入社的前后，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有些地主、富农分子，妄图抵挡社会主义洪流，他们或者在背地里造谣，歪曲高级社的性质和党的政策，或者在被吸收入社时分散、转移甚至毁坏生产资料。号上有个姓许的富农分子，把一批应该折价归社的农具藏在搁楼上，贫下中农揭发了这件事，她起初矢口抵赖。当被查获折价归社后，她竟又偷了回去。九星高级社一个富农分子更加恶毒，他把一部好好的风车锯掉做成家具，以发泄他对高级社的仇恨。阶级敌人反抗合作社的罪行，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严肃批判。

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只不过是螳臂当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底到三月初这短短的时间里，几乎同时建立起了虹星十分社、新龙、宝北、灯塔、红旗、龙新、九星、友谊、联明、新华等十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月后，刚成立不久的七南初级社也转为高级社。整个“七一”地区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近三千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六。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进展，推动了七宝镇的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七宝镇上的个体手工业，共有三十来户，每户各有手工业工人二、三、四人不等。它们分散经营，产量少，质量差，不能适应随着农业合作化而来的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手工业工人迫切要求为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在党的领导下，竹器行业首先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其他铁器、木器、自行车修理业等也相继按行业成立了九个手工业合作社。手工业社成立后，调整了工场，加强了管理，生产出现了新面貌。铁器业在单干时，每个工人平均每天打十二把锄头，组织合作社后，生产积极性高了，劳动分工也合理了，平均每人每天能打十四把，提高效率百分之十七；又如打铁锔，也从原来的每人每天平均打八把

提高到十二把,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单干时,一到旺季,生意好,就粗制滥造,现在手工业合作社建立了产品检验制度,不合规格的不准出社,保证了质量。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比单干时集中了,还有力量试制一些新产品。手工业合作社职工还改变旧的经营作风,开始走出工场,挑着担子,下乡为高级社修理农具,受到社员的欢迎。

七宝镇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一九五六年初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下,由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作为市郊集镇对私改造的试点而开展起来的。七宝镇原有私营商业八十九户,分别合并、改组成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六十四户摊贩也按行业、按地段建立了合作小组。同时,有计划地调整了营业网、点,把一些商店迁往农村,加强了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这样,“七一”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同集镇资本主义势力勾结、危害高级社的可能性,被大大限制了。经过改造的七宝镇商业,有力地促进了“七一”地区高级社的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比初级社更优越

“七一”地区在五十一一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办起十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高级社取消了土地、耕畜和大农具的私有制,取消了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初级社存在的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与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了它比初级社有更大的优越性。宝北高级社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宝北高级社成立后,首先建立了党支部,党的领导进一步加

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能更好地在高级社得到贯彻。高级社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管制与改造，开始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职能。

宝北高级社取消土地报酬后，一九五六年全年集体劳动成果二十五万二千一百五十二元中，除成本、农业税等支出十一万四千五百十一元，及提取百分之二点零一的公共积累以外，全部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贫下中农在高级社里当家作主，处处作带头人。中农和其他一些社员的出勤率也普遍提高了。中农沈善余一家，入高级社后第一年，就比初级社时多做了三百六十二个工分。这个社的卢家塘生产队，在初级社时期有一些兼搞商贩活动的社员，经常“春卖豌豆夏卖瓜，秋卖毛豆冬喝茶”，很少参加田间劳动。高级社成立后，在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影响下，都积极参加大田劳动。

高级社有较多的资金，有条件购买初级社所买不起的大农具和农业机械。宝北高级社建立的第一年，和其他高级社一样，主要生产资料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犁由一张增至二十四张；农船由三条增至五条；脱粒机由三台增至十二台；水车由十八部增至二十四部；原来一架喷粉器也没有，现在买进了八架。此外，还在国家支援下，进行了比较大型的基本建设，建立了电力灌溉站，使全社机电灌溉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高级社的规模和公有化程度都超过初级社，因之它能在全社范围内对劳力、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合理使用。宝北高级社建立后，重新划分了生产队，调整了土地，改善了原来各初级社之间“土地插花、社员穿梭”的状况，并对社内水利和土地的治理改造，进行长远规划。宝北高级社还根据社员的生产技术、经验情况，进行分工分业，成立棉花、粮食、蔬菜等作业组，使他们在劳

动中“各尽所能”，并且满足了社里的四间温室、五间冷床、二十一间猪棚所需的技术力量。

高级社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柴草）、保葬、保教（孤儿），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可靠的一项社会保险。宝北高级社在建社第一年中，支出的“五保”费和医药费就有三百六十八元，占当年全社公益金支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

宝北高级社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它诞生的第一年里取得的，而且这是一个受严重自然灾害侵袭的年头。在风雨中成长的宝北高级社，更加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一九五六年，春耕刚开始，就遇到八十三年不曾有的低温和多雨；小暑后，又遇着百年未有的高温；八月和九月，受到五十年来最大的台风和多次暴雨的袭击；秋后又逢干旱。这些灾害都发生在作物的播种、生长、扬花、结实等关键时刻，因此损失格外严重。尤其是九月中旬，刮了一场“龙卷风”，宝北高级社的一百多亩棚架类作物全被刮倒、折断，棉花等作物也遭摧残。阶级敌人幸灾乐祸，大吹阴风，说：“要能抗住台风，天就是你爷了！”个别干部在严重灾害面前也丧失信心，想用跑自由市场搞贩卖的办法挣钱。党支部发动群众讨论，大多数社员反对这种只图眼前，而危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邪门歪道。他们认真分析受灾情况，积极考虑挽救措施。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立即把一百多亩棚架作物翻掉，改种小白菜；一路壅土扶苗，抢救棉花。说干就干，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白天晚上连续战斗，充分发挥出高级社人多力量大的优越性。全社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田里的竹架、残藤彻底清除。不到一个星期，白菜籽全部下了种。这一年，宝北高级社的粮棉产量虽低于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晚稻亩产五百四十九斤，棉花亩产四十三斤，但由于大批小白菜、黄芽菜的丰

收，全年总收入比一九五五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在这样的重灾年，全社三百四十七户中，有一百十六户，占社员总户数百分之三十三，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了收入；有一百二十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六，基本上保持了一九五五年的收入水平。这就是说，宝北高级社依靠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使近百分之七十的社员户在大灾年仍然增收或平收。其余百分之三十一的户，收入虽有程度不等的减少，但他们说：“遇上这样的大灾，家家都能不缺吃，这就是高级社了不起的地方了！”

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对新生的高级社的第一个考验。“七一”地区的所有高级社，都象宝北社那样，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发挥高级社的优越性，战胜了自然灾害。在梅雨季节里，虫害猖獗，杂草丛生，各社普遍以半数劳动力突击治虫，大力锄草。当台风夹着暴雨袭来时，他们冲向田头，开沟排水。台风一过，又立即壅土护苗，把能够挽救的棚架作物重新扶起。对一些受灾严重的田块，则争分夺秒地翻掉重种。经过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英勇战斗，大大地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取得了抗灾斗争的胜利。

在抗灾斗争中，各个高级社得到了国家的有力支援。这对于战胜灾害，巩固高级社，起了重大作用。单是宝南乡，这一年银行和信用社发放的农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政府还给有困难的一百三十四户农民发放医药补助费和生活救济金。同时为了减轻集体负担和保证农民生活，国家在宝南乡的粮食统购数比一九五五年减少七十万零一千斤，而在这个乡里的统销数则增加了三十六万八千斤。

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事实，最有力地证明了高级社的优越性。一九五六年，整个“七一”地区虽然粮食、棉花的产量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高级社的人力、技术等条件比较好，开展了多种

经营,如饲养家禽家畜、编结手套、纺石棉、搞短途运输、进行蔬菜加工,等等,因此,不少高级社还是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了收入。据当时西郊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新泾、龙华、真如三个区合并,成立西郊区,“七一”地区改属西郊区)统计,全区一百八十个高级社中,增加收入的社有一百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有十九个社,占百分之十,为不增不减。减少收入的社四十五个,只占全区高级社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七一”地区这一年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农户比一九五五年增加收入或不减少收入,有近百分之二十的农户仅轻微减少收入。对于收入减少得较多的社员,高级社千方百计给以照顾,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当社员们看到这种大灾之年人民生活依然有保障的感人情景,再回忆旧社会小灾大荒、无灾也荒的凄惨生活,他们怎能不从心底里赞颂毛主席指引的这一条农业合作化的光明大道呢!

第四节 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成果

高级社经受了考验

战胜了严重灾害的高级社,迈着坚定的步伐跨进第二个年头——一九五七年时,面临着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制度和人们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反映是不同的。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大变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对于他们失去的财产和权力是不会甘心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

浪，妄图恢复被推翻了的旧制度。一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要继续革命的重大问题，是我国人民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际生活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一九五六年末，国际反动派趁着苏修叛徒集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我国国内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发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一时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七一”地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也跳了出来，他们直接攻击的目标，就是刚刚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的高级社。和初级社的时候不同，现在阶级敌人主要是在合作社内部进行破坏了。在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的煽动和影响下，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逐步抬头。在各高级社里，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

春天，敌人利用一些高级社在青黄不接季节的暂时困难，唆使某些人闹事。

在联明高级社，一小撮阶级敌人以“缓发金”^①问题为借口，制造事端，企图搞垮合作社。这个社在一九五六年战胜了自然灾害，年终分配时以全年净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七分配给了社员，使百分之七十二的社员保持了相当于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的收入水平或有所超过，但是，要同时再偿还社员的“缓发金”，就有些困难了。阶级敌人利用夏熟尚未登场、春耕又需资金的时机，煽动一些人吵着要领“缓发金”。坏分子张高明唆使人包围社干部，叫嚷：“横竖横，拆牛棚！”如果不发“缓发金”，他们就要分集体财产，拆伙单干了。张高明又对村里的妇女说：“不发‘缓发金’，没钱买米吃。现在乡干部来了，自行车上有的是米，去向他们要好了。”煽动她们围攻来联明社蹲点的五个乡干部。这些干部把自行车架上的行李给她们看，并耐心进行说服，她们才知道受了骗。

张高明见没有把事端闹大，便磨了一把大刀，妄图谋害社里干部。一天夜里，当高级社党支部书记骑着自行车经过竹园时，张高明窜了出来，一把抓住自行车车头，恰巧这时，后边又来了一个社干部，张高明一看形势不妙，便灰溜溜地走了。阶级敌人的嚣张并没把革命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吓住。相反，教育人们要提高警惕，准备迎接新的阶级斗争风浪。

夏天，阶级敌人听到城里右派分子在发动进攻，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不光在合作社的经济问题上闹，还竟然叫嚣“合作化运动搞糟了”，“农民生活太苦了”。他们竭力煽动一小部分具有严重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闹单干，抽回土地退出高级社。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富裕中农，现在摇摆得更厉害了。宝南乡想退社的有二百一十一户，占已经入社的农户的百分之七，其中

^① 高级社成立时，社员大农具、耕牛等折价入社，分期付款，其中尚未发还的部分，统称“缓发金”。

绝大多数是富裕中农。新华高级社想退社的二十户中，富裕中农占十九户。

富裕中农一般土地比较多，如果退社单干雇不到工，田就种不好了。因此，九星高级社一个富裕中农诱骗八户贫农一起退社，说什么入社以后，九户搞个互助组，由他出钱买条船给大家积肥用。还说他的田多，可以分一些给别人种。但是这八户贫农看穿了他打的是剥削别人劳动力的老算盘，没有一人跟他走。友谊社有个富裕中农来拉贫农妇女包文娟退社，被这个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的合作化运动积极分子顶了回去：“退社？你讲入了高级社不好，我们贫下中农却觉得入了高级社什么都好。为啥要退社？”那个富裕中农碰了一个硬钉子，拉不到劳动力，也就没敢退出去。

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捍卫高级社，他们热情耐心地对那些摇摇摆摆想退社的富裕中农进行说服教育。在贫下中农的教育和各级党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大多数想退社的富裕中农都不退社了。宝南乡闹退社的二百一十一户，最后退出去的是极少数，一个高级社不过一、二户。宝北高级社对两条道路斗争教育抓得比较紧，生产搞得好，退社的一户也没有。少数退社闹得凶的富裕中农，背后往往有阶级敌人在煽动。新华高级社有一户富裕中农、一户中农坚决退社，去搞蔬菜投机贩卖，经贫下中农一查，原来有个坏人在幕后策划。这个家伙历史上曾干过坏事，他躲在阴暗角落里煽动说：“你们先退社，我现在不便出头露面，以后我也出来，三个人一起干。”贫下中农狠狠批判了这个坏家伙，同时用这个事实对两户中农进行教育帮助，终于使他们又回到了合作社里来。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严重阶级斗争，在党内也有反映。“七一”地区的十一个高级社党支部，共有党员七十人，他们大多

数都能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也有个别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在一定的气候下，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相呼应，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篡夺领导权，破坏高级社，大搞资本主义。在红旗高级社，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蔬菜社，尽管遇到一九五六年这样严重的灾害，依靠高级社的优越性和社员群众的努力，收成还是不差。但是，披着党员外衣的蜕化变质分子陶吉生，却利用他窃取的高级社副主任的职务，兴风作浪。陶吉生原是吴家巷初级社主任，和一个漏划富农勾勾搭搭，走资本主义道路。吴家巷并入红旗高级社后，党的领导加强了，他感到处处受约束，极为不满，就和那个漏划富农密谋策划，要把吴家巷社员拉出去，单独干。为此，他们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煽动吴家巷社员的不满情绪，并且采取欺骗手段，将应当上交社的钱私分给吴家巷社员，笼络人心。当这种错误受到批评后，陶吉生竟唆使一些人殴打社主任。区、乡干部下来调查时，陶吉生又指使一些人包围干部，吵吵嚷嚷，硬要拆社，谁吵得凶，他就给谁多记工分。在区里一个坏干部的支持下，陶吉生拆社的阴谋暂时得逞了。挂着“高级社”牌子的吴家巷，经营管理一团糟，成了坏人当道的“独立王国”。推销员卖完了蔬菜回来，陶吉生在村口就把钱截走了，连账也不记。吴家巷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从这个反面教员身上受到教育，识破了陶吉生要把大家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的诡计，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保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七一”地区出现的这一系列阶级斗争，特别是吴家巷事件，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深刻地表明：单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剥削阶级总是妄图夺取领导权，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向社会主义进攻，借以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要巩固已

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必要和非常迫切的。

整 风 整 社

高级社向何处去？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倒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整个“七一”农村都卷入了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处在斗争激流中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是广大贫下中农；他们的对立面，是一小撮不甘心灭亡的剥削阶级分子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的较量，在各个高级社尖锐地进行着。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批判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行为。这是农村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年冬天，“七一”地区各高级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动群众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问题的大鸣、大放、大辩论。

鸣放与辩论，一开始就集中在合作化问题上。这是大闹退社的那些富裕中农在一小撮阶级敌人支持下，早在上半年就提出来的问题。鸣放、辩论展开以后，少数富裕中农坚持错误立场，胡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户”。个别干部也站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一边，错误地认为“入合作社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不及单干”。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作为武器，摆事实，讲道理，彻底批判了这些错误言论。他们以在党的领导下走合作化道

路的亲身经历证明：社会主义是广大劳动农民摆脱剥削和贫困的唯一出路。他们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我们在所有制改造的整个过程中，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不断增加。合作化运动每前进一步，都使我们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使我们的觉悟提高一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谁也抹杀不掉，歪曲不了。社员们算了一笔细账：在单干时，麦子每亩产量一般只有八十多斤，晚稻四百斤左右，棉花不到二十斤，蔬菜大约三十担。从办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产量年年提高，今年的麦子平均亩产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四斤，晚稻五百三十斤，棉花五十斤，蔬菜四十五担。社员生活也相应提高了。拿友谊高级社社员来说，他们在单干时，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六十二元，加入了互助组后，提高到七十五元，后来办起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社员生活提高更快，一九五六年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了一百一十元，比单干时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怎么能闭着眼睛说瞎话，乱嚷合作化没有好处呢！社员们还特地为参加合作社的富裕中农算了账，证明合作化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从大处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解决了小农经济同国家工业化的矛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符合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利益的。从眼前看：大部分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都比单干时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随着合作社的发展，富裕中农以及全体社员的收入，还要不断增加。再看看过去，在旧社会，虽然许多富裕中农盼望发财，可是末了还是多数人破产。合作化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对合作化运动的任何怀疑和否定，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辩论中，贫下中农还严肃热情地帮助了一些犯错误的干部。友谊高级社有个干部曾错误地主张：“国家要我们多种的，就要少种；相反，国家要我们少种的，偏要多种。这样才能卖到好

价钱”。贫下中农批判这种荒谬主张是反对国家计划经济，要搞资本主义。他们说：“我们过去单干时，吃够了资本主义的苦头，合作化以来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我们决不走回头路！”明星高级社一个贫农出身的干部，否定合作化，说农民还象从前一样，“做到老，苦到老”。广大群众对他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耐心认真的批评教育。谁说合作化运动没有好处！谁说农民还象从前一样做到老苦到老！一个老贫农激动地帮他回忆了家史：“你在旧社会饿肚子，蹲‘难民所’，给地主打长工，那真是苦。解放后，分给你田和农具，连地主的红木大床和有‘湖心亭’的房子也分给了你，从此吃穿不愁。合作化以来你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党还培养你当了干部。这些好处你全不说，却说什么农民还象从前一样，合作化运动没有啥好处。我问你，你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为了帮助这个干部进一步认清两种社会制度和两条道路的本质区别，贫下中农就在他家的“湖心亭”举办了一个“今昔对比展览会”。回忆对比激发了这个干部的阶级意识，他既惭愧又沉痛，深刻地检查和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表示一定要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同企图倒退的旧势力作斗争。

通过这场大辩论，广大社员群众进一步弄清了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高级社更加巩固了。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大辩论真是好，把资本主义思想辩输了，把东倒西歪的人扶正了。以后再有人要走回头路，我们还要同他辩，同他斗！”一个中农社员说：“大辩论刚开始时，我分不清是非，你讲的好象很对，他说的又似乎蛮有道理。现在，大是大非分得比以前清爽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更明确了。”原来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多数也得出了结论：“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有些退社的富裕中农，重新申请

参加了高级社。

大辩论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攻势，它使一小撮破坏高级社的阶级敌人陷于空前孤立。大大提高了觉悟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反击敌人。在被拆出去的吴家巷“高级社”里，社员们彻底揭发批判了混进党内的坏分子陶吉生的罪恶活动，撤了他的职，专了他的政。在联明高级社，群众清算了为非作歹的坏分子张高明的罪行，把他交由政府依法制裁。其他一些曾经跳出来表演，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富、反、坏分子，都根据政策，分别情况，作了不同处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了。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精神焕发，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更加生气勃勃。

两条道路大辩论的胜利，激发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时，高级社内部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影响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从鸣放辩论中揭露出来的矛盾来看，不少干部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毒害下，沾染了不同程度的“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如参加集体劳动比初级社时候少了，高居于群众之上、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出现了。用群众的话说，这些干部“官气多了，泥土气少了”。群众的批评教育了干部，使他们开始认识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立场感情就会起变化，就不能代表贫下中农掌权。这样下去，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变质。这是多么危险啊！许多干部主动到群众中去，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华高级社干部经过“整改”，作风转变，经常白天劳动，晚上处理工作，一个月劳动十五天。群众称赞说：“这才象泥腿干部。”这个社的干部还改变了过去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式作风，发扬了民主办社精神。以前，为建立生产队的饲养

场，盖了几批猪棚，都是高级社主任一个人作主，连管理委员会也不知道，结果浪费现象严重。现在，这个主任在群众帮助下提高了认识，正巧又碰到有个生产队要造猪棚。他立即召集管理委员会共同商量，委员们根据本社情况提出了一个又好又省的方案：合作化后社员们迁居新屋，有不少废弃不用的矮房破屋，可以用来养猪。把这个方案交给社员群众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很快就腾出了十四间空屋，交给生产队养猪，生产队按规定付给社员一定的租金，从而为社里省下了一笔经费。饲养场建立了，集体经济也壮大了，群众很满意，积极性更高了。

一九五七年伟大的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象强劲的东风吹散了“七一”农村上空一时翻滚的乌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在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掀起了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修水利的新高潮。

第三章 七一人民公社的诞生

第一节 公社在孕育中

大跃进中暴露了高级社的矛盾

“七一”地区的贫下中农和广大农民，在胜利地经历了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激烈斗争后，以更加高昂的战斗姿态，向新的目标进军。他们和全市郊区农民共同提出倡议，要争取亩产百斤棉、千斤粮、万斤菜，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九五八年一月，“七一”地区的十一个高级社，在有关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冒着历史上罕见的严寒，打响了空前规模的“水利之战”。

这是广大贫下中农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新高涨。水利工地上的日日夜夜，一派热气腾腾，只见“白天一片人，夜里一片灯”。春节前夕，贫下中农破旧立新，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开河开到年廿九，吃过圆子就动手”。他们说到做到，“小年夜”还在河上奋战，大年初一清早就扫雪动了工，过了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春节。这一仗，取得了重大战果，仅宝南一个乡，境内二百九十一条河浜全部翻了身，清澈的河流代替了淤塞的污沟，黑油油的河泥铺满了田地。老农们兴奋地议论着：“从来没有见到过农业上打这么大的仗，这次可是大开眼界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大搞水利中看到，要迅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单靠一个高级社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须得跨出社界，几个、十几个高级社联合起来才行。

五月，党中央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喜讯传来，“七一”农村顿时沸腾起来，村村队队，响遍了群众歌颂总路线的歌声：“总路线，是灯塔，大海之中不迷航。总路线，放光芒，沿着你走有方向。”各高级社的社员们都投入了学习总路线的热潮。他们用总路线精神对各项工作展开大检查、大评比，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宝南乡友谊高级社八队自从年初大搞水利以来，志气越来越高，干劲越来越大。过去不敢种双季稻，今年不但种了，而且有信心夺取好收成；过去不到农历五月不锄头遍花（棉田锄草），这年不到五月，已锄了三遍，棉花长势比哪一年都好。他们豪情满怀地说：“我们的农村，眼前还是一穷二白，好比一张白纸。我们一定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写上最新最美的文字，画上最新最美的画图。”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老规矩，现在要破一下了；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事，现在要做起来了。大跃进的局面出现了。每一个高级社都酝酿着跃进规划，要举办过去没有办过的各种事业。

农具革新运动成了生产大跃进的第一个浪潮。沪星社的贫农叶品顺，根据自己多年种植棉花的实践经验，大胆试制了“棉花条播机”，它能同时兼做起沟、下种、复土、平整等四种农活，显著地提高了工效。这项新农具的试制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人搞革新。有个裁缝，也放下剪刀，拿起锯子，造出了一辆能负重几百斤，适宜于乡间道路行驶的车子。这件事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他们说：“裁缝能造车子，我们种田的为什么不能搞革新？”于是，搞革新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社都试制或改制了一批新式农具，其中有“自行车式水车”、“多头喷雾器”、“脚踏式棉花移苗

器”等等。这些革新农具，虽然比较粗糙，但成千上万的农民动手搞革新，这件事本身就生动地表明了总路线的巨大威力，它推动着农村逐步向着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前进。后来，随着农具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广大农民提出了自己办工厂的新课题。

继农具革新一马当先之后，七月中旬，“七一”地区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工农商学兵，跃进再跃进”的战斗口号下，意气风发，大干快上，开创了各项工作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局面，尤其是农业“八字宪法”在群众中逐步扎下了根，有力地指导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七一”地区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实际上是由年初的“水利之战”揭开的；在全面大跃进中，各高级社都在集中人力、物力，努力提高抗旱能力。他们组织能工巧匠试制新式灌溉工具，或者修挖河道以利灌溉，或者几个社联合投资，建立机灌站。这一年夏天，“七一”地区遇到了三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当时正是双季早稻将要灌浆孕穗，单季晚稻需要插秧的关键时刻，要是在过去，这样严重的干旱，早就要影响水稻生长，使棉花卷叶。现在，刚刚兴修起来的各项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它保证了二千亩正在孕穗的早稻喝得饱饱的，一千七百米单季晚稻及时插下了秧，六千亩棉花也生机勃勃。有一首《气得龙王肝火冒》的民谣，在群众中流传，它生动地表达了社员们运用集体力量战胜严重干旱的喜悦心情：

“龙王上座把扇摇，
等着农民讨雨浇，
虾兵来报满田水，
气得龙王肝火冒。”

肥是农家宝。为了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群众性积肥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了。贫下中农解放思想，广辟肥源，提出使“野

肥下田，水肥上岸，家肥出门”的豪迈口号。男社员爬上屋顶捅烟囱灰，女社员赤脚下滩捉螃蟹，老人和小孩到村头路边拾鸡粪，各社还纷纷派出专业队伍到市区收集垃圾，到苏州河里挖黑泥。这一年，各高级社的大熟作物，获得了比往年多几倍的肥料，改变了过去只靠粪肥、饼肥、化肥种田的情况。

其他如深翻土地、选用良种、合理密植等各项措施，也都迅速广泛推行，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大跃进的花朵万紫千红。

遍及全国城乡的大跃进局面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和恐慌。刘少奇一伙向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大吹冷风，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放大炮”。“七一”地区内的阶级敌人也不断放出破坏大跃进的空气。当黎明高级社的干部和社员决定选择一块长势很差的早稻田作为亩产千斤的试验田时，敌人就在阴暗角落里刮冷风，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办不到”。他们准备等着看“笑话”。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块经过干部和社员精心培育的试验田里的稻子收割了。社员们都涌到田里，割的割，脱粒的脱粒，最后过秤折算，达到亩产一千零三斤。这个好消息一下就使社员们欢腾起来，大家扬眉吐气地说：“这千斤稻是争气稻、跃进稻。”

广大贫下中农要搞社会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现在，农业、副业，各行各业都要求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进，高级社的组织形式同迅速发展着的新的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就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生产大跃进，大家都要搞农田水利，搞交通运输，但在高级社的情况下，要解决涉及几个社的不同利益的问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常常想搞而搞不成。九星社的阮家库，提高产量的主要矛盾是缺水。他们想开一条河，要经过友谊社，提出了两社合开的要求。友谊社核算了一下，这样要花几千人工，占去几

亩熟地，受益不大，又影响当年的社员分配，因而没有同意，开河的事就这样搁了下来。友谊社的隔壁有个联明社，因为生产发展了，运输繁忙，想把原来的一条路加宽，但这要占去宝南社的部分土地，而宝南社自己另有通路，因此也没有同意。

为了生产大跃进，各社都需要购置各种农业机具。高级社小资金少，一个社买不起大型机械。在“七一”地区的高级社中，没有一台拖拉机。有些农业机器即使买到了，因为社小土地分散，也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能。中华社想买一台抽水机，没有力量，直至得到一笔国家贷款，才买到了一台可以灌溉一千亩地的机器，但社里只种了二百亩水稻，机器就经常闲着。友谊社也买了一台抽水机，造了一个固定的排灌站，却因为社里土地和邻社的土地“插花”，作物不成片，只有一百多亩水稻田能灌到水，形成浪费。国家拖拉机站开来了大型拖拉机，往往因为田块小，拖拉机转弯不便，堆起一堆泥，还得用人力挑平。

为了生产大跃进，各高级社纷纷筹办工业，农、林、牧、副、渔也要全面发展，但高级社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很有有限，困难很多。友谊社要实现一九五八年生产指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社里劳力不够，必须依靠农具革新提高工效解决，这就提出了办农具厂的要求；要实现跃进指标，还需要大大增加肥料，办法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和自制土化肥，这又提出了办饲料加工厂和颗粒肥料厂等要求。最后一算，办起这些厂来，需要上万元资金，而社内去年留存的公积金总共只有一万多元，而且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哪来这许多资金办那么些厂呢？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曾经对发展农业生产发挥过巨大作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式，现在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大发展，暴露出了它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它不论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等方面，都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

力迅速发展的需要了。有矛盾就需要解决。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在思考着。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首先感到高级社存在着矛盾，并寻找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的，是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正是在他们的促进下，开始突破了高级社的某些局限。例如，沪星等九个高级社，为了搞农具革新，联合投资，办起了一个农具厂，这个工厂虽小，却有木工场、竹工场和铁工场，把九个社需要的农具的试制和生产任务担负起来了。七月份，正是水稻耘耩季节，他们生产了水稻耘耩器二百四十五把；八月，收割早稻的大忙季节到了，田间运输量很大，他们又突击制作或装修了各式车辆一百二十六辆，其中双胶轮拖车一百零九辆。这个由几个高级社合办的工厂已经突破了高级社的局限，提出了进一步联合的方向。

但是，高级社之间为兴办某些事业而进行的联合，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级社这种形式所存在的矛盾。由于各高级社生产发展水平不同，需要也不一样，这种联合的项目和范围，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并小社办大社，成为群众的普遍要求。中华社和黎明社，首先提出了联合起来办大社的建议，接着，其他各社也纷纷响应。宝南乡党委原打算三、四个高级社合并成一个联社，而群众不满足。许多贫下中农说，这种联社虽然比高级社大了，但要办工厂、搞水利、实现机械化，力量还不够。群众反复酝酿讨论，一致要求办更大的社。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正当全国和“七一”地区广大农民酝酿办大社的时候，毛主席视察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热情赞扬了当地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不久，毛主席又指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八月二十九日，党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传到“七一”地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心头好象一下子点燃了一盏明灯，顿时亮堂起来：这“人民公社”，不正是我们摸索着而没有找到的答案么！我们日夜盼望的，不正是“人民公社”这条金光大道么！

“办人民公社！”“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热烈地议论着。老贫农见到下放干部，把他们拉进自己的屋里，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青年突击队员们要社干部回答：我们这里几时办人民公社？社干部也巴不得一天就把工作搞好，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迎接人民公社的日子里，广大“七一”地区有多少贫下中农心潮翻腾！他们回想起解放前的悲惨岁月，对比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幸福大道的历程，今天，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引导农民更上一层楼，怎不叫人激动啊！尝过黄连苦才觉得蜜糖格外甜，嚼过糠菜团才感到白米饭分外香。展望未来，他们仿佛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灿烂前景！

贫下中农日思夜想，盼望人民公社早日成立。他们用民歌表达了这种心情：

“梦中想起公社到，
晒在床上笑醒了；
吃饭想起公社到，
捐起铁镢朝外跑；
深耕想起公社到，
一垒垒痛土地佬；

越想公社劲越高，
只盼公社早来到！”

第二节 公社胜利诞生

欢庆公社成立

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宝南、莘庄、虹桥、华村、朱行、上中等六个乡和七宝镇的各高级社全体社、队干部举行集会，由刚从河南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回来的同志作介绍。到会干部越听越兴奋，他们代表广大社员群众，纷纷提出立即筹办人民公社的要求。于是，传达会变成了六乡一镇建立人民公社的筹备会。会后，社里传达，队里介绍，六乡一镇就要办人民公社的喜讯飞快地传遍了“七一”地区的每家每户。

办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兴高采烈，阶级敌人则气急败坏。他们拚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搞破坏。宝南乡一个坏分子恶意煽动说：“公社一成立，社员财产全要归公，不如趁早捞点现钞，放进袋袋里自己花花。”一个富农分子把家里的三只羊卖掉了，又把自留地上的竹子统统砍光。

少数富裕中农，被阶级敌人的冷风一刮，摇摆起来，有的也打算杀猪卖羊。

贫下中农及时觉察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积极宣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揭露敌人的险恶阴谋，帮助摇摆不定的富裕中农擦亮眼睛，共同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

农民群众不但要同凶恶的阶级敌人斗，而且还要同天斗。一九五八年八月，正是七一人民公社快要成立的时候，台风和

暴雨严重威胁着即将成熟的秋收作物。阶级敌人在一边幸灾乐祸了，他们指望天灾会把广大农民迎接人民公社的热情摧垮。但是，贫下中农作出了坚决的回答：“有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我们贫下中农天不怕、地不怕，六百毫米暴雨冲不掉，十二级台风摧不垮！”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顽强地进行防台抗涝斗争。乡乡社社设立了防台抗涝指挥部，各级干部亲临第一线，同广大社员一起顶风冒雨进行战斗。宝南乡友谊高级社社员冒雨在田里开沟，衣服淋湿了，干部关心地问大家冷不冷，社员们说：“公社喜讯暖心窝，这点困难算个啥！”坚持不下“火线”。一天深夜，九级台风带来的暴雨刚刚过去，虹桥乡虹星三分社社员就不管天黑路滑，奔向田头，把一大片新种下的黄芽菜秧扶正壅土，保证菜秧正常生长。六乡一镇的农民群众、革命干部英勇奋战，用防台抗涝的胜利，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表示了要办人民公社的坚强意志。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排除了阶级敌人干扰，又战胜了暴风雨袭击的“七一”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热烈地准备着成立人民公社。公社筹备委员会从九月五日起组织社、队干部学习党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九月十三日后，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学习、反复讨论人民公社的性质、方针、政策。接着，一个群众性报名参加人民公社的热潮就出现了。有的老妈妈从箱子里找出自己当年结婚用过的大红喜帖，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上入社申请书。已是深夜一点钟了，在友谊社，社员们还围着一张申请书，争先恐后地在上边签名。忽然，过去一字不识的贫农社员琚凤琴从别人手里夺过毛笔就要签名，人们一下呆住了，几十双惊异的眼睛看着这位从来没有握过笔杆的妇女，只见她庄重地在申请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件事立即在群众中议论开了。不识字的琚凤琴怎么会拿起笔写字呢？原来，当她一听说要签名

申请加入公社，就在心里琢磨着：办人民公社是开天辟地头一次，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喜事，一定要亲笔在申请书上签名表决心。这天一清早，她就请下放干部教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九星社下中农俞福根写了申请书后，就牵了牛，背了犁，自动去耕田，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拍着大水牛脖子说：“你帮我耕了这块田，表一表迎接公社成立的心意。”走人民公社的道路，这就是“七一”农村广大群众的心愿。

接着，社员们又敲锣打鼓，向乡、社领导送去申请书，大家都把第一个送到作为最大的光荣。为了这，黎明社的二队和三队之间还发生过一场喜剧性的“争执”呢！

事情是这样的：

十四日晚上十点钟，第二队社员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加入人民公社的申请书，大家排着队，准备敲锣打鼓到兄弟队去报喜，然后把申请书送到社办公室去。可是几个女社员等不及了，报喜队伍一出村，她们就径直向社办公室跑去，半路上听到第三队的锣鼓也敲响了，催得她们更飞快地跑。在社办公室前，一场“争执”发生了。原来二队的女社员看到比自己晚到的第三队社员手里拿着大红申请书，喜洋洋地夸自己是第一名，很不服气，说：“你们算第一？不行！我们到得早，我们第一名。”三队社员把手里的申请书向她们一扬，呵呵笑着说：“你们拿不出这个，怎么能算第一？”她们可真的拿不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急死人了。不多时，去各队报喜的第二队社员拿着申请书来了。妇女们就埋怨道：“你们不到各队去，第一名不是我们的吗？”刚到的社员回答说：“去各队报喜是为了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发扬共产主义思想，怎么你们一转眼就忘了？”妇女们脸一红，忙说：“对、对、对！哪个队得第一都一样，只盼公社早点成立。”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客观和主观条件已经充分具备的时候，它就瓜熟蒂落，应运而生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这是“七一”地区每个农民难忘的日子。以我们党的生日命名的上海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七一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公社成立大会定于下午三时召开，但是十二点刚过，一万多名社员代表就陆续从各村出发了。里面有白发苍苍的老社员，有穿着节日盛装的年轻姑娘，也有斜挂着步枪、骑着自行车飞驰的青年民兵。在人群中有一位上中乡的七十二岁的女社员，已经走了足足两个半小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位老妈妈想到人民公社，越走越有劲，兴致勃勃地唱着民歌：

人逢喜事脚步轻，
心里越想越高兴。
今朝庆祝公社到，
毛主席恩情记在心。

每唱一遍，人群中就响起一片叫好声。人们高举着红旗和欢呼人民公社成立的标语牌，抬着决心书，舞着龙灯，跳起狮子舞，一直向着大会会场涌去。那里，更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下午三点钟，公社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声音：“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盼望已久的七一人民公社，今天正式成立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庆祝七一人民公社在斗争中胜利诞生！^①从此，“七一”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以坚定的步伐迈进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阶段。公社社员们心花怒放，精神振奋，更加英勇地开始了新的战斗。他们无限深情地回忆了解放以来毛主席

① 最初成立的七一人民公社，包括六乡一镇七十四个高级社，拥有七万九千四百八十多个农业人口，十万零七千三百八十五亩土地。



欢庆人民公社成立。

领导农民群众所走过的每一步，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胜利！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农村新面貌

新生的七一人民公社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五八年十月底，七一人民公社的社员们投入了成立公社以后的第一个“三秋”战役。男女社员挥舞镰刀，你追我赶干得欢。他们偶尔直起身来，擦一把汗，环顾四野，禁不住从心底里发出欢呼：“这一眼望不尽的耕地，这哒哒奔驰的拖拉机，现在都是我们公社的了！”

是啊！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日公”。大，就是公社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高级社。“公”，就是公社的公有化程度，也比高级社更高了。七一人民公社建立了公社一级的所有制，主要是拖拉机站、电力排灌网、社办工厂、大型牧场，以及气象站、广播站等为高级社所无力兴办的企业、事业。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实行了政社合一，党派出了一批国家干部加强公社的领导工作，国家还投资兴建了由公社管理和使用的二十公里高压输电线、三十三台变压器，以及四座电力排灌站，这就使公社一级的集体经济，开始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成分。

七一人民公社，能够对工、农（包括林、牧、副、渔）、商、学、兵实行统一领导，超出了高级社的范围。它政社合一，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在公社统一组织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有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当年紧张繁重的三秋任务：抢收了九千亩水稻、三万

亩棉花；为争取来年夏熟作物的丰收，深翻了一万五千七百亩土地；还比往年提早二十天播种了三千三百七十四亩麦子、七千八百五十亩油菜。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次三秋工作进度快，质量好，种得早，说明人民公社力量大！

这一年，在大跃进的基础上，七一人民公社的秋熟作物获得大丰收。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七十一斤，比高级社时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七；麦子二百二十斤，增长百分之四十三；棉花七十四斤，增长百分之四十八；蔬菜五十八担，增长百分之二十九。友谊生产大队这一年棉花大面积高产，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九成。这个大队的棉花专业组组长、老贫农陈林珍因此光荣地上北京，领取了国务院授予他们的奖状。

公社化以后，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公社建立了专业的畜牧场和良种饲养场。到一九五八年底，全公社圈存生猪三万五千五百三十三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其他家畜和家禽也都大幅度增长。

社办工业也越办越好。到一九五八年底，社办工厂的资产已达二十四万元。这些社办工厂，包括农机厂、化肥厂、蔬菜加工厂、细菌肥料厂、农药厂等。它们的显著特点，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公社农业机械厂除了制造各种常用的农具以外，还能生产鼓风机、2.8 瓩和 4.5 瓩的电动机等农用机器。

公社成立后，农业机械化也得到了有力推动。在高级社时期，“七一”地区只有十台抽水机，共六十三匹马力。公社成立的第一年，全公社就已拥有了电动抽水机二十六台，共二百二十五匹马力，另有柴油抽水机二十一台，共二百五十一匹马力，分布在各个生产大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机电灌溉网，机电灌溉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公社拖拉机站拥有两台万能拖拉机和三台总马力为一百二十二匹的中型拖拉机。在这

一年的三秋战斗中，拖拉机日夜出动，深翻了八千亩左右的土地，约为全部深翻地的一半。社员们歌颂道：“单干户全靠拚力气，合作社只有小机器，公社带来了拖拉机和电动机，真好比上楼乘电梯。”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社员们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水利建设运动。在公社的统一规划、指挥下，全公社五千多农民组成的开河大军奋战在工地上。这年冬季，疏浚、开挖了在本公社范围内的五条主要河道，共计五十万八千土方。他们还和解放人民公社等三个公社协作，疏浚了新横塘河，总土方数达到一百五十万。

广大农民把人民公社比为初升的太阳。七一人民公社正象一轮初升的红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第四章 在斗争中健全公社体制

第一节 迎着风浪前进

捍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七一人民公社一诞生，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这个新生事物还必须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完善。刚刚建立起来的七一公社，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章程，更缺乏办社经验。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应以哪一级为基础比较合适，收益分配怎样比较合理，社、队规模应该多大，社、队关系又怎样处理，等等，都有待于解决。用自己的双手在“七一”大地上创建了人民公社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满怀信心，要从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培育这个前途无限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它成长、壮大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没有能阻挡公社诞生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陈伯达一伙，刮起了一股“共产风”，妄图在新的形势下，打起“左”的旗号，把刚刚诞生的人民公社引入歧途，从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利用干部和群众要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而又缺乏办社经验的状况，竭力歪曲人民公社的性质，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区别，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鼓吹人民公社要“立即进入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他们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搞“一平

二调”，妄图搞垮人民公社，破坏城乡联系和工农联盟。刘少奇一伙刮起的这股“共产风”，严重地威胁着刚刚诞生的七一公社。

在七一公社，“共产风”的主要表现，是社“共”队的产，即公社“无偿调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物资、土地、劳动力和积累，来发展公社一级经济。首先是公社不适当地增加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积累，并将其中的很大部分调归公社掌握。特别是蔬菜地区的生产大队，上缴给公社的积累，一般要占到这些大队纯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有的甚至高达三分之一。象虹三大队，一九五七年的总收入为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六十一元，纯收入为二十五万六千五百元，公共积累占纯收入的百分之十，即二万五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五八年总收入猛增到四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四元，纯收入为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二元，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一年提取的公共积累竟占纯收入百分之二十七，绝对数高达八万七千四百二十一元，而其中大部分为公社所调用。这样不仅削弱了队有经济，也影响了社员的分配，使社员收入不能相应地增加。同时，公社还无偿调用生产队大批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比如，当时公社兴建的两座砖窑，前后花去大量人工，群众称之为“万人造窑”。这些劳动力，就是从各生产队无偿调来的。单是宝南四个大队，在一段时间内，就被调用了二百九十九个强劳动力，几乎占这些大队强劳动力的十分之三，使队里的生产大受影响。再如，为了发展社办的饲养事业，把各生产队集体饲养的家禽、家畜等，大批地调归公社一级所有，使生产队的畜牧业和副业受到了很大削弱。为了集中饲养家禽、家畜，兴建新的厩舍，又把生产队的房屋和砖、瓦、竹、木等材料调归公社，甚至调社员的东西。任意无代价地调用，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梅陇地区一个生产队，四部拖车被调得无影无踪，却

又不知从哪里来了两部“野”拖车。莘庄地区一个生产队，一只抽水机船被调得不知去向。虹桥地区一个生产队，二十多亩胡萝卜已经成熟，因为劳动力被调用过多，安排不出人力去收，结果在地里烂掉。

刘少奇一伙还恶毒地乱提无法实现的高指标，煽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当这些歪风受到抵制时，又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于是，又刮起了“强迫命令风”。刘少奇一伙刮起的这几股歪风，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人力物力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强烈不满。越来越多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勇敢地起来抵制这股逆流，反对无偿调用。他们说：“发展集体经济，哪能挖肉补疮？这不是毛主席的办法！”“公社要造高楼大厦，先得打好基础，怎么可以拆生产队的墙脚？”九星大队有个生产队，当公社来无偿调用肥料时，这个队的干部和群众坚决顶了回去。他们说：“党号召夺高产，现在却连肥料都要调走，叫我们哪能夺高产？”对于不断加码的高指标，多数干部一直思想不通，进行抵制。贫下中农和有生产经验的干部还想方设法同“瞎指挥风”进行斗争，在生产实践中，仍按行之有效的措施去做，表现了坚定的反潮流精神。不少基层干部由于捍卫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广大群众的利益，促进生产的真正发展，反而遭到“批判”，甚至被撤销职务，但他们并不动摇，而更加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驱散这些歪风，并引导人民公社胜利前进。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我国人民创建人民公社的经验，指明了人民公社发展的方向。它严正地批判了刘少奇、陈伯达一伙毫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

公社“立即进入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荒谬做法，指出“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时尖锐指出：“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决议》又明确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这个《决议》为纠正和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等一类错误，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主席又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再一次批判了“共产风”的错误，要求农村各级党组织坚决纠正。会议明确指出：当前人民公社应该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随后，中央又发出指示，对于社员个人和集体在“共产风”中受到的损失，必须由调用单位负责补偿。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斗争中前进的广大社员和干部。七一公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于一九五九年初，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和社员代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同时，结合冬季和春季的生产工作，开始了对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即整社工作。三月初，公社又召开了包括劳动组长在内的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郑州会议精神，检查了前一阶段的整社工作。七一公社广大社员和干部，通过对《决议》和郑州会议精神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认识，以及对于

“共产风”的危害性的认识。大家深深体会到，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搞好社会主义；要过渡到国家所有制，必须先搞好集体所有制经济。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但不能认为这“两个过渡”可以立即实现，决不能用社“共”队的产的做法去发展社有经济。“共产风”只会损害人民公社，损害社会主义。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七一公社实行了生产资料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大队一级。与这一管理体制相适应，公社健全了社和队的管理机构，生产大队恢复了高级社时期实行过的对生产队的“三包一奖”制度，生产队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度，从而加强了劳动生产管理。同时，公社还对平调上来的公共积累，作了重新分配：将一九五八年提留的公积金，下放百分之三十，计八十三万元，交给各生产大队掌握，另外再拨十万元给各生产队，作为生产资金；又把公社占有的公益金十七万五千元拨出百分之五十给生产队、百分之二十给大队支配，公社只留百分之三十。公社还根据中央指示，对于调用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劳力、土地、房屋、物资等项目，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除调用的劳力尽可能回原单位，并付给一定的劳动报酬外，其余的采取了原物归还、实物抵账、借用租用和折价赔款等四种办法。凡原物尚在，可以退还的，一律归还；凡原物损坏的，修理后退还；凡原物已经丢失，或无法修复的，折价赔偿；凡需继续使用的，办理借用或租用手续，租用的付给租金；凡购买的，按合理价格付给价款；凡应付价款，或抵公账，或付现钱，一次或分期还清；等等。总的原则是不使生产队和社员受到损失。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共产风”等歪风在七一公社被制止了，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又进一步高涨。一九五九

年的生产高潮掀起来了，各生产队的劳动效率普遍有所提高。宝南地区五个大队，计划在一个月內完成蔬菜种植任务，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社员们反映：“过去刮来一股又一股歪风，生产上乱哄哄，现在把这些歪风打下去了，一天要当两天用！”

批判右倾思潮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一九五九年初夏，在制止了几股歪风之后，七一人民公社又经过初步整顿，更加健康地成长了。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七一”地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对人民公社更加热爱。“七一”农村到处是对人民公社的热情歌颂，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新的大跃进的局面。

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富裕中农，由于私有的烙印较深，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很容易受阶级敌人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道路怀疑动摇。七一公社刹住了“共产风”，巩固了集体经济，他们却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办糟了”，有的甚至跟在阶级敌人的屁股后面，攻击人民公社，幻想走回头路，搞单干。他们胡说“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可是在高级社时期闹“退社”的，也正是他们。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想单干。在他们看来，集体劳动不如个体劳动，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收入也和广大农民一样，不断地有所增加，但是他们总是在想：如果让他们“自由”，他们就能够“发财”。友谊大队有个富裕中农就是这样说的：“我有水牛、风车和好田，春天种上水稻和棉花，夏天帮人家包灌几亩稻水，秋后一、二十石米堆在家里，冬天晒晒太阳、上上七宝，真象活仙人一样。”九星生产大队在落实“三包一奖”的时候，个别富

裕中农竟赤裸裸地提出要“分田到户”，恢复单干，说：“不要搞什么‘三包一奖’了，把地分给各家种，保证种得好。”这些人打头阵反对人民公社，决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地主、富农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

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表。一九五九年夏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逆流，恶毒攻击我国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刘少奇支持下乘机跳了出来，污蔑我党领导几亿劳动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诽谤人民公社“办糟了”。这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博得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叫好，鼓动着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于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击退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摧垮了以彭德怀为头子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号召下，七一公社的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根据上级的部署，积极投入了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的伟大斗争。各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用人民公社的伟大成就，彻底批判了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各种攻击人民公社制度的谬论。

谁说“人民公社办糟了”？请看铁的事实吧！

莘北生产大队是一个穷队，过去产量提高不快。公社运用大集体经济的优越条件，对这个大队进行了重点支援。资金有困难，公社为它拨款周转；七、八月间，四十三天无雨，公社支援了他们一台抽水机，还直接组织城镇居民和职工，在农忙时去莘北义务劳动。公社的关怀和支持，激发了这个大队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他们以旺盛的斗志战天斗地抗干旱，精耕细作夺丰收，终于改变了后进面貌。一九五九年，水稻平均亩产由一九五八年的五百八十斤增长为八百八十八斤，棉花由每亩七十三斤提高到八十三斤。

红明生产大队是一个蔬菜生产任务重、劳动力不足的大队。由于公社建立了电力灌溉系统，大大减轻了他们因种植蔬菜而劳力紧张的困难。一九五九年从小暑到八月中旬，虽然滴雨未下，但发挥了抽水机的威力，蔬菜仍茁壮生长，一片碧绿。要是在过去，遇到这样的大旱，即使日日夜夜，肩挑脚踏，菜还是要大片干死。一九五九年的八月是格外干热的“火烧八月”，可是这个大队却打破了八月淡季的常规，使蔬菜上市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社员群众在批判中一致指出：“这些成绩，有眼睛的人都应当看得见。有些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存心不看事实，那是因为他们一心想着资本主义。”

批判右倾思潮的战线，从生产大队扩展到社办工厂的各个车间。一年前刚从生产队来的新工人，同社办工厂一起成长，他们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见证人。一年以来，公社一级经济从无到有，获得了很大发展，一九五九年产值达到二百四十九万七千六百元，占全公社三级经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同年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四。在公社一级经济中，社办工业产值二百二十一万九千六百元，比上年增长了一倍。工人们摆出了这

些事实，说：“有人想要倒退，所以硬说‘人民公社办糟了’。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光明大道。”

七宝镇的商业职工们，也参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许多营业员赶到生产队去，同广大社员并肩战斗。他们拿出公社化后商业的发展来批驳“办糟了”的谎言。一九五九年一月至十月，与一九五八年同期相比，七一公社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四。许多主要品种的销售额，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如卡其布就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绒线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一些老营业员把解放前贫下中农衣食不周的情况，同现在广大社员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相对照，满怀激情地指出：“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两条相反的道路，谁要把我们再拉回到旧社会去，万万办不到！”

广大贫下中农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的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运动。他们忆旧社会的苦，忆小农经济的苦，畅谈合作化、公社化带来的新生活和更加光明的前景，进一步激发了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战斗热情。友谊大队有一个生产队，二百多个社员济济一堂，共同算了一笔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收入账：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他们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为一百一十五元；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增加到一百三十五元，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十七以上，一九五九年预计还要增加。他们还帮一户富裕中农算了一下公社化以来的收入账。这户富裕中农共有三个劳动力，公社化第一年，分得了五百零六元四角二分，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增加了五十一元二角五分；一九五九年即将分配，预计可以分到七百七十多元，又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二百六十多元，同他单干时的微小收入简直不能相比。这就是说，即使对于富裕中农，也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户”。群众

性的回忆对比，有力地批判了“今不如昔”的右倾倒退思潮。

反右倾斗争，鼓舞了七一公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一九五九年是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七一”地区夏秋之交持续干旱一个半月，棉田又大量孳生红蜘蛛，严重影响水稻的孕穗和棉桃的生长。广大社员和干部在公社党委领导下，一面与右倾思潮斗，一面与天斗、与虫斗，在反右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抗击自然灾害的斗争也打了大胜仗，夺得了好收成。一九五九年全公社几项主要农作物的亩产量，都有较大提高：水稻平均亩产六百九十九斤，比高级社时的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麦子二百九十九斤，增长百分之九十四；棉花七十八点七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点四；蔬菜六十担，增长百分之三十三。

一九六〇年，灾害尤其严重。五、六月间，七一公社地区阴雨连绵达三十天之久；七月底和八月初，接连刮了两次台风；八月上旬以后，七一公社和全国不少地区一样，又持续干旱。八月份，党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要求在国家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集中力量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同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必须从公社内外，尽可能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至少须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公社党委立即采取措施，并动员公社一级机构的职工，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同时，市、县工厂也下放了一批工人，支援农业生产。这样，全公社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很快地从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八十。支农劳力一到生产队，立即投入了抗旱斗争。广大社员热烈称颂党中央大办农业，大

办粮食的号召好比“及时雨”，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大问题。

第二节 总结经验 贯彻《六十条》

生产关系的调整

七一人民公社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一年。两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促进人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自人民公社诞生的那天起，就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它的成长，两年间，多次作了重要指示，引导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一九六一年初，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①，这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六十条》总结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几亿劳动群众办人民公社的经验，对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规模、所有制、分配制度、各级职责、经营管理、内部关系和党的领导等，作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六十条》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九六一年四月，《六十条》传达到七一公社，受到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热烈拥护。社员们说：“早就盼望人民公社有个章程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办起了人民公社，现在又教导我们怎样办好人民公社。有了《六十条》，人民公社一定越办越好。”干部们说：

① 《六十条》(草案)于一九六一年六月作了补充、修改，成为《六十条》(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二月，党中央决定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决定，后来写进了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所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中。

“《六十条》对各项政策规定得具体、周到，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很明确。今后工作起来有数了。”接着，公社党委把总结经验贯彻执行《六十条》，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在普遍组织学习讨论和重点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在一九六一年夏到一九六二年春，逐一落实了《六十条》规定的各项政策。

落实《六十条》政策，最主要的一项是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涉及到七一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七一公社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土地、耕畜、大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归大队所有，劳动力也归大队统一支配，生产则由大队统一指挥。这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很高，各生产队的具体条件差别较大，生产还不平衡的情况下，就造成了一些矛盾。本来，生产队最熟悉自己队里情况，最能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然而生产的指挥调度权却归大队。例如，号上大队一些生产队干部记忆犹新：公社化初期，由大队统一安排棉花作物的面积。原来多种棉花的队不能多种，土地、工具和技术力量不能充分利用；原来少种棉花的队不能少种，有一部分茬口轮不过来，只好种在原来种稻的“潮地”（棉花宜于“半潮地”）里，结果虫害多，结的棉桃又小。生产队没有生产自主权，一切由大队说了算，还容易造成生产队干部的依赖性，所谓象“算盘珠”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再说，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大队，生产队只有使用权，也造成一些矛盾。例如耕牛，归大队所有，并由大队负责饲养和添置，生产队农忙时用牛要“挂号”“排队”，往往耽误农时；生产队对耕牛只顾使用，不了解牛的劳累程度，也容易造成死伤事故；而耕牛越是死伤，每头健康牛被使用的次数就越多，又引起耕牛新的累伤甚至死亡事故。象联明大队，一九五九年时有耕牛三十二头，以后逐年下降，到一九六一年，只有二十四头。公社起先实

行“四固定”(把土地、耕畜、大农具和劳动力四项,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就是想解决这个矛盾,但因所有权在大队,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其次,是收益分配问题。七一公社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分配自然由大队统一进行。由于各生产队的生产还不平衡,收入也有较大差别,大队统一分配就把差别人为地拉平,造成各生产队之间的矛盾。以黎明大队各生产队一九六〇年的蔬菜生产情况来说(蔬菜收入较高),由于各队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不同,产量出入很大,有的生产队亩产量比全大队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七十一,有的却低百分之二十五。收入也相悬殊,有的队收入高,如在本队单独进行分配,每个劳动力可分四百十二元;有的队收入低,每个劳动力只有二百六十三元。由大队统一分配,既挫伤了那些收入高的生产队的积极性,又助长了那些收入低的生产队的依赖性,这对于发展生产和加强团结,都是不利的。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下放后,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有生产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直接组织生产,单独进行分配。同时,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包括水面),都归生产队所有;耕畜、农具,凡是适合生产队所有和使用的,也归生产队所有,劳动力归生产队支配,公社和大队不得任意抽调。这一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社员和生产队干部的热烈欢迎。

基本核算单位确定为生产队,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内部关系的重大调整,一开始也不是所有干部都能充分理解的。有人怀疑这样是不是“倒退”了?今后生产大队是不是成为“空架子”了?还有一系列实际问题,例如干部力量问题,收入不同的作物布局问题,以及基本建设和耕畜、大农具等如何分配等经济

问题。

通过学习与讨论，大家对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核算，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当前人民公社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并不是只有生产队一级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适应目前生产发展状况的，这样可以更好地组织生产和分配，更充分地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根本不是什么“倒退”。至于生产大队这一级的集体经济，也不是“空架子”。它的公有化程度和生产水平，都比生产队更高。生产队买不起的农业机械，可以由大队购买；在生产队范围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农业机械，可以在大队范围内统一调配使用。公社一级经济，主要是举办一个或几个大队无力举办的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社办工业和其他企事业，为农业和全公社的集体经济服务。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根本特点，在现阶段它适应农村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需要，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优越性。

对于一些实际问题，由领导同群众共同商议解决。作物布局不平衡的，给予适当的调整，如联明大队第一生产队划出十亩粮食作物面积给第五生产队，第五生产队划出十亩蔬菜面积给第一生产队，第九生产队划出十五亩粮食面积给第六生产队，第六生产队划出十二亩蔬菜面积、三亩棉花作物面积给第九生产队。基本建设和耕畜、农具等的分配，在大队的主持下，由有关生产队充分协商，合理解决。公社还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同时，在评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基础上，民主选举了生产队、大队两级组织机构，并整顿党、团等组织，加强了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核心。

落实《六十条》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

公社的规模究竟应该多大，这是七一公社成立以来不断地探索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公社规模曾经作过一次调整，划出了一些大队，另外成立了虹桥、梅陇和龙华三个公社。根据《六十条》关于公社规模的规定，是一乡一社，而各级规模大小的确定，都应该对生产有利，对经营管理有利，对团结有利，并且便利群众进行监督。七一公社党委经过社员和干部民主讨论决定，报请上级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又划出一部分大队，另外成立莘庄公社。经过两次调整以后的七一公社，相当于一个大乡的范围。这样的规模使公社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具体地掌握情况和领导各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在调整公社规模的同时，对某些生产队的规模也进行了调整。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又是基本核算单位，要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七一公社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手工劳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历来精耕细作，因而组织生产的规模不宜过大。当然，生产队的规模也不能过小，过小了，劳动力和干部搭配不齐，畜力和农具不能配套，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生产队规模的大小还要有利于巩固社员之间的团结。根据《六十条》的精神，这里大体以三十户左右农户组成一个生产队，同时参照人多地少或人少地多、居住集中或分散、交通是否便利等条件，适当地大些或小些。规模过大，群众又有意见的，予以调整，宝北大队赵家巷生产队就是一个例子。

赵家巷生产队原有六十二户，一百四十九个劳动力，五百四十五亩耕地，农户分布在三个自然村：赵家巷最大，有四十户，侯家塘有十七户，还有个王家厍，五户。赵家巷的土地在蒲汇塘边，塘滩地多，适宜种蔬菜；侯家塘的土地适宜种棉花和水稻。蔬菜的复种次数多，所以赵家巷社员付出的劳动量较大，收入也较高，他们认为同侯家塘社员在一个队内分配，工分值被侯家塘

拉低了。侯家塘社员却说：蔬菜又不能当饭吃，用钱靠你们，吃饭要靠我们。这样，影响社员之间的团结。再说土地也不集中，干部领导生产不方便，生产队干部同几个劳动组长跑一圈，检查一下生产情况，要跑上半天。两村群众坚决要求调整。因此，根据《六十条》精神，调整为两个生产队：赵家巷成立一个生产队，四十户，一百零五个劳动力，三百八十亩土地；侯家塘和王家厓组成一个生产队，二十二户，四十四个劳动力，一百六十五亩土地。这样，矛盾解决了，两队也更团结了。彼此主动协作，等价交换，互相促进，生产都比以前好。

到一九六一年底，七一公社有十个生产队调整为二十一个生产队，各生产队平均由六十多户降为三十七户。

落实社员家庭副业政策，是贯彻《六十条》的又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社员家庭副业的存在，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六十条》规定，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但是在公社化初期，在“共产风”的干扰下，社员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政策没有落实。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和六月十一日，党中央两次发出指示，指出发展家禽家畜，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发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田，并由各县贴出布告，向群众公布。当时，这里的社员家庭副业已有所恢复，但发给社员的自留地数量不足。这次落实《六十条》政策，公社按照规定，给予补足，平均每户四分九厘地。自留地政策的落实，促进了农村畜牧业和副业的发展，这对于增加社会产品，增加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九星大队的社员说得好：“党这样为我们着想，我们应当更加搞好集体生产。”

公社越办越兴旺

《六十条》的一系列政策，是公社化以来丰富的群众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贯彻执行，使人民公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六十条》政策的落实，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了。在七一公社，到处出现了干部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社员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干群团结战斗的新气象。九星大队施家湾生产队的干部，主动向老农请教，依靠老农的帮助，解决了队里散稻怎样施基肥的问题。有一位老农，过去不大过问队里的事情，现在样样关心，群众称赞他“样样管”。宝北大队侯家塘生产队的社员，主动为队里奔走，去调换良种。联明大队的社员们掀起了积肥热潮，家家户户向集体交售厩肥。原来被称为“算盘珠”的生产队干部，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但把夏熟作物的管理抓得很紧，而且把秋熟作物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生动事例，到处出现。

宝南大队党支部领导社员群众抢收夏熟作物，鲜明地反映出《六十条》进一步鼓舞了社员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五月以来，小麦油菜都已成熟，可是连日阴雨，妨碍收割，干部、社员都很着急。宝南大队党支部钱明秀、朱为民两位正副女支书，同群众商量，决心利用阴雨间歇，突击抢收。他们说干就干，争分夺秒，先抢收了小麦。在抢收油菜籽时，缺少铺垫用具，社员们毫不迟疑，从家里拿来了许多扁、簰垫和草席，许多女社员连平时舍不得用的新被单也拿来了。生产队长看到要把崭新的被单放到烂泥地上去，有些犹豫，一位女社员一把抢过来把它铺开，一面说：“怕什么，被单褶皱了可以洗，破了可以补，油菜籽收不起来，集体就要受到损失了。”由于社员们的努力，全大队收获了一



许多女社员连平时舍不得用的新被单也拿来了!

万三千多斤油菜籽，并没有因灾害受到多少损失；麦子还比上一年增产三万五千二百十九斤。

李家木桥大队（现名东风大队）各生产队，在基本核算单位调整后，干劲大大增强，虽然由于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严重，产量没有达到一九六〇年水平，但他们毫不气馁，通过大队召开干部和社员代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心“六一年减产，六二年夺回”。他们在播种一九六二年夏熟作物之前，就订出了茬口计划，调来了高产麦种，施足了基肥，然后种足了面积，开好了排水沟。一九六二年春耕一开始，他们又采取措施，积极创造条件，把单季稻全部改为双季稻，同时大种“十边”地。由于广大社员和干部以极大热情投入战斗，尽管一九六二年又遭受了较大的自然灾害，李家木桥大队的粮食产量却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十二万斤，实现了“六一年减产，六二年夺回”的誓言。

《六十条》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在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七一公社的生产仍然得到了进一步增长。一九六二年，全公社粮食作物产量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三十九万斤，棉花增加了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九斤，蔬菜增加了四万九千一百六十七担。社员们歌颂道：

“《六十条》呀放光芒，
人民公社越办越兴旺。
人多心齐斗志昂，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五章 一九六二年的严重斗争

第一节 抵制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反对“三自一包”

一九六二年，在贯彻《六十条》基础上茁壮成长的七一人民公社，又遇到了新的考验。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苏修叛徒集团在这时突然撕毁“合同”，撤退专家，逼还债款，并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勾结，掀起新的反华浪潮。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蠢蠢欲动，叫嚣窜犯大陆。一时乌云滚滚，群魔乱舞，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兴风作浪，对社会主义发起新的进攻。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也里应外合，在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系统地抛出了“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发展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的复辟资本主义路线。刘少奇公然叫嚷：“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在刘少奇的指挥下，中共上海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丕显、曹获秋之流，不顾柯庆施同志的坚决反对，鼓吹在上海郊区搞单干，污蔑“农民是赞成单干，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们还竭力怂恿扩大自留地，发展自由市场。陈丕显亲自上阵，跑到七一公社召开了一个所谓

“懒汉座谈会”。会上，他绝口不谈搞好集体生产，却拚命鼓吹单干。他逐个地问到会的人：自留地种得多不多？私人猪养不养？宣扬“种好自留地，养好私人猪，就是对国家的贡献”。临走时还叮嘱：“以后我要来看你们的自留地的哦！”在七一公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烈地展开了。

自由市场的泛滥，对七一公社集体经济起了很恶劣的破坏作用。七宝镇，历来就是“七一”地区城乡资本主义勾结的集结点。现在，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伟大胜利，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有时还非常尖锐。每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有蠢动，七宝的自由市场就特别活跃。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或者亲自出马，或者派出得力亲信，象走马灯一样来到七一公社，猖狂叫嚷：“对于自由市场，第一是开放，第二是开放，第三还是开放。”“不要怕它乱，它现在还乱不起来。不要去管。”他们用开放资本主义来捣乱社会主义经济。于是，七宝镇上的自由市场空前“热闹”起来，高峰时私设的摊贩竟有三、四百处，连那些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大米、食油、布匹等物资，也涌入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泛滥，大大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些富裕中农，丢下集体劳动不顾，或埋头搞自留地，或成日成夜地捕鱼摸蟹，去自由市场卖高价。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破坏活动。新龙大队二队有个反革命分子，在自由市场上贩卖黄金瓜，赚了很多钱，还煽动别人闹私分。黎明大队有个生产队私分集体生产的黄金瓜，有个富农把分到的每担八元的黄金瓜以二十五元一担的高价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非法牟利二百三十四元。还有一些坏人盗卖生产队的粮食等农、副产品。自由市场的泛滥，还促使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蔓延，毒害干部和群众，滋长弃农经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和大吃大喝、挥霍

浪费现象。投机倒把分子十分活跃，少数暴发户已经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七宝镇上的自由市场，成了当地农村资本主义的孳生地。

广大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坚决反对发展自由市场，他们批判这种修正主义路线扶植下的自由市场，是“发展资本主义有自由，破坏国家计划有自由”。群众愤慨地说：“这种‘自由’越多，我们的苦头就越大。”贫下中农纷纷提出：“这股歪风再不刹住，人要坏了，地要荒了，天要变了。”他们迅速行动起来抵制这种邪门歪道。联明大队老贫农毛德根，在队里收获黄金瓜的时候，发现有些人窃窃私议：“头藤瓜香、甜、脆、嫩，到自由市场上去能卖到好价钱，赶快分给社员。”他感到苗头不对，急忙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把国家分配的任务丢在一边，拿集体产品上自由市场，绝对不行！”可是队里有人不顾群众反对，还是把几十担黄金瓜私分了。当毛德根回家看到分给他的半筐瓜时，气愤极了，立即端起筐子赶到队里，全部退还。他坚决表示：“我们贫下中农决不拆社会主义墙脚，决不能同资本主义沾上半点边。”新龙大队二队少数社员，受到阶级敌人的煽动，分不清是非，也要求私分生产队的瓜去卖。生产队长老唐觉察到这是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少数社员的资本主义思想搞垮人民公社，就立即召开队委会讨论对资本主义势力发动反击；同时，检讨了自己前一个时期放松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队里出现这种错误倾向，说明阶级敌人总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而少数人头脑里的资本主义思想又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所以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我们一定要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于是在队委会领导下，发动社员批斗了那个挑动群众贩卖黄金瓜的阶级敌人，并在全队社员中进行了一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社员群众从斗争中提高了觉悟，他们说：“如果头脑里只想上自由市场卖高价，让资本主义倾向继续发展，就会背叛社会主义，也对不起城市工人阶级。”他们回忆说：“工人老大哥总是在我们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支援我们。有一年，我们办互助组，遇到大旱，老大哥带着抽水机来帮助我们抗旱，还和我们一起挑水浇地。如今，城市工人阶级急需我们多多支援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我们怎么能忘了他们呢？”由于社员和干部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不仅制止了私分，还超额百分之二十八完成了交售黄金瓜的任务，受到国家收购站的表扬。

在“三自一包”影响下，七一公社还出现了一股拆小生产队的歪风。一九六一年，根据《六十条》，已适当调整了过大的生产队，解决了生产队的规模问题。但是，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庇护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煽起了生产队“越小越好”的歪风。

黎明大队第二生产队的情况最严重。这个队，共三十五户，其中有个骆家角自然村，只有七户人家，包括贫下中农两户，富裕中农三户，富农一户，还有一个反革命。阶级敌人暗中煽动，要骆家角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普遍反对拆队，他们认为，在骆家角贫下中农不占优势，倒是少数不三不四的人活跃得很。闹拆队，肯定是阶级敌人捣鬼。公社党委也不同意拆队。但当时在七一公社蹲点的上海市委内的一个走资派，却不顾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的正确意见，强行批准拆队。他还拖着长腔造舆论说：“‘群众’要求拆队，说明他们相互有矛盾，不解决就会影响一部分社员的积极性。现在国家财政经济有困难，要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多生产，多生产！”就这样，在黎明大队出现了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所谓“生产队”。这个“生产队”，实际上是一个单干村，七户人家各管各，弄弄自留地，跑跑

自由市场，阶级敌人气焰嚣张，集体生产搞得一团糟，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夏熟打下的粮食，接不上秋收。原第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看到这种情形十分气愤地说：“骆家角，骆家角，现在成了谁家的角落？”他们强烈要求解决骆家角的方向道路问题。

从骆家角刮起的这股“拆队风”，影响了别的一些生产队。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先是挑拨社员之间的不和，然后借口团结问题，煽动拆队。地富分子比较集中的个别生产队，坏人就利用拆队，形成自己的优势。有的生产队，还出现了一部分较富裕的社员想把较困难的社员排挤出去的情况。

广大贫下中农清醒地看到，闹拆队，是闹单干的第一步，他们坚决反对。宝北大队赵家巷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同闹拆队的逆流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事迹，充分表现了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政治觉悟。

赵家巷生产队在贯彻《六十条》时，曾经调整过一次规模。调整后赵家巷生产队的四十户社员，居住在一条小河的东西两岸，生产队干部和大部分贫下中农住在河东；地、富分子大多住在河西。其中有个富农分子妄想把赵家巷再拆成河东、河西两个队，以便自己可以控制河西，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为此，他煽风点火，提出“越小越有利，拆队拆到底”的谬论，并恶意挑拨河东、河西社员的团结，造谣说“住在河东的生产队长看不起我们河西的社员”，叫嚷“我们都有两只手，为啥要受别人气”。为了制造拆队气氛，他炮制了一份“河西生产队干部名单”，故意到处“漏风”。这个家伙知道自己成份不好，不便抛头露面，只能在幕后操纵，就推别人当队长，假惺惺地说自己“还是做个参谋合适”。为了装点门面，他竟然指使人去拉拢共青团员潘金荣：“拆队后请你当治保组长，帮着抓抓‘阶级斗争’。”

小潘这个贫农的后代，一听觉得这话不是个味道，后来他又

了解到那个富农也混在里面捣鬼，就更加警惕起来，觉得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存好心，这几天闹拆队一定是阶级敌人的阴谋，立刻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并召开社员大会，揭发、斗争了这个富农分子，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赵家巷生产队刹住了闹拆队的歪风后，河东、河西的社员更加团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更加巩固了。

继大搞自由市场和闹拆队之后，在七一公社出现的另一股妖风，是由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直接刮起来的，这就是企图解散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养猪场，名曰“母猪下放”。

在养猪问题上，柯庆施同志根据上海郊区的具体情况，在贯彻“公养与私养并举”方针中，强调要办好集体养猪事业。几年来，七一公社的集体养猪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办了养猪场，这对促进农作物增产，提供城市肉类副食品，壮大集体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陈伯达却把破坏集体养猪事业作为搞垮集体经济、瓦解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九六二年四月，陈伯达以“调查研究”为名，派了一帮人到七一公社新龙大队来摸底。六月，这个政治骗子窜到新龙大队，召开干部、老农座谈会，亲自兜售他的“母猪下放”的黑货。他大谈农民私人养母猪比集体养对国家“贡献更大”，胡诌了一通国家经济困难，饲料缺乏，集体养猪没有条件的歪理，然后煽动大家：“我们要把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养猪场里的母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养，每养一头母猪拨给半亩饲料地，哪个要养？”一语道破“天机”，他的“母猪下放”，就是在养猪问题上搞单干。

这个政治骗子的话，在老农和干部们的思想上打了个很大的问号。他们在心里嘀咕着：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饲料比较困

难，这完全可以而且正在得到克服，为什么现在要把母猪统统下放呢？这不是要拆散集体养猪场吗？这决不能同意！尽管陈伯达一再“动员”，会上没有一个人理睬这个庞然大物的“建议”。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便没精打采地说了一句：“母猪下放这件事很重要，就在你们大队试个点，先走一步吧！”说完，夹起皮包溜了。

这时，对于陈伯达的话憋了一肚子气的支部书记沈荣根，问大家准备怎么办。一队副队长响亮地说：“要拆散集体，我们勿上！”接着，屋里爆炸似地一片喊声：“勿上！”“勿上！”看到这种情形，老沈根据毛主席关于“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的指示，当场决定：集体的母猪决不能“下放”，大家分头去做工作，坚决把好这个关。

虽然陈伯达派来的“调查组”连续几个黄昏挨家挨户动员，但社员们不是推说“从没养过母猪”，就是说“家里劳力不足”，没有一个答应的。就连被他们一连几天缠住不放的三个社员，也不听他们这个主意。最后，他们无计可施，只得灰溜溜地撤走了。

刘少奇一伙在一九六二年刮起的“三自一包”歪风，并没有能把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吹垮。“七一”地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勇敢地抵制了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坚定地迈步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打击反攻倒算活动

一九六二年夏天，当七一公社广大贫下中农正在进行着反对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斗争时，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

声中，也利令智昏地跳了出来，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直接危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念念不忘的是他们被剥夺了的生产资料。一个日伪时期充当七宝镇维持会长的工商地主拿着变天账，向贫下中农催讨解放前的债款。七宝大队有个姓顾的地主分子公然叫嚷着要“收回”土改时被没收的楼房，还得意忘形地对一个人说：“等我把楼房要回来开个饭店，你就到我店里当伙计，既不用下田又能赚大钱。”居然做起他当年的剥削梦来了。七宝大队贫下中农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揭发了这些家伙的反攻倒算活动，怀着满腔阶级仇恨，对他们进行了狠狠的批斗，打击了他们的反革命气焰。

这些剥削阶级分子的复辟迷梦很快就破灭了。而友谊大队一个富农分子的反攻倒算，因为在干部中找到“靠山”，却要严重得多。这个富农借口死了女儿，要同村的地主分子王伯贤替他看“风水”。王伯贤煞有介事地说：“你这间客堂，是‘挑担客堂’，注定要死人，得赶紧拆掉，另找一块地基盖房子。”两个坏蛋商议以后，这个富农分子就向生产队去讨他在入社时已归了集体并已造了集体猪棚的宅基地。这个队的个别干部，早就在地富分子的腐蚀拉拢下，和他们勾勾搭搭，现在看到富农分子来要这块宅基地，当即慷慨地“批准”了。

但是，贫下中农不批准！解放前在这个富农家当了多年长工、受尽残酷剥削的老贫农马锡根，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说：“蒋介石在那边一喊反攻大陆，他在这边就马上动起手来，梦想再爬到我们头上来，不行！决不能让地主、富农再得势！这块地基坚决不能给！”

这个富农分子十分嚣张：“我的老客堂，墙壁已经敲掉了。不还地基，我不答应。”

贫下中农针锋相对：“你自己的墙壁，由你去敲，但集体的地基，一分一厘也不能动！”

这个家伙自恃有人撑腰，猖狂叫嚷：“我宁愿打官司，也要干下去。”

贫下中农对他齐声喝道：“告诉你！眼下不是你当伪保正的旧社会，那时衙门由你直进直出，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再捣乱，马上制裁！”在广大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这个富农分子的阴谋破了产。

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最终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妄想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了这个罪恶目的，他们除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外，还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宣扬孔孟之道，散布封、资、修的腐朽思想，从而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七一公社，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利用在七宝镇上的茶馆和剧场里说书、演皮影戏，散布了大量思想毒素。有的青年中了毒，每晚泡在那里，脑子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搞得浑淘淘，白天身子软绵绵，没劲搞生产，个别甚至成了他们的俘虏。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有些阶级敌人还阴谋直接夺取集体经济的领导权，指使子女伪装积极，利用某些干部阶级斗争观念淡薄的缺点，窃取了会计、保管员等职务，贪污盗窃，破坏集体经济，或利用权力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实行阶级报复。在敌人施展打进来、拉出去的阴谋下，个别生产队的领导权被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实际上落到了地主、富农手里。

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广大贫下中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许多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夜深人静之时，拿出旧社会血泪斑斑的讨饭棍，百衲千孔的破衣衫，看了又看。他们自觉地在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思考着打退阶级敌人进攻的

办法。广大贫下中农深知被压迫、受剥削的痛苦，也最懂得保住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的重要。面对着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他们怒火中烧，迫切要求进行反击！

第二节 向敌人主动进攻

八届十中全会指方向

一九六二年九月，正当我国上空乌云翻滚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条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七一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各级干部满怀激情，投入了学习毛主席指示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热潮。他们回顾了解放以来特别是建立人民公社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大大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认识到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把他们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梦想



八届十中全会指方向。

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而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政治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影响也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公社党委和一些领导成员在学习中还联系思想，初步检查了前一时期在资本主义泛滥时，没有很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单干风。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带领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发起新的进攻。

八届十中全会给七一公社带来了一派奋发、战斗、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在九星大队，社员们在大队小学里热烈讨论开了。议论的焦点是：有人说现在“地主没地，富农不富，大家都在一本账上记工分，一杆秤上分粮、草，一块地里做生活，还讲啥个阶级？”这个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问题一提出，贫农社员老潘当即发言批判：“一本账、一杆秤、一块田，这些都是现象，我们要看本质。地主、富农过去不劳动，靠剥削吃饭，现在不能剥削了，只好劳动，他们会甘心情愿吗？……”他的话还没讲完，大家就齐声插嘴：“他们？他们才不会甘心！”“对！”老潘接着说：“前不久不是发生了地主领着子孙望田头、反革命分子剪断抽水机电线，破坏抗旱的事吗？表面上他们也在公社田里劳动，可是他们想的、做的，和我们哪里有一点相同呢？我们一心想的是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支援国家建设，而他们却成天在动坏念头，搞破坏，想再过剥削生活。”一个贫农社员补充说：“我们坚决反对单干，可是村上的地主、富农一听到闹单干的风声，就象饿狗闻到了屎臭，伸着鼻子到处嗅，有些家伙还公然提出‘拆队拆到底，分田分到户’，他们和我们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会开得越来越热烈，讨论变成了对阶级敌人的揭发批判。阶级敌人反对社会主

义的破坏活动，从反面教育了广大群众：地主、富农虽然已被打倒，但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是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反动本性不会变，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跳出来表演。一些干部也记取了过去“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的教训，认识到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有眼看不清方向，有鼻闻不出香臭，有腿走不上正路”，阶级敌人的阴谋就会得逞。

在李家木桥大队，社员们以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武器，总结了这个大队发生的一个富农分子拉拢腐蚀干部事件的教训，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这个富农分子，惯于阴一套阳一套。对干部，心里恨得要死，表面上却很热络。夏天他经常缠着干部说：“我屋里风凉，到我屋里坐坐。”干部来了，他又是递香烟，又是开收音机，装得格外亲热：“我两家是一姓，同姓一家嘛。”就在“同姓一家”谬论的迷惑下，有个干部每逢值夜班，就到这个富农家里烧烧吃吃。最后，竟和这个富农一起在中秋前夕偷挖邻队的毛芋艿。群众尖锐地批判了“同姓一家”这个用以欺骗劳动人民的孔老二的宗法伦理观念。他们说：世界上只有贫下中农之间的阶级情谊，没有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之间的宗族“亲爱”。李家木桥大多是姓李的，但是在旧社会，姓李的地主、富农一向残酷地压榨姓李的贫下中农。阶级敌人鼓吹“同姓一家”，目的是搅混阶级阵线，掩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重新奴役和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的阴谋，我们万万不能受骗上当。

在联明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里，有人认为：“我们生产队一无地主，二无富农，有什么阶级斗争？”为了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干部引导大家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

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讨论热烈地展开了。一个老贫农说：“是这样！我们队里，虽说没有地主、富农，但这几年来，哪一年是风平浪静的？不平静嘛！年年有事，年年在斗。”另一个社员接着说：“队里有几个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倾向很严重，社会上刮什么风，他们就在队里掀什么浪。就拿今年讲，先是风风雨雨地传播分田到户的消息，接着叽叽咕咕要拆队，热天又吵着私分大田的黄金瓜、毛豆，反正别的队里闹的‘新’花样，我们这里一样也不少，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这样的讨论，使大家开了窍：一村一队可能没有地主富农，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阶级斗争的影响，是不受村界队界限限制的，它无孔不入，一有可能就借尸还魂。在人民内部，一些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经常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同时，在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还可能出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队里，已经有过这类事情了。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有可能被坏人利用，甚至变成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的对立面。因此，我们决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千万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了，就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大觉啊！

在学习毛主席指示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同时，公社党委还组织干部、社员根据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这两个重要文件，对照检查了贯彻《六十条》的情况，进一步认识到，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人民公社。

党的基本路线、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各项重要文件，教育了七一公社广大干部和群众，使他们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阶级斗

争的学说武装起来，斗志高昂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新的战斗打响了

天兵怒气冲霄汉。七一公社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群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怀着对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主动展开了进攻。

这个进攻战，根据先打击暴露的敌人，后打击隐蔽的敌人的部署，首先指向严重扰乱人民公社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势力。

号上大队贫下中农，在党支部领导下，打响了对阶级敌人主动进攻的第一炮。富农分子王文秀大搞投机贩卖，每天从七宝低价收购蔬菜，运到徐家汇高价出卖。她先是用一根扁担挑，后来“生意”做大了，改用脚踏车装，最后竟自己买了一辆胶轮拖车，一次就贩运几百斤，还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影响极坏。广大社员一致要求狠狠打击这种资本主义破坏活动。战斗打响以前，大队党支部在号上小学连夜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大家又一次学习了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的教导，士气十分高涨。王文秀所在生产队的共青团员和青年民兵决定用大字报作武器，揭露王文秀的罪行。时节正值寒冬，这些“小老虎”们的战斗激情，把零度以下的寒夜闹得热气腾腾。写的写，贴的贴，一会儿，大字报贴满了王文秀家的墙。天一发亮，大字报前就挤满了群众，大家一边看，一边愤怒揭发并斥责这个富农分子的反动思想和罪行。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大队党支部又召开大会对她进行了批判。

号上大队首战告捷，在七一公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红明大队朱家塘生产队贫下中农，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粉碎了刑

满释放分子朱福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朱福顺曾一度篡夺了朱家塘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权，后因反革命罪行暴露被逮捕。刑满释放以后，继续耍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对生产队长“绝对”服从，“叫做啥就做啥”，并肉麻地吹捧说，有了这个队长领导，“红旗可以插到九霄云外去”，而在背地里却对队长恨得牙齿格格响，阴谋策划暗杀队长。为了掩护他的反革命活动，这个家伙拉拢了少数觉悟不高的青少年到他家里鬼鬼祟祟地搞到深夜。哪里有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哪里总会出现怪事。就在这个家伙的蛊惑下，这个队当年的征兵任务没有完成，队里还出现多起反动谣言。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教育下，广大贫下中农用阶级观点分析队里的现象，发现了这个家伙搞反革命活动的不少蛛丝马迹。大队党支部及时抓住了这些线索，因势利导，顺藤摸瓜，揭开了这个队的阶级斗争盖子。刑满释放分子朱福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腐蚀青少年，以及阴谋暗害队干部的罪行被揭露出来了，这家伙又一次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惩罚。

反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群众斗争步步深入，那些隐蔽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也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七宝镇上的革命群众，学习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后，积极投入了战斗。他们对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的孟公威的行动引起了警惕：为什么他一年到头关着大门，连邻居小孩也不让进？为什么他表面上穿得破破烂烂，到处拣菜皮拾垃圾，而群众却常常听到他家里油锅炸得劈啪响？为什么他说自己是江苏人，而有一次他老婆讲他是浙江人？一天，他发泄对共产党刻骨仇恨的黑诗落到革命群众手里。经过上级机关的批准，革命群众从他的老窝里查获了妄图倒算的土地房屋账册、高利贷借据以及大量金银财物。原来，孟公威是解放初期从浙江逃来七宝的血债累累的老反革命分子。经过广大群众批斗，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这个坏蛋。

与此同时，九星大队贫下中农进行了一场深挖潘道生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地主的儿子潘道生，在一个长时期里白天睡大觉，晚上到七宝镇上的书场等处鬼混，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常来找他，特别是从他那里经常传播出一些谣言和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潘道生的形迹引起了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的极大注意。这时，七宝镇商店职工扭获了一个盗窃国家财产的罪犯，他供认自己系受潘道生的指使，为反革命小集团拼凑经费，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群众在专政机关的支持下，彻底清查了这伙跳梁小丑的全部反革命活动，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

对阶级敌人的主动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社员的斗志，也震慑了社会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在广大社员群众和各级干部狠抓阶级斗争的强大声势下，投机倒把分子胆战心惊，开始从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的自由市场上退缩了。曾经一度出现的私分集体农副产品的歪风也收敛了，那个只有七户人家的骆家角“生产队”，在贫下中农日益高涨的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浪潮下，也开始变化，正气抬了头。公社党委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撤销了这个资本主义势力泛滥、贫下中农处于无权地位的所谓骆家角“生产队”。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发动的这场进攻战，初步闸住了严重泛滥的资本主义逆流，保护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二年冬天，广大社员在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鼓舞下，掀起了新的冬季生产高潮，一九六三年的春耕准备工作做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为夺取全年丰收打下了基础。

面对着越来越好的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七一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群众感慨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一小撮没有改

造好的地、富、反、坏出笼，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那就会把七一公社闹得乌烟瘴气。一九六二年的峥嵘岁月，又一次证明，只有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公社才能战胜恶风险浪，并显示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第六章 四清运动

第一节 排除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

七一公社的广大社员和干部，在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所进行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这还只是初步的。为了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的复辟活动，迫切需要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思想各个方面向阶级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强烈愿望。

一九六三年夏天，在七一公社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是根据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逐步展开的。《十条》又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告诫全党：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还强调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敌情的严重性还缺乏认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正确地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在四清运动中，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

^① 这次城乡社教运动，后来统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内部矛盾，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那些混进党内窃踞领导职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于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党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条》，为四清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极大地鼓舞了迎着阶级斗争风浪前进的公社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学习中，大家联系七一公社阶级斗争形势，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不把这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听任党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互相勾结，兴风作浪，为所欲为，“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们说：“毛主席最熟悉农村情况，句句说到我们心里。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条》是引导我们不断胜利前进的‘方向盘’，是反对修正主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防腐剂’，是打击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的‘锐利武器’。”大家坚决表示要积极投入这场斗争。

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七一公社开展了面上的四清运动。这次运动，是在宣传和学习《十条》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共上海县委派出了由县委机关和公社机关部分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在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上，代表们进一步学习了《十条》的基本精神，批评了公社党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指出：自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虽然刹住了几股歪风，但是公社党委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引向深入。公社党委接受了批评，表示决心带领广大群众和干部，把运动搞好，并鼓励广大干部积极参加运动，启发和教育某些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主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在七一公社广大社员和干部中进一步掀起了宣传和讲解《十条》的热潮，大讲阶级斗争形势，大造革命声势。同时，按照《十条》的要求，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四清运动作好准备。可是，正当七一公社的四清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却受到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

一九六三年夏天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按照《十条》指示进行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日益深入发展。刘少奇一伙背着毛主席，精心炮制了一个黑样板——“桃园经验”，到处兜售。后来，又按照这个黑经验，抛出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同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条》相对抗。他们歪曲四清运动的性质，极力回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却大谈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以保护他们那一小撮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矛头指向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基层干部，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四年夏天，刘少奇趁柯庆施同志生病，窜到上海，推行他的“桃园经验”。上海市委内走资派陈、曹之流亦步亦趋，大肆攻击前一阶段的四清运动“打了败仗”，要“推倒重来”，并按照“桃园经验”在金山和奉贤两县搞试点。不久，这股形“左”实右的黑风，就刮到了七一公社。

十二月下旬，西北风刮个不停，公社许多干部和群众的心情十分沉重。县委的某些领导人，要公社根据“桃园经验”中“基层组织大部分烂掉了”的说法，排出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大队、生产队名单。公社党委的许多同志觉得，这几年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落实《六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七一公社的各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充实，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大家排来排去，全公社七十七个生产队，问

题比较严重的只有五个。但是，县委的某些领导人却硬要公社按照“桃园经验”的框框去排。他们提出所谓“打破框框，反对右倾”，“重新认识农村基层政权”的口号，说什么“不在我们手里”的基层政权，不仅包括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大队、生产队，还要包括在歪风邪气面前，畏缩不前、动摇不定的干部所领导的大队、生产队。公社党委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有的同志说：“在‘七一’地区工作十多年，和基层干部几乎天天接触，哪个干部的家门灶口朝哪里都清清楚楚，怎么会有那么多干部烂掉呀！”有的同志提出，这种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样，对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进行了抵制。

然而，由于陈、曹极力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七一公社的四清运动仍然受到了“桃园经验”的严重干扰。特别突出的，是借口清理工分，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本来，某些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多占、多记工分的现象是存在的，社员群众的意见也比较大，所以结合年终分配，清理工分是完全必要的。通过清理工分，教育干部，并对过去一些不合理的工分定额作适当的调整，也是应该的。但这些都必须发动群众，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十条》精神和党的政策，合理解决。可是，七一公社四清工作队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上海县委秉承陈、曹意旨搞的所谓清工分的“经验”，不分青红皂白，规定每个大队至少要清掉五千工分。

为了完成所谓清工分的“指标”，工作队大查工分账，只要发现什么时候哪个干部的工分高了，即使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是应得的工分，也被砍掉。譬如，为了发展集体养猪，解决饲料问题，到市区去踏咸汤（泔脚下料，可喂猪），原先干部社员讨论决定，有自行车的人，轮流去，踏一担记四个工分，多踏多记，有的

干部和社员一天踏两趟，可得三十多分，并未违反多劳多得原则。可是工作队不作调查分析，也不问定额是否合理，就认为这是干部培养高工分，带头搞“资本主义”，一刀砍掉。其他类似的情况，如到市区出售蔬菜、鬻河泥，也都照此办理。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下子就被砍掉六百三十分。

清工分最着力的是在联明大队。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共被清掉一万六千分，平均每个生产队一千三百多分，最高的一个生产队被清掉了五千多分。被清掉工分的名目有十多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工分。尤其错误的是把个别社员应得的工分也清掉了，象放水员值夜班很辛苦，报酬理应比一般劳动高些，但也被认为是不合理，把高出一般工分的部分清掉。就这样，仅九个大队就被清掉八万零五百工分，平均每个大队近九千分。

接下来，搞干部退赔。按《十条》规定，该退赔的必须认真退赔，同时也要“合情合理”。但是，工作队不按《十条》去做，却按“桃园经验”搞“破产退赔”，要群众“看得见，摸得到”。还在群众中鼓动说，过去群众提意见是“清水煮蹄膀——白蹄（提）”，这一次要大家吃“酱油煮蹄膀”，不是白提了。提出“退赔款的来路要一笔笔落实，退赔时间要一个一个地限死”，并宣称这样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果然，一些干部因退不出现款，只好以实物作抵，直接影响了干部的家庭生活，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于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社员们很有意见，他们说：“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有了小毛小病，改了就好，一刀斩，做法太过分了。”许多干部思想不通，九星大队长阮世才这个年过半百的贫农老干部，心情一直很郁闷。他反复在想：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解放以来各项运动和工作都带头参加，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对毛主席都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怎么能用这样粗暴的手段对待他们呢？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但一时又解不开这个疙瘩。只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暗暗高兴。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歪曲四清运动性质的奇谈怪论，针对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对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坚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二十三条》拨正了四清运动的航向，重申了《十条》的基本精神，七一公社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象久雨后见到了太阳，感到分外亲切、开朗。阮世才这个老贫农头脑里的疙瘩解开了，他激动地说：“现在，前进又有了方向了。”许多干部对照《二十三条》，看出了那条形“左”实右路线的危害性，说它是“乱整一气，不讲政策，不分敌我”，真正的坏人没有清出来，不少好人反倒受到打击，使广大革命人民感到痛心，而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十分嚣张。有些大队，地主、富农分子公开跳出来，叫嚷自己是“劳动起家”，要工作队给他改变成份，乘机搞翻案活动。贫下中农说，这是“干部挨板子，敌人钻空子”。事实证明，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利益。错误和挫折也教育了广大四清工作队员，他们在学习《二十三条》的基础上，认识也有所提高。

一九六五年春天，阳光显得格外灿烂。在《二十三条》指引下，七一公社的四清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继续前进了！

第二节 在《二十三条》指引下

形成团结对敌新局面

一九六五年夏天，七一公社是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广大贫下中农和各级革命干部，都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和《二十三条》，到处热烈议论，准备迎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高潮。他们急切盼望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夺取四清运动的胜利。

但是，由于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部分干部和群众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想法，有的对于能否搞好四清信心不足，有的干部还有被动挨整的思想，等等。为了逐步建立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把运动引向深入，广大群众和干部反复学习《二十三条》和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大讲四清运动的深远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决心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的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很高。中华一队一个女社员不识字，叫小儿子读给她听。她说：“毛主席的书我看不懂，但听得懂。干革命要听毛主席的话，就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九星七队贫农蒋妈妈，要小青年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这种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动人事例，不断成批涌现。广大贫下中农学习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以及贫下中农是“革命先锋”的道理，激发了阶级感情和革命斗志。群众发动起来了。有的贫下中农坚定地表示：“我们在旧社会吃苦最深，对阶级敌人最恨。毛主席一贯支持我们闹革命，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

的教导，把四清运动搞好。”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主的骨干队伍逐渐形成了。同时，不少干部在《二十三条》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下，也打消顾虑，积极投入运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了团结教育干部的工作。

《二十三条》指出了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在七一公社的不少单位里，也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前几年，在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下，许多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有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就是真刀真枪打仗，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衣食住行，无牵无挂”，因而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腐蚀拉拢下，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在前一阶段的四清运动中，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干部中存在的某些政治上阶级界限不清，经济上公私不分和贪污，以及个别人蜕化变质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干部们也没有很好地从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认识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

四清运动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干部中的问题是需要运动中逐步加以解决的。但是，正当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按照《二十三条》的指示，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那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帮助他们洗手洗澡、轻装上阵的时候，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曹之流却竭力歪曲《二十三条》，制造新的干扰。陈丕显公然篡改《二十三条》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规定，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重点是整干部队伍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广大基层干部。曹荻秋也亲自跑到上海县塘湾公社“蹲点”，提出“大胆怀疑”的口号，搞“倒轧账”、

“逼、供、信”，对抗《二十三条》。在这股妖风影响下，七一公社某些单位又出现了形“左”实右的错误做法，把矛头指向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如联明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会计，经济上犯有多吃多占的一般错误，却被怀疑贪污千元以上，还对他搞了“破产退赔”。

陈、曹之流的破坏，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那些形“左”实右的错误做法，没有继续扩散。

团结教育干部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为了教育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共同对敌，在贫下中农和干部中广泛开展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活动，分析“和平演变”的危害，进行阶级教育和两条道路斗争教育，帮助干部提高觉悟。

九星大队有个会计，犯了贪污的错误。一位老贫农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你的娘是苦出身，解放前给地主家做帮工，风里来雨里去把你扶养大，真不容易啊！解放后你上了学，享受国家助学金，读到初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后，你当上了会计，做了团干部，大家把你看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你，受了坏人的影响，一心想造房子，讨娘子，贪污集体的钞票。你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贫下中农的阶级关怀，使这个会计流下了悔恨的眼泪，他主动交代并且积极退赔贪污的现金，表示一定改正错误。沪星大队一个生产队长犯了错误，贫农社员杨余香多次找他谈心到深夜，并以他的母亲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血泪史，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帮他分析翻身忘本的思想根源，使这个队长深受感动，他决心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冲向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公社畜牧场党支部的一个负责人，原来是一个大队干部。一九六二年陈丕显亲自窜到七一公社，卖力地推行刘少奇“三自一包”修正主义路线，鼓吹干部要带头大种自留地。这个干部上了当，一度方向不分，道路不辨。他积极经营自留地，影响了一些社员也热衷于搞

“小自由”，使集体生产受到损失，这一年全大队粮食减产四万多斤。运动中通过学习和群众的帮助，他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决心要做到：耳朵灵，多听群众意见；眼睛亮，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头脑清，不上阶级敌人的当。他紧紧依靠革命职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畜牧场阶级斗争情况很复杂，如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刮起“三自一包”黑风时，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竭力煽动部分职工搞资本主义活动，将集体的饲料地当自留地来种、把私人的猪弄到牧场来养、杀掉奶牛拿到自由市场去卖等等，妄图搞垮畜牧场。这次由于党支部充分发动了群众，狠刹资本主义歪风，挖出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清除了一个腐蚀拉拢职工、破坏集体经济的坏家伙。党支部又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使职工的精神面貌大变，社会主义正气大大发扬。到四清后期，母猪增加了二十多头，奶牛发展到近六十头；经济收入迅速增加，由亏损变为盈余，畜牧场越办越兴旺。这个干部深有体会地说：“阶级斗争抓得紧，两条道路分得清，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才能办得好。”

事实表明，七一公社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经过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也是可以改好的。在《二十三条》的教育和鼓舞下，大多数干部进一步焕发出革命的朝气。中华大队一个生产队长，看到阶级斗争在某些干部身上的反映，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认真检查了过去“纱帽拎在手，不如意就丢”的错误思想，决心挑好队长的担子，工作干得更起劲了。有些干部认识提高以后，写了决心书贴在墙上，要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严格要求，处处监督。

通过对犯错误干部的帮助和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广大干部和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爱国家、爱集体

的精神大大发扬。就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行了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形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新局面。

把反革命气焰打下去

一九六六年二月底，七宝镇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里举办的“阶级敌人复辟罪证展览会”，推动了七一公社对敌斗争的高潮。在一天半的时间内，来参观的就有三千多人。会上陈列的一张张图片，一件件罪证，激起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阶级仇、民族恨，从而加强了他们粉碎阶级敌人阴谋活动的斗志。一个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开始了。

七宝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斗志昂扬，狠狠打击了一再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的地主分子顾克勤。这个家伙一九六二年在蒋匪叫嚣窜犯大陆时，跳出来要收回房子，曾经受到贫下中农的迎头痛击；在四清运动中，他又一次跳出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胡说“法律不及病与老”，而他“死也快死了”，还要被管制，真是“不仁”。他还诬蔑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七宝大队的社员群众狠狠批判了顾克勤的反革命谬论。一个老年贫农社员对他的批判，表达了广大社员的革命义愤：“顾克勤，你听着！解放前你欺压剥削我们贫下中农，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施行过什么‘仁政’，讲过什么民主和自由。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我们劳动人民有最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我们的法律就是要对你们实行专政，决不让你们再有剥削压迫我们贫下中农的‘民主’和‘自由’，对你们的反动行为我们决不施‘仁政’！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就要坚决制裁！”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使顾克勤不得不低头认罪。

敌人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对敌斗争开展以后，李家木桥大队的地主分子赵琴生，感到“风向”不对，赶紧披上新的伪装，对群众施行小恩小惠，腐蚀拉拢，见了干部更是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又请示，又汇报，一再表白自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重新做人”，妄图蒙混过关。但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在一次批判会上，贫下中农和干部以大量事实，揭露了他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梦想变天复辟的阴谋，撕下了他的层层画皮：土改后，他看到家境破落，“触景生变”，哀叹“今非昔比，懊丧悲痛，顿然若失”，在人前装出一副“老实相”，但在背地里则把对党和人民的反革命仇恨藏在心底，每逢国庆节，举国欢腾，他却关起大门，逼着全家喝稀粥。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妄图窜犯大陆时，他天天去大队商店看报纸，妄图从字里行间找到蒋匪窜犯大陆的消息，复辟变天的心理，昭然若揭。一位老贫农愤怒地斥责：“赵琴生面上笑嘻嘻，肚里藏毒计，一刻也没忘记复辟。现在他又耍花招，想滑脚溜走，逃避群众对他的斗争，绝对办不到！”在群众强大的攻势下，赵琴生原形毕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对敌斗争在深入发展，各大队都摆开了围歼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战场。那些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曾经公开跳出来进行反攻倒算、阴谋复辟的地、富、反、坏分子，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批判、斗争。友谊大队的贫下中农狠狠批斗了妄图翻案的地主分子，宝北大队揭发批判了一个造谣“仙人出世”幻想变天的富农分子。与此同时，新龙大队的贫下中农，经过深入调查，挖出了原“忠义救国军”一个副大队长埋藏多年的两箱军火。其他大队也分别清查出身阶级敌人窝藏的步枪、子弹、军刀等各种反革命罪证。在对敌斗争中，还查出了一些漏网、漏划、漏管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分别作了处理。另

外还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评审，建立和健全了各级群众监督改造阶级敌人的组织。

对敌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大长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革命志气。他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警惕地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七宝大队老贫农严广文，五十多岁了，还积极报名参加民兵，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尽一份力。红明大队的贫农顾妈妈，原来认为“多管闲事得罪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使她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和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

加强组织建设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七一公社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了。

“七一”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说明，什么时候牢牢掌握住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会受到挫折。前几年，有些干部对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有的阶级敌人一度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个别基层单位甚至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这是严重的教训。根据《十条》和《二十三条》的要求，在四清运动中逐步建立了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贫农、下中农协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都参加进来。贫农、下中农协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在四清运动以及在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监督和协助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开展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贫下中农豪迈地说：“组织起来力量更大了，哪个牛鬼蛇神敢翘尾巴，我们就收拾他。谁要搞资本主义，就坚决与他斗争。”中华大队贫下中农社员李雨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她参加贫协后干劲更大，病也不顾，成了四清运动的骨干。沪星大队一个下中农，过去开会坐在旁边，参加群众运动跟在后边；入贫协以后，他对敌斗争冲在前面，批判会带头发言，成了运动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富裕中农和其他愿意上进的人也都靠拢来。他们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贫下中农带头，我们不能落后。一些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看清了方向，受到了教育，也表示要从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限，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贫下中农协会大大提高了贫下中农的威信和革命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七一公社的各级党组织，在四清运动中经过锻炼和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七一公社的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一九六二年严重的阶级斗争也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一些领导成员和少数党员，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些党组织存在着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依靠贫下中农的旗帜不鲜明等问题。根据《二十三条》的要求，结合斗争进行了整党。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各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发挥，例如友谊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及时刹住了歪风邪气，革命和生产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组织整顿，全公社十二个基层支部共吸收了一百五十四人入党。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管理委员会进行了整顿。全公社还吸收了三百七十七名青年入团。民兵组织也进一步健全。

公社各级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认识到：“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



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共同商量。

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不少干部总结了犯错误的教训，坚持参加劳动，转变了作风，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沪星大队有个生产队长改正了错误以后，起早摸黑，望田头，查地块，带头劳动，前后判若两人。更多的干部，增强了劳动观念，积极参加劳动。红明大队的刘根桃，四清以后当上了副大队长，保持每年一百九十多天的劳动时间。他工作忙，就挤时间劳动，有时到公社、县里开会回来，哪怕还有一小时、半小时也要下田与社员一起劳动。一九六六年“三抢”季节，遇到大队要研究工作，老刘就多参加早工、夜工来补偿开会占去的时间。在老刘的带动下，大队的其他干部也积极参加劳动。社员们赞扬说：“贫下中农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泥。”中华大队一个大队干部，亲自到三队蹲点，在劳动中及时发现了七亩麦子不发芽的情况，经与群众一起分析，找出了麦种不发芽的原因是浸种有问题，使麦种发生霉烂。于是，他进一步发动群众改进浸种方法，组织社员突击补种，并提醒其他生产队吸取三队的教训，避免了损失。社员群众热情赞扬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去干部不常下田劳动，大拇指翘在上面，现在是铁镢锄头不离手，大拇指握在下面，群众有话愿意向干部讲，生产劲头更粗了。”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四清运动期间，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七一公社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一九六五年冬天，公社党委发动群众制定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规划，召开了生产经验交流会，开办了生产技术训练

班，落实了增产措施。广大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誓夺一九六六年农业大丰收。

在公社召开的一次学大寨、找差距、鼓干劲的大会上，大家回顾了从一九六四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学大寨以来的情况，对照大寨的先进经验，找出了许多差距：背先进包袱，盲目自满；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不认真，有些措施不落实；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浪费现象不少；有的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缺乏踏实的作风；特别是缺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存在着依赖国家和“大少爷”种田的作风。通过学先进，找差距，查原因，订措施，很快掀起了农业生产新高潮。

各大队、生产队普遍发动群众平整土地，改造农田。联明大队二队制订了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出动了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连续开了四十五个早、夜工，平整高低田一百零四亩，拆掉旧坟山一百二十四个，扩大了耕地面积。六十多岁的贫农社员王翠媛老妈妈，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出工。她坚定地说：“学大寨不论年纪，我挑不动可以帮大家装土，也能为集体出一份力。”这个队由于学大寨成绩显著，被评为上海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九星七队的贫下中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把一条一百多公尺长、九十公尺宽、两人多深的老河浜填平了。他们说，大寨人能移山，我们要填浜开地，多打粮食，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天，棉田发生虫害，棉苗大量死亡，各大队、生产队积极防治，突击补苗。有的生产队一补再补，棉苗全用光了，社员就主动把自留田里的棉苗移到大田里。夏天连续几天下暴雨，男女老少自动出工，冒雨开沟，很快排除了大田里的积水。广大社员艰苦奋斗，战胜了虫、涝灾害，从而保证了农作物的茁壮生长。

喜看稻菽千重浪。经过四清运动的战斗洗礼，一九六六年全公社又获得了农业丰收。粮食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六十六斤，比四清前的一九六三年亩产七百八十四斤，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棉花平均亩产九十一斤，比一九六三年亩产八十三斤增加百分之十。

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成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在运动过程中，尽管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曹之流，一再干扰破坏，妄图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并没有给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相反，却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加速了他们自己的灭亡。

一场更伟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到来了！

第七章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胜利前进

第一节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建立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夏天，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七一公社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在经历了四清运动的激烈斗争后，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英明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七一公社的情况来看，四清运动虽然给了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加强了“七一”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但是由于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干扰和破坏，《二十三条》所规定的四清运动的任务并没有完全解决。在七一公社，无论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里，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的部门，甚至仍然存在着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公社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例如，当一九六六年春耕生产高潮来到时，有的领导人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以高工分“刺激”群众生产“积极性”，制订了繁琐的工分定额。有的领导人还在自己蹲点的地方，用“大少爷种田”的思想影响群众。这些“点”得天独

厚，“宝宝开口，应有尽有”，这样就冲击了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尤其严重的是，当陈、曹之流散布“大寨只有八百斤，上海一千斤，难道去学大寨八百斤？”的谬论，刮起反对学大寨黑风时，七一公社有的领导人也跟着压制群众学大寨的热情，以致七一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刚刚起来，又被泼了冷水。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燎原烈火，遍及全国城乡。七一公社的革命群众运动也蓬勃兴起。八月下旬，七宝镇上两所中学和农业中学的红卫兵以及各生产队青年民兵，手擎红旗，高呼“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走上社会，狠狠冲击封、资、修的文化 and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挖出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复辟的种种罪证，如国民党的破旗，被我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的血衣，反攻倒算的变天账和地契，等等。“破四旧”的锋芒有力地刺向了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进一步暴露了阶级敌人的总代表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面目。

群众运动一兴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慌了手脚。刘少奇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处于全市革命群众包围中的旧市委内的走资派陈丕显、曹获秋，看到农民也起来造他们的反，慌忙发出了“稳住农村”的黑指示。上海县委内的走资派也跟着散布“农民造反就应该造土地的反”的论调，妄想用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七一公社党委有些领导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他们“怕”字当头，怕乱，怕群众，执行了刘少奇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革命，保护修正主义。他们根据陈、曹的黑指示，转移斗争目标，布置基层把一些有缺点错误的社员拉出来批判。但是，革命群众很快识破了他们的这一套手法，认清了斗争的大方向，开始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社办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这时，公社党委某些领导人又采取不批准、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工人们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当然不会支持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人家不承认，我们照样干革命。”群众运动的来势更加汹涌了。公社党委的某些人又根据县委内的走资派的授意，在群众中采取两面手法，一边签署承认某一个群众组织，一边又怂恿另一批群众起来反对，企图分裂革命队伍，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怒潮，广大群众要造反、要革命的坚强意志是压不垮的。贫下中农、社办工厂的工人、机关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纷纷“杀”出来了。年底，七一公社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群众组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了。旧市委内陈、曹等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扑灭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无耻地使用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手法，刮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七一公社党委的领导人按照陈、曹关于“经济上放宽一点，政治上就可以主动一点”的黑指示，滥许愿，滥签字，滥发各种补助金和福利费。在短短两、三天中，先后签发各种名目工资福利费的支票达十六万四千多元。

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社员群众奋起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信用社革命职工对公社党委某些人任意挥霍贫下中农劳动果实、腐蚀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做法十分气愤，对乱签滥发的支票拒绝付现。一个混在一些受蒙蔽的职工中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坏人跳出来叫嚷：“公社干部签了字，你们为什么不付钱？”

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领导？”信用社职工看到这个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坏家伙居然把“领导”抬了出来，这就使他们更看清了公社某些领导人的做法，适应的是哪个阶级的需要。革命职工坚持正确立场，坚决顶住这股妖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消息很快传开了。虽然已是深夜，广大贫下中农带着维护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焦急心情，从四面八方奔向公社信用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骑着自行车赶来了，红卫兵小将跑着步赶来了，白发苍苍的老贫农也气呼呼地跑来了。在汹涌的贫下中农人群的包围中，那几个闹经济主义的人，显得多么孤立！

辩论在通宵达旦地进行着。黎明，传来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八个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它是工人阶级为首的全市革命人民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动员令，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正在同经济主义妖风战斗的七一公社广大社员。他们立即在信用社的钱柜上贴了封条，严正宣布：不经过全公社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讨论通过，任何人无权签发各种工资福利费。接着，他们又在七宝镇中心的塘桥上，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揭露陈、曹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恶阴谋，指出公社某些领导人搞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是在错误的路线上越滑越远了。公社有关负责人当众承认了自己的严重错误。事后，他身背布袋，把自己签发的支票和已支付的钱一笔一笔地收了回来，并向群众作了检讨。

公社的年终分配工作开始了。陈、曹之流又提出“实行大民主分配”等蛊惑人心的口号，实际上是妄图搞“分光吃光”，破坏集体经济。号上、七宝、沪星、红明等大队，少数坏人乘机跳了出来，胡说“提留公共积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张把全年劳动果实统统分光。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反对，严正指出：“分光吃光，是妄想拆伙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坚决不答应！”公社、大队、

生产队的广大革命财经会计人员在贫下中农支持下，根据《紧急通告》中所提出的广大人民群众“要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精神，宣布：全公社各生产队的年终分配工作，必须由贫下中农和革命财经会计人员讨论决定，在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坚决反对分光吃光。于是，陈、曹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又破产了。

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对革命群众进行压制、欺骗和腐蚀，都没有能阻挡得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相反，却从反面教育了群众，激起他们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强烈愤怒。七一公社越来越多的社员投入了斗争。他们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武器，揭露走资派的阴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阶级敌人。整个七一公社，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巨澜。铺天盖地的革命大字报，村村队队的批判会，把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贫下中农对公社党委某些领导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压制群众革命，保护资产阶级的错误立场，进行了严肃批判。同时，进一步揭露了公社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当人民公社刚一诞生，公社有的领导人在刘少奇一伙刮起的“共产风”中跟着跑，损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又程度不同地推行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黑货，使七一公社内资本主义势力大肆泛滥，个别生产队的领导权也不在贫下中农手里。只是由于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英勇斗争，才使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七一公社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破产。七一公社的历史表明，公社党委某些领导人，在两个

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关键时刻，曾经离开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通过革命大批判，大大提高了七一公社广大革命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决心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政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中。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向全国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毛主席的指示，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七一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的带动下，积极投入了伟大的“一月革命”，开展了七一公社的夺权斗争。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七一公社的社员群众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春耕大忙季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指示信。接着，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七一公社“支左”。党中央的信件说，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希望他们立即把春耕工作抓起来。信件还指出：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在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七一公社召开了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总结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深刻教育，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鼓足干劲抓好春耕生产。党中央的指示犹如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心田。公社一个领导干



公社革命委员会在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胜利诞生了!

部激动地说：“在批判我错误的群众大会上，我看到有那么多社员来参加会议，有我认识的，更有许多是我不认识的，都跑来教育我，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过去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脱离了群众，两头脱了空，走到修正主义邪路上去，这个教训一定要永远记取。”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贫下中农代表，看到干部的转变，都很高兴，热情地说：“改了就好，今后可要把毛主席的教导刻在心里，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牢牢抓紧啊！”会后，广大革命干部立即带着毛主席著作，扛着农具，到生产队去与贫下中农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大闹春耕。

通过学习和贯彻党中央信件，七一公社成立了由群众组织、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为建立七一公社革命委员会打好了基础。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它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充分酝酿，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七一公社革命委员会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胜利诞生了！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广大社员群众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的斗争开始了。

第二节 落实斗批改各项任务

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

公社革命委员会建立后，摆在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面前的最重要课题，是怎样推动七一公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毛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指明了七一公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方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认真搞好斗、批、改，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公社革命委员会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分析了公社的情况。认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公社革委会立即广泛发动群众，口诛笔伐，向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开炮。新龙二队社员在大批判中联系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现过的放弃集体生产，跑自由市场的逆流，揭发一个富农分子当时暗中引诱青年人搞资本主义活动的罪行。这个富农分子曾说：“捞一夜鱼，好卖十几元。吃粮靠集体，现钞靠自己嘛！”他宣扬的那一套，同刘少奇鼓吹的“三自一包”完全是一路货。刘少奇同阶级敌人上下呼应的罪恶行径，激起了群众无比愤慨，他们对准“活靶子”，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黑货。革命大批判提高了广大社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号上三队一个女社员，一天清早拿着自留竹园里生产的十四斤竹笋到国家收购站去出售，有人在半路上拦住她要用高价买去，她坚决不肯。当收购站的营业员表扬她时，她说：“我是人民公社社员，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利益要靠

大家来维护，资本主义也要靠大家来抵制。”友谊大队一个生产队的西瓜收获了，坏人煽动一些人提出要从准备交交给国家的西瓜中拿出一千多斤私分给社员去卖高价。广大社员坚决不同意，他们说：“破坏国家计划是拆社会主义墙脚，搞私分是刘少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修正主义黑货，我们不能干！”敌人的阴谋被群众粉碎了，社员们更加自觉地执行国家分配的交售任务，凡是列入计划的，他们一斤一两也不少，而且总是超额完成。

革命大批判使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看清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正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为了铲除这个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决心把一小撮暗藏的阶级敌人清查出来。在公社革委会的带领下，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投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

七一公社地区，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了历次政治运动，反革命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某些单位阶级阵线不清，暗藏的敌人仍有破坏活动。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和平麻痹思想相当严重，认为：“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大权到手，该抓两千斤（即粮食亩产指标）了。”为了扫除思想障碍，公社革委会引导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指示，联系七一公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际，狠批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号上大队的社员写了《两条道路斗争和两千斤》等二百多篇小评论，深刻批判了影响对敌斗争开展的各种错误观点，增强了大家的敌情观念。广大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很快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沪星等大队和社办企事业里，群众挖出了一些漏划、漏管的地主、富农和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在七宝和红明大队，破获了现行的反革命集团。阶级敌人在哪里捣乱，就在哪里把他

们镇压下去。

一九七〇年，根据党中央指示，七一公社在清队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开展了“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在七宝大队的队办企业里有一个十分狡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伙同公社农机厂的一个家伙，攻击社会主义，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教唆一些青少年进行犯罪活动，甚至妄想夺取企业的领导权。七宝大队和农机厂的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揪出了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打三反”运动在公社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企事业单位也取得了很大胜利。

对于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坏人，公社党委按照党的政策，分别对待，除个别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送专政机关外，其余交由群众管制、监督，就地改造。一些坦白认罪态度较好的，给予宽大处理。为了更好地监督改造阶级敌人，各单位健全了监督小组，加强了对阶级敌人的群众评审制度。同时，积极作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并动员他们促使自己的父母转化。

群众专政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的锻炼，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了。号上大队几个贫农老妈妈，一天在劳动时，听到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指桑骂槐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她们立即以田头为战场，狠批了这个富农分子的反动言论。九星大队一个坏分子在田里向红小兵散布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红小兵们很快向大队党支部反映。在党支部支持下，由红小兵主持召开批判会，狠狠批斗了这个坏分子。被誉为“群众专政的铁拳头”、“不穿军装的子弟兵”的民兵战士，维护社会治安，防止敌人破坏，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一天，宝北大队民兵正在平整一座土窑，突然发现工地上有一个蓬首

垢面的陌生人，行动鬼祟，他们当即上前盘问，那个家伙竟跳进河浜，妄图溜走。民兵们相继跃入河中，一把拎起这只“落水狗”，原来是一个潜逃的罪犯。号上、红明、七宝等大队的民兵还捕获过盗窃诈骗犯，追截外来进行投机倒把的船只，狠狠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犯罪活动。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面前，任何狡猾的敌人也逃不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

开 门 整 党

对敌斗争的胜利发展，为开展整党工作打好了基础。复杂的阶级斗争使七一公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把党的基层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在人民公社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一九六八年秋天，在公社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开展了整党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好的整党运动。许多党员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和群众共同战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同时，在运动中也暴露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有一部分党员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缺乏继续革命的自觉要求，有的党员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有的划不清敌我界线，严重的甚至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成为地主、富农的代言人，还有个别的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因此，遵照毛主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把七一公社的党组织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强战斗堡垒，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整党，首先是从思想上整党。号上大队的党员和社员群众根据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纲领，批判了刘少奇的“党内和平论”，对少数党员认为“现在地、富、反、坏老实得象‘绵羊’”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教育帮助。一位老贫农说得好：“阶级敌人不是老实得象绵羊，而是狡猾得象狐狸。不要看有些阶级敌人似乎不声不响，不叫的狗最会咬人。”有个党员结婚时曾借富农分子的衣服和家具，摆排场，经过群众的批评教育，他认识到，这是头脑里缺乏敌情观念，眼里看不见阶级斗争。从这以后，他便积极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有一次，一个反革命分子提着一壶酒上他家，想拉拢他，他当即把酒壶甩了出去，并在群众中对那个家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还有个女党员，过去对她的富农分子叔父的翻案活动不敢斗争。整党中她提高了觉悟，在斗争会上面对面地揭发批判了这个富农分子解放前的剥削罪行和解放后的破坏活动。群众赞扬她：“五十个大字记得清，对敌斗争打头阵，觉悟提高方向明，前后好比两个人。”七一公社的广大党员在整党过程中经过思想上的“吐故纳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号上三队有个刑满释放分子，煽动一些人要分队里的储备粮，这个队的党员立即带领群众，对这个家伙狠狠进行批斗，揭穿了他的阴谋，也增强了群众的战备观念。九星大队一个党员，歪风邪气敢顶，坏人坏事敢斗，阶级敌人威胁要暗算他的孩子，他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员是铁打的骨头，什么也吓不倒！只要阶级敌人胆敢破坏，我就要同他们拚！”

整党，大大增强了七一公社各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沪星大队党支部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支部过去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影响，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支部核心成员之间又不团结。因此，这个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阶级敌人也很嚣张，全大队革命和生产长期处于

落后状态。大队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遵照毛主席关于“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的教导，实行开门整党，发动党内的群众查路线，揭矛盾。贫下中农尖锐地指出：“支部领导不带领群众与阶级敌人斗，歪风邪气就抬头；支部委员不团结，革命生产哪能搞得更好？”群众的批评一针见血，对支部震动很大。有个支委，阶级斗争观念淡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斗争不力。在群众的批评帮助下，他深有感触地说：“党支部的头等大事就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认真抓阶级斗争就是最大的失职。这个错误一定要改正。”另一个支委，热衷于搞“小私有”，影响了一些社员。经过群众帮助和斗私批修，他表示：“今后要听毛主席的话，带领社员牢牢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整党还解决了支部内两个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有个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受到过革命群众和一个新干部的批评，思想上一直有疙瘩。这次她亮了思想，并认识到那个新干部对她的批评，是帮助她摆脱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待新干部的态度问题，实质上是对待文化大革命，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于是她主动去找那位新干部作检查，两人多次谈心，互相帮助，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搞好了团结。“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党支部以团结战斗的新姿态，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有力的进攻，刹住了各种歪风，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革命、生产双跃进。全大队的全年粮食总产比整党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左右，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七一公社的整党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各大队、企事业各单位相继改选了党支部。经过组织上的“吐故纳新”，清除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

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一大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使党组织更加朝气蓬勃。

在整党的基础上，一九七〇年一月，公社召开了党员大会，选出了新党委，加强了党对人民公社的一元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就在斗、批、改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七一公社文教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伟大指示，广大贫下中农心情无比激动，许多人含着兴奋的泪花奔走相告：“毛主席叫侬管学校了！”很快地，由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全公社的中、小学，占领了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的教育阵地，展开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

为了深入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贫宣队”组织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大量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及其在教育战线上的代理人用“年龄关”、“分数关”、“经济关”排斥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战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沪星大队有二百二十户贫下中农，但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毕业生只有十二人，而一个生产队的十户地主、富农家里，就有十七个初中、高中和大学生。在九星大队南阮生产队，一户地主就有三个中学生，而贫下中农平均三户半才有一个中学生。社会调查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他

们极为愤慨地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学校管不好，政权保不牢！”贫宣队员们坚定地表示：“文化低，难不倒；生产忙，安排好；没经验，能创造。一定要把教育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改革旧教育制度，这是从孔老二以来几千年没有过的大事，自然会遭到资产阶级和一切保守势力的顽抗。当批判了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的谬论后，有人又吹起了“读书无用”等一股股冷风，妄图永远把贫下中农和劳动人民关在学校大门之外。贫宣队发动师生和学生家长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贫下中农子女在批判中激动地说：“我们的父母象我们这样年纪时，还在给地主做牛做马，现在我们能上学读书，这是毛主席给的权力，这个权力，谁也不能剥夺！我们一定要为贫下中农争气，为革命刻苦学习文化。”有个生产队长，原要女儿在家搞编结，不去学校读书。现在坚决送女儿入学。他说：“种田勿着荒一熟；不掌握文化，就不能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不能做好无产阶级接班人。这可是大事啊！”

在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管理了学校之后，使教育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遵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指示，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总结了贫宣队进驻学校的经验，建立了由贫下中农、干部、教师三结合组成的公社和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着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为了满足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要求，在九星、友谊等小学附设初中班，并根据农村的特点，平时全天学习，“三夏”和“三秋”放两次农忙假，让学生回队劳动，合理调整和安排教学计划。这种适合农村特点的新学校，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他们说：“中学搬到大队办，既读书，又劳动，才能培养我们贫下中农的好后

代。”

过去脱离三大革命、脱离农村实际的教学内容开始改变。各学校联系农村三大革命实际，组织革命师生走出校门，以社会为课堂，实行开门办学。有的学校还聘请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政治课，老贫农上阶级教育课，大队会计上珠算课，民兵连长上军事课，赤脚医生上卫生课，请生产队老农、拖拉机手、农村电工木工，给学生传授农、工业知识。在市、县有关单位的领导下，结合本地情况编写了一些“乡土教材”，如七莘路小学的师生编写出《农村常用语》，有的小学与公社农科所配合编写了水稻、棉花等作物的栽培和植物保护的教材。

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指引下，学生在坚持以学为主的同时，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开展了学工、学农活动。七宝中学创办了电动马达修理工场、木工场和电工组，并组织学生试制农药。不少小学也办起了饲养场、小木工组。各校还组织师生定期到生产队、社办工厂去劳动。这种联系农村三大革命实践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学得活，用得上，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迅速成长。

医疗卫生的革命

在教育革命胜利发展的同时，医疗卫生战线的革命也蓬勃兴起。七一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决不会忘记刘少奇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给农村带来的严重恶果。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下，医疗卫生部门只为城市少数人服务，使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严重缺医少药。一九六二年号上大队有一位贫农老妈妈得了急病，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位医生。这位

医生带着大口罩，离得远远的，只看了几眼，就对病人家属说：“她得的是传染病，要传染的。”说完话，没给一粒药就走了。还有一个小孩得了流行性脑膜炎，因附近找不到医生，没有及时医治，不幸死去。象这样因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不幸死亡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贫下中农好不容易把病人送进了城市大医院，但在那里的遭遇又是怎样呢？有一次，宝北大队青年王建华送一位贫农女社员到一个大医院去看哮喘病。那知医院对这种常见病、多发病根本不感兴趣。这位女社员在医院里住了十六天，花去了几十元钱，最后医生对她说：“你生的是老毛病，看不好了，有钱买些东西吃吃算了。”就这样被推出了医院大门。小王陪这位女社员走出医院大门，心里很气愤，暗自下了决心：“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有自己的医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开展了医疗卫生革命。贫下中农的儿子王建华经过培训，也背起药箱，成了“赤脚医生”。他心里止不住地翻腾着：“我是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好好为他们服务。”平时他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努力钻研业务。一九六八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六队一个贫农的小孩得了急病，小王立即赶去，诊断出是乙型脑炎，赶紧采取了紧急措施，帮着把病孩送到公社卫生院，经抢救脱险。医生说：“再晚几小时，生命就危险了！”家长十分感激小王的正确诊断，更感激毛主席革命路线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一九六九年寒冬，三队七十多岁的贫农老王疝气病发作了，外面飘着雪花，小王与病人家属一起把老王送到医院开刀。病人出院后，小王又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坚持天天去护理，直到病愈为止。对那位曾被大医院推出门的患哮喘病的贫农女社员，小王一直惦记在心里，后来在市巡回

医疗队的协助下，经他耐心治疗，她的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一支扎根于贫下中农之中、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赤脚医生”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几年来，七一公社已培养了六十四名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近二百名生产队不脱产的卫生员，整个公社形成了一个医疗卫生网。社员群众称赞“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劳动到田间，看病到床边，工作到佃屋里，宣传到佃心里。”公社党委采取分期分批让“赤脚医生”到公社卫生院和市、县医院培训，以及实行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定期轮换等办法，从政治上、业务上关心“赤脚医生”的成长。现在大多数“赤脚医生”能够掌握农村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识，并能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不少人掌握了新针疗法，治疗关节炎、腰背痛、神经衰弱等疾病。有的还开始学习简易外科手术，医疗技术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在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一九七〇年开始实行了“合作医疗”。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每年交纳少量的现金（另外由生产队、大队抽取一部分公益金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后，就可以免费到合作医疗站看病。对转送到公社以上医疗机构治疗的病人，根据他的经济情况减、免他们的医药费用。各大队保健站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发动群众种植和采集中草药，并总结和推广了“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四自”（自采、自种、自养、自制）的经验。如新龙大队的“赤脚医生”利用零星土地和十边地种植中草药，并和生产队卫生员一起外出采集中草药二百多种，基本上满足了本大队对中草药的需要。他们坚持推广草医草药和新针疗法，取得了良好效果。第一生产队一女社员患坐骨神经痛，到大医院看过，一时不见效，回到生产大队由“赤脚医生”用中草药治疗，一个月后恢复了健康。一个知

识青年患风湿性关节炎，“赤脚医生”用新针疗法针刺两个疗程，很快控制了病情。各大队的“赤脚医生”还经常向广大社员群众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好处，破除旧风俗、旧习惯。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出生率不到千分之十二，号上、友谊、中华、九星等大队出生率都在千分之十以下。由于“合作医疗”的不断发展，加速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基本做到一般疾病治疗不出大队，常见重病不出公社，对保护社员健康，提高劳动出勤率，推动革命和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七一公社基本上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送走了“瘟神”。

在黑暗的旧社会，“七一”地区有钉螺的河沟有一千多条，共计三十三万三千六百多平方米，每平方米就有七、八十只钉螺，真是用手捧也捧得起啊！由于小虫猖獗，“瘟神”横行，有一半以上贫下中农得了血吸虫病，不知有多少穷苦农民被这种可恶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号上大队贫农老妈妈沈三宝生了七个子女，相继得血吸虫病死去，后来她又领养了一个小囡，也没能逃脱“瘟神”的魔爪。沈三宝老妈妈“七子八棺材”的悲惨家史，是对万恶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当时，贫下中农贫病交困，生命不如其一根草。不少村庄是“只见棺材出，不见轿子进”，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打响了灭钉螺、送“瘟神”的人民战争，使钉螺大为减少，血吸虫病感染率明显下降。但是，由于叛徒、走资派魏文伯卖力地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散布“钉螺灭不光”等悲观论调，使群众性的血防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九六二年前后，这里的血吸虫病感染率又有了回升。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进行了医疗卫生革命，血吸

虫病防治工作又顺利开展。一九六九年，在全国“血防工作会议”精神鼓舞下，七一公社血防战线热火朝天，村村队队灭钉螺。公社还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血防专业队伍，长年坚持在浜头、沟旁、河边查螺灭螺。给五岁以上的一万四千多人进行了多次普查。对血吸虫病患者，国家给予免费治疗，在治疗期间，公社还给这些社员补贴全部工分。西姚家滩村(属友谊大队第六生产队)的贫农马小毛，解放前有八个亲人死于血吸虫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血吸虫病复发，大量吐血。大队把他送到了市区医院，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解放初，这个村从旧社会幸存下来的五十八人，人人都有血吸虫病，如今全生产队一百九十人中，没有一个是血吸虫病患者。

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兴修水利，改造河道，全公社修筑了七万零三百多公尺的灭螺带，建造了一百三十一只无害化粪池，打了五百四十眼井，社员养成吃用井水的习惯，从多方面控制血吸虫病的感染。一九七〇年经各县血防人员联合检查，七一公社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

春风杨柳万千条。在今日七一公社的土地上，广大社员群众挥铁臂，舞银锄，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节 积极投入批林整风运动

正当全国人民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时候，林彪、陈伯达一伙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九大”路线。一九七〇年八月，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毛主席发出了“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

育”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修整风运动。七一公社党委按照毛主席教导，首先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看书学习。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革命干部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修正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适应这个形势，许多大队办起了政治夜校。

全国人民批修整风运动在深入发展。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狗急跳墙，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消息传到“七一”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个大坏蛋的自我爆炸，无不人心大快；对林贼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感到极大愤慨。他们口诛笔伐，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掀起了批林整风的高潮。从公社到生产队，从社员家庭到广阔田野，批判会一个接着一个，到处都是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人人都是公审林彪反党集团的审判员。公社广播站不断地播送着贫下中农对林贼一伙的愤怒声讨。各生产队出了一期期的批林黑板报和大批判专栏。

仇恨的烈火，燃烧在每一个社员的胸膛。友谊大队在旧社会受尽压榨的贫农老妈妈潘水英，听说林彪妄图谋害毛主席，气得几夜睡不好觉。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刚刚结束了批判会的九星一队青年们，走在回家的路上，仍继续着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声讨。在七宝大队的批判会上，党支部副书记、解放前从小卖给地主当丫头的朱为民，怀着满腔怒火说：“一听到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旧社会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人间地狱，林贼要把我们往这个火坑里推，我们一万个不答应！”朱为民表达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愤慨，会场里立即

响起了一片“打倒林彪”的怒吼声。许多从来不大开口的社员也争着发言，怒斥林彪一伙的滔天罪行。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诉不尽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深仇大恨。大家愤怒指出：“旧社会，我们穷人是黄连汤淘饭兜底苦；新社会，我们是蜜糖水淘饭甜到心。林彪要复辟，这是白日做梦！”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公社党委引导干部和社员群众紧紧抓住林彪反党集团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要害，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复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广大贫下中农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首先狠狠驳斥了林彪反党集团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诽谤和攻击。林彪一伙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号上大队贫下中农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批驳了这些反动谬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激发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号上大队的生产飞跃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这个大队还没有自己的拖拉机，到一九七一年，全大队四个生产队已有了三辆手扶拖拉机；在这期间，各种农业机械由三种猛增到四十三种，其中光是电动机就由十六台增加到七十三台，这表明大量农活已由机械代替了手工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社员们不怕困难，自己动手，变明渠为暗渠，胜利实现了地下排灌，用水管理比过去更科学了，并且扩大了耕地的利用面积。大队还兴建了三座拖拉机桥、七座人行桥和一百多间仓库、厂房，办起了一些过去没有的队办工厂企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这个大队一九七一年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两千斤，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千零八十一斤增加将近一倍；生猪饲养量由平均每户一点三头增至八头；一九七一年全大队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四十一万元，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的生活水平也大大

提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大队四分之一的社员搬进了新建的两层楼房的农民新村；社员家里的余粮越来越多，有的贫农社员余粮足够吃八个月；社员衣着不仅齐备，而且不少是毛线、呢绒、“的确凉”等制品；社员在信用社的存款有较大的增长，多的达三千余元。一九七一年作过一个统计，这个只有一百六十八户的生产大队，社员共有自行车一百九十七辆、缝纫机四十三台、手表三百二十七只、台钟八十多座、收音机三十架。在旧社会，这些东西中有哪一件贫下中农能沾得上边？他们激动地说：“看看现在，集体经济欣欣向荣，社员生活节节上升；比比解放前，‘穷人一年做到头，落得两个空拳头，身上穿的是破布头，吃的是红花草和马兰头’，真是一个天，一个地，这难道叫‘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这难道是‘缺吃少穿’？！”号上大队是七一公社的缩影。七一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制订的我党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无比正确。林彪一伙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只能表明他们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表，帝、修、反的走狗，一小撮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派。

广大贫下中农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还紧密联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农村适应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需要，不断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抛出“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黑货时，林彪也积极鼓吹“包产到户”，主张恢复单干。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批判“三自一包”，林彪、陈伯达一伙又刮起一股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歪风，妄图取消正当的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破坏工农联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七一公社的贫下中农根据市委指示，按照《六十条》的规定，进行了抵制。这股歪风刹住后，林彪一伙反对政治

挂帅，宣扬共产主义就是“发财”的谬论，还有市场，使有的生产队“重副轻农”的错误倾向有所抬头。广大贫下中农越批判，对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看得越清楚，对毛主席制订的党的基本路线认识也越深刻。他们痛斥了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指出：“林彪象耍魔术一样，一会儿变过来，一会儿变过去，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搞垮人民公社，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他和刘少奇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决不上他的当！”

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开展，某些生产队存在的“重副轻农”的错误倾向，及时得到了纠正。新龙三队，在一九七二年“三夏”农忙时，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没有肃清，队长亲自带领一些社员开了仅有的一部拖拉机去跑运输，“赚大钱”，有的社员也跟着把主要精力花在搞家庭副业上，结果，严重影响了集体农业生产，“三夏”任务脱了季节，产量也下降了。大队党支部在三队举办学习班，引导干部和社员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所鼓吹的资本主义黑货。贫下中农说：“中了刘少奇、林彪的毒，就会财迷心窍，走上资本主义邪路。我们贫下中农决不允许走这条路！”那个队长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也表示要与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走社会主义道路。三队的方向扭过来了。队长搞好集体生产的劲头大增，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更高，全队生产搞得热气腾腾。一九七三年春，队里掀起了积肥高潮，队长带领社员，摇船到通潮港去鬻泥，克服许多困难，很快积起了四千多担河泥，还到市区运回了大量垃圾。社员们高兴地说：“去年队长把拖拉机开错了路，现在带着我们把船开在社会主义航道上。”一九七二年“三抢”大忙，尽管有公社企事业单位人员的支援，三队还是落在后面。一九七三年“三抢”任务，

公社要求在八月十五日结束，三队在十一日就提前完成了，还抽出四十个劳动力支援了兄弟队。这一年，三队的棉花平均亩产由上年的**一百零九斤**一跃达到**一百五十三斤**，增产四成；粮食亩产**一千七百四十二斤**，也跨入了全大队的先进行列。

为了深刻揭露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公社党委在批林整风的过程中，还组织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反党的理论纲领——反动的“天才论”。通过批判，大家看清了林彪鼓吹“天才论”的罪恶目的，就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理论根据，阴谋篡党夺权，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实行独裁统治。有一位贫农社员说得好：“林贼把自己打扮成‘天才’，拆穿了，就是要别人迷信他，听任他‘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让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叫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用心真是毒透毒透！”通过对唯心论先验论的反复批判，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进一步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也为更好地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七宝九队通过对“天才论”的批判，促进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大发展。这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社员原是集镇居民，种田的经验不足，生产一直落后。有人就说：“九队社员种田是外行，高产无希望。”一些社员也有“无能为力”的消极思想。在批林整风中，九队干部和社员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著作，以及毛主席关于批判“天才论”的有关教导，狠批了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天生’的‘天才’是没有的，真知来自实践。”大家说：“先进不是天生的，后进也不是生根的。我们决不上林贼的当，决不能让他鼓吹的‘天才论’束缚自己的手脚！”一个干部也说：“《国际歌》告诉我们，‘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为什么我们不能夺高产？”认识提高后，他们认真总结了过去产量不高的原因，虚心向先进的兄弟队请教，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掌握了作物生长的规律，终于夺取了一九七一年的大丰收。这一年，全队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八百四十六斤，比批林整风前的一九六九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一下子跃入了全公社粮食高产队的行列。九队干部和社员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们继续狠抓批林整风，不断肃清“天才论”的余毒，又夺取了连续两年的更大丰收。一九七二年，粮食亩产二千一百五十八斤，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七，棉花亩产比上年翻了一番；一九七三年，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仍把粮棉产量双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粮食亩产二千四百六十二斤，棉花亩产一百七十斤。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带来的新胜利！”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批判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后进能变先进；相反，如果不抓党的基本路线，不抓批林整风，先进也会变后进。从九星大队第二、第六两个生产队的不同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二队是全公社甚至全县有“名”的后进队。批林整风运动开展后，一九七二年，在公社蹲点同志和大队的帮助下，二队大抓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挖出了兴风作浪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高涨。一九七三年，棉花平均亩产成倍增长，达到一百四十一斤，改变了后进面貌。与此相反，对几年来生产一直搞得比较好的六队，大队有的干部认为它“产量稳”、“问题少”，放松了批林整风和基本路线教育，结果资本主义倾向抬头，一九七三年产量下降，粮食平均每亩减产四十斤，总产量减少了一千三百多斤。这一

“变”教育了干部和社员，使他们振作起来，大抓批林整风，学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生产队的面貌也随之迅速发生了变化。

从整个七一公社来看，正是由于抓了批林整风，党的基本路线得到了更好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二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一跃翻了《纲要》，达到一千六百零八斤，成为上海郊区粮食高产单位之一。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庆祝“十大”召开，学习“十大”精神的热潮中，七一公社的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十大”精神指引下，广大社员和干部进一步批判了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污蔑，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了大批新生事物。七一公社广大青年干部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到一九七三年底，十一个生产大队有七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新提拔的青年干部；八十八个生产队，队队都有年轻的队长或副队长，其中年龄还只二十几岁的就有二十六名。妇女干部也正在斗争中大量涌现出来，全公社一百二十五名党支部委员中，女委员占五分之一；三百名生产队正、副队长中，女队长占三分之一以上。在迅速成长着的青年干部中，有一些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进步很快，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有的党员还被选为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文教卫生革命的成果继续发展。到一九七三年底，全公社共有中小学十六所，其中完全中学一所，增设初中班的小学两所，在校中学生二千三百二十一名，小学生二千九百三十三名。小学和初中基本上得到了普及，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到一九七三年底，全公社共培养出“赤脚医生”六十四名，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五至六名。他们中有的已被选调到县、市医疗机构去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开放的朵朵新花，正在越来越

越放出夺目的光彩。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七一公社广大社员和干部积极投入战斗，决心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狠批林彪宣扬孔孟之道，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罪行，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反修防修，为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奋斗！

第四节 公社经济欣欣向荣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七一公社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促进了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九七三年底，公社一级总资产七百三十八万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二百二十一万元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大队一级资产共一百六十八万元，是一九六五年三十八万元的百分之四百四十二；生产队一级资产共五百五十万元，是一九六五年一百八十七万元的百分之二百九十四。全公社三级经济的资产总和达到一千四百五十六万元，是一九六五年四百四十六万元的百分之三百二十六。全公社农业、工业、副业等的生产总值为一千三百五十二万元，比一九六五年的七百四十五万元增长百分之八十一。随着生产的增长，社员收入也有相应提高，一九七三年按人口平均分配为二百十三元，比一九六五年的一

百五十七元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社员储蓄一百零六万元，比一九六五年的六十七万元增长百分之五十八。这一连串的数字如同一组动人的音符，奏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乐章，也是对林彪一伙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回击。

农业生产突飞猛进

一九七〇年秋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中，七一公社党委发动广大群众总结了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经验，对照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找出了差距，群众纷纷要求进一步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高产创造条件，于是掀起了七一公社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七一公社境内原有“高亢地”、低洼田数千亩。人民公社建立后以及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经过历年的平整，已有一千多亩得到了改造，但是大部份土地还没有治理。一九七〇年年底，七一公社干部和群众学大寨再掀高潮，首先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紧接着打响了“铲亢填洼”、重新安排河田的新战斗。在隆冬严寒中，蒲汇塘两岸战高亢的工地上一片热气腾腾。党员、干部积极带头，民兵战士冲锋在前，青年突击队员一马当先，妇女们也显示出“半边天”的威力。

在号上大队的工地上，展开了热烈的劳动竞赛。只见红旗迎风招展，“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的大字标语牌，一字形竖列在工地的路旁。广播声、号子声响成一片。各生产队的小伙子们更是豪情满怀，自动组织起战斗队。社员们提出了“奋战二十天，铲平百亩高亢地，提前十天完成任务”的战斗口号。第一生产队副队长、共产党员魏泉弟前几天因公摔伤了腰，刚刚出院，听说要战百亩高亢，就跑到大队指挥部请战，领导

要他休息几天再干，他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没等领导同意，他就拿了工具，带领群众一直战斗在战高亢的火线上。六十多岁的贫农徐永贞老妈妈，在家实在坐不住，对干部说：“我人老志不老，大寨的老年妇女，为打开虎头山，爬山搬石，我也要去战高亢，给子孙后代造福出把力！”说着就扛起工具参加了战斗的行列。就这样，号上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奋战二十天，胜利完成了任务。他们连战几个冬春，全大队改造高亢地、低洼田二百多亩，开了两条长达一千八百公尺的河道，拆平了几百个土墩，填了八条死浜，扩大耕地面积二十多亩，继一九七一年夺得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之后，一九七二年又创粮食平均亩产二千二百十五斤的高产纪录，名列全公社第一，在每人平均三分四厘粮田的基础上，实现了口粮、饲料粮、种子粮自给。

以战高亢为重点，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遍及整个公社。新龙大队党支部为了改善水利条件，决定疏通一条旧河道，一算要搞一万二千多个土方，平均每个劳动力要承担五十多个土方的任务，困难确实不小。党支部把困难摊给群众讨论，贫下中农说：“大寨贫下中农能劈山造田，把河水引上高山，我们每人五十个土方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组织了二百个劳力，连续战斗十五天，胜利完成了挖河任务。有了这条河的灌溉，东面几个生产队几百亩三麦、油菜，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宝北大队原来高亢地和需要平整的土地占了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这些土地很难种水稻，只能种豆类、棉花等耐旱作物，产量较低。一九七〇年以来，经过两年的治理平整，水稻面积增加了三百多亩。一九七二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

从一九七〇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全公社共平整土地近三千亩，填平断头河滨近百条，扩大耕地面积近二百亩。

在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七一公社党委制定了改明渠为暗渠，逐步实现地下渠道灌溉和“格子化”的建设方案，并决定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用社、队集体资金共同投资，发动各大队社员自己动手修建。

要在近两公尺深的地下铺设管道，困难确实不少。东风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响亮地提出：“困难再大，我们也不怕！”他们在公社修建队、农桥队的帮助下，边干边学，自己设计，自己测量，自己制作水泥瓦筒，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在地下铺设了五千九百九十五公尺的排灌渠道，胜利地实现了全大队的暗渠灌溉。与此同时，号上、宝北、新龙、七宝、友谊、九星等大队，也都自力更生，较快地完成了地下渠道的建设任务。到一九七三年底为止，全公社共铺设地下管道五十多公里。暗渠灌溉解决了过去明渠远近用水不统一、渠洞漏水浪费大的矛盾，大大节省了农业成本，同时扩大了耕地面积。有个社员做诗称赞道：

“七一”人民力量大，
擒来“龙王”埋地下。
拨开龙牙甘泉涌，
丰收喜讯传万家。

在逐步地实现暗渠灌溉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平整治理，全公社二万零二十七亩可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实现了格子化，并使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面积达到一万六千多亩。

公社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还发动群众深入批判孔老二和林彪散布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观点，自觉地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指导生产，大搞科学实验，认真探索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闯出了科学种田的新路子。如根据本地条件，普遍将两熟

制改为三熟制，坚持对种子提纯复壮，注意抓好选育和推广良种的工作。沪星六队的社员群众采取穗选、引种、杂交等办法培育出元麦、水稻几个新品种，正在试验推广。号上大队的放水员，综合大苗的管理方法和小苗育秧的优点，试验成功了中苗育秧和总结出一套“水做早管”的培育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植物保护方面，各生产队都普遍用公社自己生产的微生物农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广大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科学种田，越种越甜。”现在全公社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人员有九百四十三人，初步形成了三级科学实验网。

批林整风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了七一公社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一九七三年，上海郊区的气候不正常，有时久雨，有时干旱，农业生产受到威胁。广大干部和社员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提出“夏粮减产早稻补，秋熟来个大增产”的战斗口号，顽强地斗阴雨，抗干旱，战低温，终于夺得了第十二个丰收年。继一九七二年全公社粮食平均亩产翻《纲要》之后，一九七三年又把亩产提高到一千七百零三斤，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千零九十九斤增加百分之五十五；棉花虽然因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平均亩产仍达到了一百四十三斤，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百零六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蔬菜在一九七二年的平均亩产超百担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好收成。丰收不忘支援国家，广大贫下中农以大寨人为榜样，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出售商品粮一百四十六万斤，等于一九六五年两倍以上。为了响应毛主席“广积粮”的伟大号召，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基础上，他们精收细打，颗粒归仓，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积极储备粮食，到一九七三年为止，全公社储备粮累计二百五十万斤以上，做到队队有储备，多数社员家里有余粮。

社办工业日新月异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七一公社的社办工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新景象。

七一公社现有农机厂、综合厂、喷漆厂、蓄电池厂等四个社办工厂和修建队、农桥队等两个社办建筑单位，共有职工一千一百多人。除喷漆厂、蓄电池厂主要是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外，其余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影响下，社办工业一度不能很好地为农业服务，很多产品不能适应本公社农业生产的需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职工深入地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坚持把为农业生产服务放在首位，进一步克服了所谓“支农吃亏”的错误思想，他们说：“利润挂帅办企业，那是资本主义经营路线，是一条邪路；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办企业，路线正确，大有作为。”广大职工牢记毛主席“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决心为改变农业生产面貌，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农机厂的广大职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技术革新，为改变农业手工操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业机械。农机厂的工人们决心为解决农业劳动“三弯腰”（即拔秧、插秧、收割三种农活的手工操作）出力。他们吸收各地插秧机的优点，结合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反复试验、改进，终于制造出适应本地区需要的插秧机。这种插秧机可提高工效八到十倍，已在较大

范围内推广使用，过去那种“脸朝泥土背朝天，一天才插一点点”的状况，正在逐步扭转。为实现拔秧机械化，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又承担了试制拔秧机的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初步试制出滚梳式拔秧机。手扶收割机也已仿造出来，正在试用中。此外，工人们还设计制造了锥式脱粒机，四个人使用一部机器，一天可轧二十多亩稻谷，相当于五十个劳动力的工作量，同一般脱粒机相比，工效提高四倍。他们还适应农业生产多方面的需要，制造了各种饲料粉碎机以及把拖拉机改装成平整土地用的推土机，推广使用积肥用的吸泥船。到一九七三年底为止，这个厂已能自己制造五十多种农具和农用机械。

随着各种农业机械数量的增加，机械的维修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大革命中，农机厂专门设立了一个机修车间，在大忙季节做到日夜服务。一个深夜，联明大队正在连夜开工的一部手扶拖拉机发生故障，开不动了。一个电话打到机修车间，老师傅马上赶到现场，立即抢修，不多时，“小铁牛”又“嘟嘟”地奔跑起来。仅一九七二年一年，这个车间为各大队生产队修理的各种机械就有四百六十四台次。

在七一公社有一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下乡服务队”。一九六六年以前，贫下中农修理农具或家庭用具，要跑到七宝镇上去，很不方便。农机厂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成立了由十几个工人组成的“下乡服务队”。几年来，他们顶风冒雨，跑遍了全公社八十八个生产队，许多贫下中农的家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有一次，服务队到红明大队修理农具，发现这个蔬菜大队虽然使用铁镢多，却没有人来找他们修理铁镢。一了解，原来农机厂修的铁镢齿钝，不适合盆蔬菜地。于是工人们按照蔬菜地区的要求加以改进，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在农机厂的指导和帮助下，到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十一个大队都建立了农机修配站，使大型农机具小修不出大队，中修不出公社。各大队还都建立了小型的“粮食、饲料加工厂”，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指引下，七一公社农桥队和修建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桥队共建造了公路桥三十三座、拖拉机路桥一百八十九座、人行桥三百三十一座，还为灌溉工程、农村广播、集体建筑提供了不少水泥制品材料。修建队几年来为公社农业基本建设建造了三百六十八间仓库、四百十二间猪棚、十一个抽水机站、近百个水泥打谷场，为社员群众修建了一千零四十间房屋。

社办工业的发展，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较多的资金。截至一九七三年为止，社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已达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三百二十四元，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七十七万五千零九十九元增加了一点一倍；一九七三年，社办工业的总产值为四百三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六元，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百八十一万六千零四十五元增加了一点四倍；一九七三年上交公社利润一百零三万一千七百零二元，比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二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四元增加了二点六倍；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三年底为止上交公社利润累计达六百一十三万元，大大壮大了社有经济，为发展农业创造了可靠的物质条件。

随着社办工业的不断发展和集体经济的日益壮大，七一公社农业机械化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到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已拥有大小拖拉机九十台（其中大型拖拉机二十二台），电力排灌站十八座，水泵二百五十二台，电动机三百六十四台，机动收割机八台，稻麦两用脱粒机二百四十八台，机动插秧机二十二台，载重汽车三辆，机动运输船九艘，粮食加工机械四十四台，饲料粉

碎切割机一百一十七部，机动喷雾、喷粉器五十一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耕地实现了机耕，全部农田实现了机电排灌，作物脱粒、稻谷加工、饲料粉碎及部分农活操作实现了半机械化。社员们兴奋地说：“田里冒烟囱（拖拉机），河里蓬蓬蓬（抽水机），场上隆隆隆（脱粒机），屋里亮通通（电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越来越兴旺了。”

多种经营蓬勃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引下，七一公社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合理利用土地和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劳动力，增加生产，适应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多种需要，以及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都有重要意义。到一九七三年为止，全公社多种经营的项目，养殖业有：猪、羊、兔、鸡、鱼、奶牛；种植业有：蘑菇、药材、银耳、杞柳、芦竹、果树，此外还有运输、手工编结等各种副业生产。

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夺取农业高产的重要条件。公社党委按照公养与私养并举的方针，大力办好公社和大队、生产队的集体畜牧场，同时，鼓励社员养猪。

公社畜牧场担负着良种猪苗的培育和繁殖的任务。在市、县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引进不少新品种，大力开展猪的育种工作。目前，“上海白”等品种已普遍推广饲养。

为了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公社党委注意贯彻落实饲料政策和交肥政策，调动了三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养猪的积极性。一九七三年，全公社生猪饲养量为二万零五百二十八头，比一九六五年的一万四千一百九十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超额完成了

一亩地一头猪的指标。一九七三年猪的上市量为九千八百四十八头，比一九六五年的六千二百六十一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

现在公社畜牧场饲养的奶牛有六十多头，年产牛奶二十一万斤以上。根据国家规定的任务，部分大队和生产队办了养鸡场，公社畜牧场每年孵出苗鸡二十万只，供全公社发展养鸡事业的需要。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共出售肉鸡三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只，对于支援城市、繁荣对外贸易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公社的渔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公社有一个专门从事内河捕捞的水产大队。文化大革命中，为满足城乡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又添置了两艘渔轮，专门从事近海捕捞。一九七三年的捕鱼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十四倍。为了发展渔业生产还开通了家浜，疏浚了蒲汇塘，实行大塘养鱼。

文化大革命以来，种植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拿主要供应出口和城市的蘑菇来说，一九七三年全公社共种植近二十五万平方尺，为集体增加收入二十五万余元。宝北大队种植的蘑菇面积达三万八千平方尺，每年还培养十几万瓶蘑菇菌种，不但支援兄弟大队，还支援兄弟公社、外县以至外省。这个大队每年光种植蘑菇一项，就可收入四万多元，为大队购买农机具和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做到“以副养机，以机促农”。

为提供医药工业和医疗方面的需要，全公社种植了三百多亩药材，品种达十几种之多。各大队、生产队还充分挖掘潜力，利用河边、路旁，种植杞柳和芦竹，不但满足本公社支撑棚架类作物和编制小型农具如栲栳、筐、篮的需要，还为城市工业的产品包装提供了材料。

“七一”地区的手工编结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从七八岁的小姑娘到五六十岁的老妈妈，许多是编结能手，她们用各种颜色

的尼龙线、丝线编结出服装、手套、拎包、鞋帽等，色彩鲜艳，图案美观，是一项深受国外欢迎的出口手工艺品。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党的发展多种经营政策的落实，得到了新的发展，一九七三年收入五十万元，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七一人民公社多种经营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在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的指引下，多种经营象百花盛开，欣欣向荣。

商业工作面向农村

随着各项集体经济事业的蓬勃发展，七一人民公社的商业战线也是一派繁荣兴旺。广大商业职工在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指引下，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所散布的“利润挂帅”、“坐镇办店”等修正主义黑货，进一步树立了为农服务的思想。职工们说：“眼睛只盯秤杆算盘，光管收钱付货，离贫下中农会越来越远。”他们走出店门，深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七一公社供销社下面设有生产资料、建筑材料、五金等供应站以及粮食、棉花、农副产品、废品等收购站。每个大队设一个供销员。十一个大队的“下伸店”都分别建立了由贫下中农、商业职工、干部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供销网，使供、销与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

商业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可以了解生产的全过程，熟悉各种作物的生长规律，及时抓住季节，掌握生产关键，适时组织化肥和农具、农药的供应。棉花收购站的同志深入各大队、生产队，在前一年棉花收购结束后下去，到第二年棉花上市时再上来，亲自参加生产实践，及时将化肥、农药送到贫下中农手里。各大队的供销员不仅是生产上的后勤和参谋，而且也是生产上的

流动“哨兵”。沪星大队的供销员一次发现小麦上有粘虫，立即向大队领导作了报告，公社革委会及时召开了全公社供销员和植保员会议，采取措施，积极防治。

文化大革命以来，“下伸店”职工立足于农村，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在为农服务的广阔天地里，做出了不少成绩。

“以卖带收”。以前的“下伸店”，都是专营日用工业品供应，虽然买东西方便了群众，但是社员出售农副产品还得跑七宝镇。文化大革命中，“下伸店”和收购站决定部分农副产品改由“下伸店”代收代购。一到收购旺季，这小小的店堂象是临时“饲养场”。社员不出大队，随时可将家禽、蛋品、兔子等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这样既方便了群众，也节约了社员劳动时间。

“以卖带修”。在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中，贫下中农出大力流大汗的精神，使商业职工深为感动。为了方便社员群众，他们在“下伸店”设立小修部，为社员修理雨衣、套鞋、喷雾器等物品和小农具，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以卖带送”。每年的大忙季节，生产队急需的化肥、农药、饲料，往往抽不出人去购买。“下伸店”的职工就主动承担这些任务。他们以苦为乐，把份外事当作份内事，及时将生产队急需的氨水、饲料、农药送到生产队。职工们还把香烟、点心、冷饮拿到田头、场地出售。贫下中农称赞说：“商业职工真是我们的好后勤啊！”

在商业职工们的辛勤努力下，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经营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到一九七三年底已达九千多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广大社员群众的购买力日益增长，从全公社范围的商业营业额（包括七宝镇商店在内）来看，一九六五年为二百七十三万余元，一九七三年增长到五百六十四万余元，增加

了一倍多。整个商业战线购销两旺，市场繁荣，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喜人景象。

* * *

人民公社在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在胜利面前，七一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和干部，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乘批林批孔运动的强大东风，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展望着公社美好的未来，对一九七四至一九八〇年的发展远景作了初步规划。

广大群众和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的教导，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决心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林批孔，不断地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还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了一些设想。为了使七一公社的农业有更大的发展，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断总结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的经验。到一九八〇年，争取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二百斤，棉花三百斤，油菜籽四百斤和蔬菜一万七千斤，分别比现在增长几成到一倍。要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全公社拥有的拖拉机将由现在的九十混合台增至一百二十八混合台，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台半；自制和购置联合收割机二十二台；全

公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都将配备拔秧机、插秧机、小型收割机和植物保护机械。到那时，耕耘、拔秧、插秧、收割、脱粒和治虫等主要农活，都将实现机械化。同时要试制水稻耘耩、棉花中耕和油菜移栽的机械。社办工业在现有产值已占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一半的基础上，争取有更大的发展，以进一步发挥武装农业的作用。要继续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土地格子化，耕作园田化，在已有七个大队建成地下渠道的基础上，把全公社的明渠都改建为暗渠，并提高给水排水能力，使全部农田“百日无雨保灌溉，日雨一百七十六毫米不受涝”，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疏浚河道，修筑道路，载重五十吨的船将能驶至每个生产大队，汽车能开进所有的村庄。要继续发展多种经营，达到一亩地一头半猪，鸡鸭成群，六畜兴旺，扩大近海捕鱼业，更多地培植银耳、灵芝草，养殖珍珠蚌，大种果树和成材树。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进一步搞好文化教育事业，普及高中教育，在高级中学里试办大学班，创办农民业余中学。发展体育运动，建造游泳池，普遍开展游泳、球类、田径及军事体育等活动。进一步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把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提到中级医务人员的水平，一般重病不出大队，小病小伤不出生产队。社员收入将进一步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员收入将达到全年三百元，比现在增加近三分之一，并有计划地改建居民点。

这些初步设想，显示了七一人民公社新的跃进步伐，反映了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前进，反对倒退，誓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作贡献的决心和气概。当这些初步设想实现以后，七一人民公社将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到了那时，广大社员和干部又将向更新的目标前进了！

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后 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结合大学文科教育革命，试图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通过对一个人民公社的调查研究，总结公社化前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配合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给读者提供一本参考读物。

一九七二年一月，在中共七一人民公社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有公社干部、土记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 and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参加的三结合公社史编写组。两年半来，编写组在全公社范围内（包括已划出七一公社的若干大队），进行了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访问了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和干部，召开了数百次大小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搜集和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受到了深刻的、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一九七二年三月至七月，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来到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参加本书的调查和编写，做了很多工作。许多贫下中农和各级农村干部（包括曾在“七一”地区工作过的干部），主动为本书提供了大量资料，畅谈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并对本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同时，本市许多有关部门和编写组有关单位的党组织，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援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参加本书编写组的有：钱巧生、赵林福、黄亨、徐矛、陈家麟、李孔怀、刘其奎、刘根良、张玟、林克勤等十人；汪秉增、桂世杭、陈先法、周中民四位同志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由于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

《上海七—人民公社史》编写组

一九七四年六月



统一书号：11171·80

定 价：0.55 元